

目 录

“马日事变”亲历记·····	魏 镇(1)
关于“马日事变”的片断回忆·····	文斌等(21)
“马日事变”后湖南各县的大屠杀(一)·····	李仲任等(58)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湖南省党校 的反共活动·····	吴剑真 许茹春(74)
我参加了何键的清乡大屠杀·····	欧 冠(85)
浏阳县清乡屠杀的片断回忆·····	彭源瀚(100)
何键豢养的一条毒蛇——陈光中·····	周桢 唐希朴 戴岳(111)
何键手下的一名刽子手——曹明阵·····	田士清(130)
何键的出身和起家·····	刘岳厚(138)
何键利用蒋、桂矛盾取得湖南政权·····	张慕先(148)
何键联桂驱鲁和附蒋讨桂经过·····	彭松龄(167)
何键联桂驱鲁的一幕·····	戴 岳(174)
何键与桂系互相勾结的片断回忆·····	唐希朴(180)
两广“六一”事变中何键玩弄两面手法·····	罗子雯(185)
何键与谭延闿·····	黎泽泰(192)

“马日事变”亲历记

魏 镇

一九二七年湖南的“马日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这个事变的直接幕后组织者何键是当时躲在革命阵营里的野心家之一，是湖南地主阶级当权派的代表人。为了组织这个反革命叛变，他纠合了一批北伐军中的反动将领、国民党的右派分子和湖南一些身据要津的反动官僚政客、大地主，作过长时期的处心积虑的准备，在两湖进行过一系列的阴谋活动。那时，何键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第三十五军军长，我任该军学生队队长，随军部驻在汉阳。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我随何键派到湖南负责策划“马日事变”的代理人余湘三回到长沙，并参与过他所主谋的幕后活动，对事变内幕有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现就回忆所及，记其梗概，以备史乘参考。

何键在武汉的反革命阴谋策划

何键虽于一九二六年随唐生智部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参加了北伐战争，但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根本不赞成的。据说，在那年冬天他率部驻在宜昌，与其左右亲信谈到湖南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高涨形势时，就认为“国民革命在军事上是节节胜利，在政治上却处处失败。”及一九二七年二月，他奉命率部由鄂西移防湘西驻在常德时，对湖南的农民运动和整个革命胜利形势的恐

惧和仇恨更为加深了。据他自己在一九二八年（时任湖南全省清乡会办）“马日事变”周年的丑表功讲演中说：在一九二七年二月间他曾同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王基永作过一次谈话。谈话时，他伪装着一副革命面孔，谈了一番欲使革命进行到底应使军队与工农结合的道理；王基永也同他谈了一些关于农民运动和改造旧军队的意见。何键自己说，当他听了王的谈话后，“不禁毛骨悚然。”他这番话正是他对当时农民运动和整个革命深怀恐惧和仇恨的自供。因此，那年三月间，他率部移驻汉阳后，便进一步窥伺时机进行背叛革命的阴谋活动。

何键左右的一批高级幕僚，如军参谋长王芃生、秘书长凌璋、经理处长汤焕彬、顾问吴凯南（汤吴均系何的拜把兄弟）、参谋处长史民、秘书易书竹等人都是他所倚畀以成其“曾左彭胡事业”的班底，也都是醴陵的大地主分子。三十五军又是以醴陵的“子弟兵”为骨干组成的。这时，在何键的军部里和其他一些集会场所，经常有一些人，三三两两，议论有关两湖的农民运动，传播着种种诬蔑和丑化农民运动的谣言，如说官兵寄回家的薪饷被农会没收分配了，某人的父亲被农会抓着戴高帽子游垌了，乃至湖南要实行共产、共妻了等等。这些谣言都不脛而走。地主亲族从湖南逃到武汉时，带来的种种反动宣传，也都成为大家议论的中心。有一次贺耀组的大女儿从长沙逃到汉口，我们学生队队附谢武汉受贺函托，招待她住在汉口扬子江饭店，我曾同谢去看过她一次。这位平日连梳头都雇有专人侍候的大小姐，到了汉口两天，因无人侍候，自己竟不知梳洗，样子狼狈不堪。她这副形象也成了官佐们议论和思索的题材。在当时种种闲谈和议论中，有些人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农民运动的仇恨，说：“这太无法无天了！”有的拍桌大骂共产党“革命革到老子头上来了！”有的提出要求将农

民运动“糟得很”的情况报告唐总司令和政府“纠正”。当四月上半月，长沙的几个大劣绅李右文、叶德辉、俞诒庆等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后，从湖南传到武汉部队中的谣言就更多了，我们在军部官佐间听到的议论也更多而且更为恶毒，有人公开恐吓说：“继续这样搞下去，上面也不理，我们底下就只有造反了！”何键对这些官佐中日益嚣张的反动议论是完全心中有数，他不但不加以阻止，而且还巧妙地利用这种反动情绪，布置其心腹，在官佐间有意识地透露其反共衷曲，推波助澜，为其阴谋活动作舆论准备。如史民在某次饭后闲谈时，就公开说：“叶翠公（指三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叶琪）和军长谈到共产党时，总是拍桌大骂共产党和农民协会，主张消灭它们。”

由于武汉是当时革命中心所在地，北伐战争仍在进行，武汉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真实态度还不明朗，何键的反共阴谋活动，最初只敢在他左右的高级幕僚和同他个人关系较深的少数军、师长间暗中进行；对中下层官佐，他还是装着一副革命面孔，喊着革命的口号，不敢随便公开透露他心里的阴谋诡计。

何键的反共面貌的公开暴露，首先表现在土地问题上。这年春天，武汉国民党中央设立了一个中央土地委员会，何键也名列委员之一。四月间，土地委员会开会讨论土地问题纲领时，他在会上公开诬蔑农民运动，列举了两湖农民运动的所谓种种“罪状”，坚决反对没收地主的土地。会议在何键这帮人的压力下，制订了一个保障革命军人土地“不受侵犯”的条例，但仍承认了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原则。这个土地纲领当然不能满足何键的要求。他在会上的叫嚣，原意也只是想借此打开一道公开反共的缺口。他从这次公开的反革命叫嚣中摸到了武汉国民党右派首要的底，从此，他进行反共阴谋活动的胆子渐渐大起来了。特别是以蒋介石为首

的南京反革命派先后在上海、南京、广州掀起的反革命叛变，对何键及其反革命集团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他背叛革命的意图因而更加坚决和急切了，其反共阴谋活动也从上层间的秘密勾结发展到在中层干部中进行具体策划。

四月下旬某日，何键在军部参谋处同官佐们谈话，我和余湘三也在座。他听了大家对时局的不满意后，说：“你们这些议论、咒骂、哀叹有什么用呢？总指挥去河南前，我曾将湖南农民运动无法无天的情况向他详细报告过，问他怎么办，他叫我有事和汪先生（指汪精卫）商量。现在共产党这样猖狂，汪先生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们讲了许多话，结果只讨到一个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这也不过是一纸具文，没有什么用。他们还不是照样搞！这叫我有什么办法？”言下愤恨异常。过了一两天，我同余湘三又到参谋处参加官佐们的“闲谈”，史民对大家说：“现在只有学蒋介石在京沪一带的作法，设法迅速制止共产党的活动，才能救得了我们自己的身家性命！”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何键要史民来试探官佐们的态度的话，当下一致赞同他的意见。经过这样多次酝酿之后，军部官佐们都表示愿意服从军长的指挥，伺机行动。

最初，何键曾企图用捣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集会的办法，从破坏城市群众运动开始实施其反共叛变阴谋。四月下旬，他曾在汉阳组织了一批打手（主要是便衣士兵）破坏某一工人集会。但当打手刚一行动，很快就被工人纠察队所驱散，大会仍照常进行。经这次失败之后，何键及其参谋人员都感到单靠这类偷鸡盗狗的办法，顶多只能泄愤一时，终不能成大事。因此，他们决定放弃这种办法，而采取发动军事叛变的办法。为此，何键于四月底利用唐生智总司令去河南前线的时机，在汉口邀集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密商发动清党反共的军事叛变的计划。参加这次

秘密商谈的主要人物，除何键自己及其副军长叶琪之外，还有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兼武汉卫戍司令）、独立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三十六军副军长兼代湖南省政府主席周斓和该军秘书长兼驻汉办事处主任马继中等人（这是当时的第三十六军军长、现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刘兴告诉我的，那时他已率三十六军赴河南前线作战，李品仙曾将这次会商的大致内容用电话告知住在汉口的三十六军秘书长马继中，会后马继中将会议要点报告了刘兴）。在会商中，夏斗寅是主张反共最激烈的，对何键发动军事叛变的阴谋表示坚决支持；李品仙则主张边报告、边行动，但大家都不赞成；最后决定秘密进行，斩而不奏。关于发动叛乱的地点，最初他们曾考虑首先在武汉发动；当时有人对何键说：“你们自己有部队驻在汉阳，何不就在武汉三镇动手？”但何键不赞成，他的参谋人员也都反对，李品仙更不敢负首难之责。原因之一是此刻大家对于唐总司令对反共清党的态度都不完全了解，怕闹下大乱子没有人替他们承担责任；尤其重要的是第四军的叶挺师就驻在武昌，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的势力也未可轻视，军事叛变成败未可逆料。因此，他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为了便于推卸责任，同时又便于在幕后组织和领导这个阴谋活动，决定避开武汉，改在湖南首先发动，随之由夏斗寅在鄂东南响应，然后由何键自己的部队和李品仙的第八军相机在武汉举事，以成其“两湖并举”的清党反共“大业”。何键在这个阴谋中所依靠的军事力量，除他自己当时驻在汉阳的部队外，还有驻宜昌的夏斗寅独立第十三师、驻岳阳、长沙间的第八军第一师张国威部（张当时兼武长路护路司令）、第二师吴尚部和第三师李云杰部（均驻汉口）、湖南省防军独立旅熊震部（驻常德）、第三十五军第一师叶琪部（驻岳阳）。

何键在湖南发动军事叛变的最初布置

何键将他的反共军事叛变首先发动地点选在湖南，固有其种种优越条件，但也有一些困难，主要是长沙没有他的直属部队；叶琪师驻在岳阳，又没有理由要求将前方部队后调。经与参谋处商量，决定以武汉没有适当驻地为由，呈准将三十五军学生队移往长沙训练，并乘机以汉阳学生队为基础，将学生队改为教导团，以之作为在湖南发动军事叛变的基本力量。这个计划是在四月下旬决定的。同时决定由王东原任教导团团长，陶柳、晏国涛和魏镇分任大队长。在这个计划确定之后，王东原来到长沙，在小吴门处四十九标设立团部，着手教导团的筹组工作。计划是：第一大队招收初中毕业生数百人组成两个步兵中队和机枪、炮兵各一个中队，限于暑假期间招足，在五十标成立，由魏镇任大队长；第二大队为步兵四个中队，尽速招收新兵，于学院街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成立，由陶柳任大队长；第三大队由晏国涛任大队长，暂缓成立。

何键确定了在长沙成立教导团的计划后，随即先后召见了王东原、陶柳、晏国涛、魏镇等人，具体交代去长沙的任务；并以余湘三为他在湖南具体策划军事叛变阴谋的代理人，令我和余湘三带领汉阳学生队新毕业的四十多名学生赴长交王东原以下级骨干任用。

我和余湘三是五月初回到长沙的。约在我们动身赴长前两天，何键派小汽车接我们去军部谈话。何键对我们谆谆训示说：“你们到长沙以后，最要紧的是掌握住部队。要把自己部队的刺刀开口，免得军情紧急时措手不及。要特别注意留守处的安全，有什么风吹草动，你们要和留守处共存亡。这是你们的责任！”这

是何键第一次以如此严重的态度向我交代任务。当时我思想上感到有些紧张。余湘三看到了我的表情，知道我对任务还不摸底，后来在我们同回长沙的车上，他郑重其事地将何键的意图对我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现在湖南的农民协会和工人纠察队凶得很，我军学院街后方留守处储存有不少的枪枝子弹，还有些大炮和炮弹，恐怕暴徒抢劫，军长很不放心，又不便抽调前方的部队去保护，因此，特命教导团在长沙成立，借以保护留守处的安全。这样做顺情合理，不露半点形迹。我们到长沙后要好好干！”虽然何键和余湘三始终不曾对我明言其所谓“顺情合理、不露半点形迹”的究竟，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时我对他们的罪恶阴谋，也已心中有数了。

类于余湘三

何键为什么选上了余湘三作他在湖南策划军事叛变的代理人呢？这里且对余湘三的情况作一简短介绍。

余湘三，字甲文，醴陵县泮川冲人，保定军校三期炮科毕业，曾在零陵镇守使刘建藩部任排长。刘死难后，曾与同学何键、张国威等在醴陵组织游击队。一九二〇年投入李抱冰部任炮兵连长，在津市、澧县一带与王育寅部作战，右脚负重伤致跛。后来，赵恒惕政府为了照顾他，委他任安（乡）澧（澧县）厘金局局长，他乘机弄了一些钱，在醴陵家乡买了一百多石田。一九二六年十月，他到汉口找何键，何委他为军部中校参谋，派到汉阳学生队军事教官。我和他是这时认识的。他因与何键有同乡同学和同事等几重关系，颇得其信任。我虽为学生队队长，但有关队里的经理、人事问题的决定，都须通过他才能得到何键的批准；同时他在学生队也负有部分责任，所以我在工作中都是事事依靠他的支持，他

对我是有左右作用的。他尝自称不愿作官，不愿显露名声，只想作些闲散差事，“说说话，参谋参谋”。他平日最好打牌，喜欢玩弄阴谋诡计。同他臭味相投的人也常奉承他是一个“兵家而兼有策士才”的人物。他确算得上一个善于奔走策划的阴谋家。当他到三十五军不久，他的这分“才华”，很快就得到何键的赏识。他平日与何键接触密切，敢于“直言”。何键这个以“曾左事业”后继者自命的野心家，也装成能纳“忠言直谏”的样子来笼络他。因此，他对何键也忠心耿耿，以报其“知遇”之恩。同当时何键豢养的汤焕彬、吴凯南等反动策士一样，余湘三也是满脑子的极端反动的封建地主思想，对共产党怀有刻骨的仇恨，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也是根本反对的。某日，三十五军学生队头一次举行“总理纪念周”，第二师师长刘建绪代表何键到队主持。当全体员生随刘恭读总理遗嘱时，声浪参差不齐，此起彼落，大出洋相。余湘三对于读总理遗嘱，极为反感，会后对我说：“背孙大炮那一套，真叫活见鬼。”学生队的政治教官宁翔（国民党员）某次给学生队讲农民运动课，将几句他自己也不懂的条文翻来复去背诵，下堂后，余湘三问他：“你左一个‘武装农民’，右一个‘农民武装’，究竟怎么一个武装法？”宁翔被他问得无辞以对，只好说：“上面规定这么讲，我有什么办法？”余湘三平日貌似深沉，不轻易向人表露他灵魂深处丑恶肮脏的思想。与他接近的人则知道他是何键左右坚决主张反共的一人，是何键的清党反共阴谋的直接参与者之一。“马日事变”后，他曾任湖南省会公安局局长；何键任湖南全省清乡会办时，他受委实际负责湖南省团防训练所的工作；何键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四路军总指挥时，他建议设立四路军干部学校以培植嫡系势力，被何委为四路军总部少将高参和省政府顾问。

余湘三等到长沙后的活动

我同余湘三于五月初回到长沙后，耳闻目见，感到湖南工农革命运动的声势比武汉更为壮大，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异常尖锐，因而内心交织着恐惧与不满之情，对何键所交代的反共任务不免有些动摇；而余湘三的反共谋叛的意志却更加坚决和迫不及待了。有一次，当他同王东原、晏国涛和我商量教导团招兵问题时，他表示不惜以身家性命，同共产党拼到底。

关于发动军事叛变的兵力问题，是叛变策划者首先必须考虑的。何键最初企图拉张国威的部队充当叛变的主力。约在五月十二日，何键特派三十五军陶广师部经理科长黄慧僧，携带致张国威的密信和一笔巨款，专程来长见张国威，商谈此事，并要余湘三予以协助，极力促成。何在致张的信中，对发动军事叛变的作法，主张先用便衣枪兵偷袭革命机关，随即出动正式部队，借维持秩序之名，掩护便衣枪兵，包围、捣毁这些机关，并乘机扩大事态，举行公开的清党反共的叛乱。当时任湖南省政府军事厅长兼代主席的张翼鹏（醴陵渌口人，曾任保定军校战术总教官，后任唐生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总参谋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同何键、余湘三有同乡和师生之谊，交情甚厚。余湘三受了何键的重托，将何的清党反共阴谋详告张翼鹏，并挽其恳商于张国威。张国威以其部队主力已开往岳阳为词，不愿承命。实则因他与何键私嫌向深，不愿为何所用；同时也因为对唐总司令的态度不摸底，怕负不起责任（不久他留长的余部也开往岳阳去了）。这时驻在长沙的部队还有第四集团军的一个警卫团，团长周荣光兼长沙卫戍司令，所部四个营，分驻四十九标与五十标，兵力最为雄厚。另有李品仙的第八军教导团，驻浏阳门外，团长

李殿臣（晋阶），所部全系新兵，不能单独有所作为。王东原的三十五军教导团招收新兵的计划，这时还没有实现；陶柳还在汉阳（在三十五军第三师陶广处当营长）。余湘三在拉张国威的计划失败之后，又就商于张翼鹏，请他以代主席名义调周荣光团听用。张翼鹏对何键的叛变阴谋虽衷心赞同，对余湘三的奔走策划极力支持，但同样也摸不清唐总司令的真实态度，周荣光又是归唐直接指挥的部队，怕他泄露秘密，影响自己，因此也不敢下命令要周荣光来干这个罪恶勾当。

余湘三见拉拢上述驻长部队发动军事叛变的计划一时不能实现，便转同王东原、晏国涛和我商量，主张以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的名义立即招募新兵，尽速将教导团成立，并由我担任后方留守处主任，负责招兵。我对这个任务感到很为难，问余湘三：没有上面的命令，能否自行招兵，这个擅自招兵买马的责任谁来替我们背？他却很有把握地说：“我可替芸樵（何键号）负责；张矮公（指张翼鹏）是我们的知交，怕什么？”为了招兵的事，余湘三天天追到我家里，要我迅速着手搞。在当时的革命高潮下，象过去那样把旗子一竖就可招徕几百几千已不可能，这时在乡下招兵要通过民农协会才行得通，在长沙城里实际已无兵可招了。

过了一两天，恰巧陶柳从汉阳带着两百名老兵来到长沙。这给我们解决了自行招兵的大难题。陶柳到长沙后，就由他担任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并以他带来的两百多名老兵为基础，成立了三个连，作为三十五军教导团的基本队伍。原来的自行招兵之议，从需要上说，也没有以前那样紧迫了；而且余湘三对学生带兵的作法本就怀疑，因此，招兵的事便无形中搁置了下来。

陶柳也坚决反对另行招兵起事。当我们共商起事的具体步骤时，陶柳说：“现在时机紧迫，如果要靠招好了兵再来发动，不知

道要等到哪一天？”大家认为要想起事得到成功，仍须利用正规部队；如果单靠三十五军教导团这几个连的兵力，一动就会被消灭。陶柳忽然想起他的故交、当时驻湘乡、湘潭整训的许克祥独立三十三团来了，他介绍了许克祥及其部队的情况，极力推荐此人大有可用之处。经共同计议，遂决定由余湘三商请张翼鹏以增防长沙为名，将许克祥的三十三团调来长沙，作为发动军事叛变的主力部队。张翼鹏同意这样做了。

关于许克祥

许克祥，号长胜，湘乡县人。行伍出身。清末入营当兵。一九一二年投入宝郡守备区卿衡部任连长。后投入朱泽黄旅任营长。赵恒惕主湘时，又投入陈嘉祐旅任营长。嗣后赵恒惕解决陈嘉祐旅，许即同陈旅另一营长陶峙岳拖队伍投往湘西镇守使蔡巨猷部，被委为刘叙彝的第九旅毛炳文团的营长。时蔡巨猷横行湘西，其部队专为川滇黔等省贩卖鸦片的客商护运烟土，抽收过境税，以充军饷，获利极巨。许克祥妻系妓女出身，善于逢迎，与过境烟商交往甚密，从中分润不少。后许即以此在湘乡购置田产百余亩。一九二六年，贵州军阀袁祖铭进据湘西，许又投奔袁祖铭，被委为旅长。是年冬，许随袁进驻常德。时唐生智部教导师代师长周斓奉唐令解决袁部，周派人策动许克祥，协同扑杀袁祖铭。事后，周斓将许部收编，委许为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的，令其率部驻湘乡、湘潭整训。这个惯于在军阀厮杀中东奔西投的亡命之徒，正具有为何键这类野心家所需要的那种冒险性。当张翼鹏将他的部队调到长沙来时，使他受宠若惊。他之毅然承担军事叛变首难之责，也使张翼鹏、余湘三等如获至宝。事变之后，各县逃匿长沙城里的豪绅、地主和蜷集在长沙的反动官僚、政客等各色

反革命分子都奉许克祥为“救世主”，歌颂他“有胆有识”，有些大地主家里还供奉着他的长生牌位；湘乡的一批大地主豪绅特地为这个刽子手在县城云门寺前立了一块很大的“纪念碑”，何键及其手下的一些人都曾为之题词。

事变前夕的策划和布置

许克祥的部队约于五月十四、五日奉张翼鹏令调来长沙，驻小吴门外炮队坪及识字岭一带（团部驻炮队坪）。他刚到长沙时，对军事叛变首难之责尚有所顾虑，不肯独担重任。经张翼鹏、余湘三、陶柳等强调清党“反共”的必要，陶柳并告诉他这是大富大贵的绝好机会，再加以各方面的推戴奉承，他就毅然担任了这个反革命叛乱急先锋的角色。这时，张翼鹏、余湘三等便也同何键一样隐身到幕后去了。张大玩其两面手法，一面继续装着一副革命面孔，一面暗中积极支持余湘三的阴谋活动，所有对外活动则完全由许克祥出面。

从许克祥到长沙之后，反革命集团发动叛变的准备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许克祥不但到处喊，公开煽动各界仇恨农民协会和工人纠察队，而且组织他的官兵深入友军进行串联活动，利用军官家属对住在省城的同乡戚友进行广泛的反共宣传、制造、散布各种丑化和诬蔑工农群众革命运动和动摇人心的谣言，使尽一切办法以激起下级官兵对共产党和革命运动的仇恨，制造混乱，煽惑人心。许曾对自己部队的官兵公开造谣，说他部某排长在湘潭街上买东西，被纠察队抓去捆绑游街示众，最后被用乱棒打死，余湘三也到处造谣说醴陵县某部营长被农民协会枪毙，桃源县某部连长被农民协会用梭镖戮死。

关于发动军事叛变的方法，余湘三最初仍想照何键在给张国

威信中提出的办法行事，他认为这样既能实现罪恶目的，又可替何键减轻责任。许克祥与陶柳则坚决反对这个办法，他们认为这样做，既不能彻底摧毁共产党和各个革命机关的活动，而且事先要将所有驻长部队官兵一一联系好采取共同行动，事实上也办不到；如果发动叛变不成功，不但反共目的达不到，而且自己可能遭到毁灭性的反击。经过一次有余湘三、王东原、许克祥、陶柳、李殿臣、晏国涛和魏镇等参加的会议（约在五月十七日）再度商议，决定用公开的军事行动发动叛变。这次会议是在许克祥的团部里开的。会议决定由许克祥担任叛变行动的指挥官，由他的三十三团担任叛变的主力部队，陶柳的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部队及其他驻长部队配合行动。关于发动叛变的日期，大致决定为五月二十一日（因为这一天是星期天，有利于突然发动），但仍视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再作最后决定。会上，余湘三对许克祥的欣然承担首难之责大加推崇奖饰，并当众说：“现在我们已公推许团长为领袖，大家要多去看看他。”王东原也是一个积极反共但又不敢出头首难的阴谋家，现在许、陶两人既愿出头发动，他自然乐得顺水推舟。

这时，尚待完成的叛乱准备工作，主要是对其他驻长部队和军事机关的争取联系问题。在许克祥团调来长沙之前，除周荣光团以外，其他部队大致都已由余湘三奔走联络好了。最初感到最难争取的是驻小吴门外校场坪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校长为石醉六），后来通过其总队长谢煜涛和大队长文九德的关系，也很快取得了联系。在五月十七日的会议上，大家着重分析了周荣光的情况，鉴于他的态度此刻仍捉摸不定，决定直接拉他所属的几个营长，争取他们在许、陶部队行动时采取旁观态度。

这时，夏斗寅已在宜昌发动反共叛变，其叛部迅速逼近岳阳、

临湘，指向武昌，武长铁路交通被阻，外间盛传已久的何键的反共阴谋也因夏斗寅的叛变而更加证实（这时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已公布了夏斗寅的清党反共通电）。夏斗寅的提前发动，打乱了何键原来的“两湖同时举事”的计划，使其不再有待机行动和从容准备的余地了，共产党湖南领导方面这时似已开始觉察到局势的严重性，曾要求张翼鹏将驻长部队调往岳阳增防，以阻击夏斗寅叛部南犯。张对此则借词推脱并设法阻挠。

军事叛变已迫在眉睫，局势更加紧张了。就在十九日晚间，当工人纠察队巡经学院街三十五军留守处时，留守处驻军即乘机诬称纠察队企图夺取留守处枪枝，公然鸣枪挑衅，将十几个纠察队员的枪缴了。经党、群领导方面严重交涉，到第二天才予发还。

这时，我眼见在工农群众的革命威力面前，乡下地主的威风已经扫地，城里象李右文、叶德辉等一向穷凶极恶为非作歹的豪绅已被整倒了；现在我们这一小撮人要正面与革命相对抗，成败未可逆料，万一事变失败，闯下大祸，谁来替我们担当？当想到这种种时，心情不免有几分沉重。但我早已搭上了何键驾的这条贼船，上述偶尔出现的沉重之感，也就转瞬即逝。不过，这时我对余湘三的策划，也有同王东原一样的想法，就是让许克祥、陶柳他们出头去搞，自己不在紧要关头公开露面。

“马日事变”的发动

二十一日下午五时左右，我从四十九标回到南门外家里，想把时局紧张的情况告诉家人，叫他们在听到外面枪响时不要惊慌，并要我爱人立即通知我的族妹魏斌（时为共产党员，后叛党）迅速逃避。当我到家不久，余湘三突然来到我家，行色匆匆。我

与他已两天不见面了。原来他于十八日晚去岳阳，先天才回。他将这次去岳阳的任务和结果大致告诉了我：由于夏斗寅叛部已逼近岳阳、临湘，必须将我们在长沙发动叛变的计划通知驻岳阳的叶琪部，并要他们同夏斗寅部紧密配合，以支援我们在长沙的发动；经与叶琪的副师长周磐和他的几个团长共同商定，他们表示坚决支持长沙的发动，由叶琪将部队集中岳阳、通城一线，名为防范夏斗寅叛军南犯长沙，实则与夏部配合，以阻止武昌方面叶挺师的南下，另由叶琪通知常德的熊震部，令其与长沙叛变采取一致行动。说完这些后，余湘三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现在决定按原计划在今晚发动。你怎么还呆在家里？赶快回营，和警卫团的几个营长联系一下，邀他们到许团长那里看看情况。”当我急急忙忙赶回四十九标时，周荣光的几个营长安民等已在门口等着。我当即带着他们去见许克祥。

这时，四十九标到炮队坪一带，沿途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我们一到许克祥处，坐未定，许即大声对我们说：“我已决定今晚十一点钟动手。”许克祥当晚发动叛变的行动布置是：南正街、南门口一带地区的戒严和对东茅巷、东长街的总工会、公安局、特别法庭等机关的进攻由陶柳的部队负责；其余地区的戒严和进攻革命机关的任务全由许克祥的部队负责。

晚十一时正，市内枪声突起。浏阳门外、东茅巷和南门口一带枪声最为激烈，小吴门、东车站和东长街一带枪声较为稀疏。

枪声初起时，我同王东原都在四十九标教导团团部静坐以待，只见一般不知内情的连以下的官兵显得很紧张，周荣光特别慌张。张翼鹏这时装做不知内幕的样子，打电话给周荣光查问事件真相。周无词以对，转问于王东原。王推说不知道，叫他问我，我也推说不知道，要他去问自己的营长。周说：“他们也不知道。”

我说：“他们真不知道吗？为什么他们没有动静呢？”周语塞。

许、陶叛部当晚向省党部、省、市总工会、农民自卫军总部、省党校、特别法庭等革命机关和工人纠察队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恣意搜查、捣毁，并“查封”了这些革命机关，夺去了纠察队的枪支，放走了拘押在特别法庭的全部土豪劣绅人犯。共产党领导方面和革命群众对这个突然发动的叛变虽处于被动，但许、陶叛部的进攻仍遭到了革命力量的坚强抗击。直到二十二日晨，市内枪声才停止下来。当晚全市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工农革命群众、青年学生惨遭杀害。

二十二日全市沉浸在反革命的血腥恐怖中。这天，王东原和周荣光都不见了，原来是被余湘三找去同许克祥等策划叛变实现后的第二步措施去了。二十三日，这一伙军事叛变的首要分子在长沙市戒严司令部（周荣光兼司令）集议，成立所谓“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临时办公处”，作为反革命叛变的公开领导机构，由许克祥、周荣光、李殿臣、王东原、张敬兮等五人自封为这个反革命领导机关的“临时主席团主席”，公开发布由它统一“拿捕暴徒分子”事权的命令；还以“长沙救党运动大会”的名义发出臭名远扬的五团长清党反共通电。通电全文如下：

“各报馆均鉴：以党治国，载在党纲，凡百设施，胥遵党命，政府受其指挥，人民赖其利益，甚盛事也。吾湘政府，自去夏改组以来，发号施令，咸遵省党部之指挥，事实具在，共见共闻。所惜真正国民党员，大都奔走四方，在外工作，致使本省最高党部，成为鬻党求荣借党营私者所盘据。彼辈以国民党为招牌，以销售舶来物为目的，广布党羽，擅作威福。打倒封建制度，非无界限也，彼辈则借以诛锄异己。发展农工运动，非无途辙也，彼辈则借以招纳亡命。如饮狂药，毒敷全省。国民革命，本各界共同之责任，彼辈强事轩輊，鼓惑农工，始则驱农工与其他各界斗争，继则驱农工交互斗争，终则驱农与农斗争，工与工斗争，折断联合战线，发挥部落思想。未及数月，遂令市井萧条、

失业满目，田多荒芜、邑有流亡。假使岁月浸深，不知凋残何似。各国因产业发达，促无产阶级之形成，而尚有以图存。彼辈以破坏产业，促无产阶级之形成，而使辗转就死，顾犹自诩为无产阶级之救星，自欺欺人，言之不作。现在钱荒盐荒米荒，到处见告，厘税盐税杂税概无收入，公私破产，救济术穷，谁生厉阶，为梗至此。外交方略，理应统一，政府已三申五令，不惜婉商切告，彼辈利令智昏，不顾一切，阳以快一时之人心，阴以行彼党之诡计。日日以拥护政府自誓，事事与政府为敌，促各帝国主义者之协以谋我，而陷外交于狼狈不堪之域。借非蓄意捣乱，何致丧心若此。革命军人，秉性坦白，勇于牺牲。彼辈以其质直易欺，对甲挑乙，对丙离丁，必使相怨相仇，一一供彼驱策，有不受其诱惑者，暗即予以打击，明则加以诬蔑，手段卑污，无所不用。将士亲属，动则诬为豪劣杀之。将士财产，动辄指为地主收之。以致同仇自危，壮夫气短。近更变本加厉，指使爪牙，围攻军队，但期彼辈得逞，地方之糜烂，生灵之涂炭，非彼辈所顾惜也。至于青年学子，头脑本极纯洁，阅历尚属浅薄，正当加意培养、蔚为国器。彼辈利用其方刚之气，夺其学业、授以邪说、宣传示威以外无研究，捣乱破坏以外无事功。甚至昌言革命，毋庸读书、智识亦应打倒、伦常丧尽，礼教荡然。究其用心。不使人才绝迹不止，逞彼辈一时之私图，坏国家百年之大计。溢为公敌，谁曰不宜。类此之事，更仆难数。次种危害党国、残害人群之暴徒，早应彻底铲除。徒以政府受其劫持，人民未及声讨，坐视流毒，愧愤何极！兹因民意之督促，爰幡然以改图、谨陈四义，昭告省民：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迥然不同。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劳资合作，实为必要。除遵照先总理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之遗策，以示调剂外，此后本合作精神，使农工商为平均之发展，亲密之联合，不蹈畸重畸轻相倾相轧之复辙，凡从前未经政府核准之捕押，一律释放，未经政府核准之没收，一律发还，曩日暴行，悉予涤除，此其一。外交重大，影响全国，后此应付，悉秉中央成模，不逞一时之意气，而授帝国主义者以口实，此其二。前方将士，鏖战经年，备极劳苦，此后应充分接济其饷需，保护其亲属，尊重其财产，调融其意见，此其三。各有子女，均望成立，此辈青年，实为中国未来之主人翁，此后务使安心求学，储学济世，庶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此其四。誓以至诚，执行斯事，总期昭合先总理之主义，政府之命令，全省真正之民意，奉以驱驰，罔敢陵蹙，群策群力，救党救国。所望各级党部各民众团体，同矢救国之热忱，共除害群之暴类，

恪守职能遗训，监督政府，而不加挟制，扶助政府，而不事包围，则以党治国之效用，计日可程矣。敢布腹心，惟希明察。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临时主席团许克祥、周荣光、李殿臣、王东原、张敬兮叩”

五月二十四日，继续由许克祥出面，在曾公祠（即今中山东路中山图书馆地址）召开所谓各界联席会议，正式组织“湖南省救党委员会”，以篡夺国共合作后成立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领导权，推举仇鳌、彭国钧、许克祥、张敬兮、陈其祥、肖翼鵬、李毓尧、张开琏、左益斋等所谓“真正国民党员”为委员，并宣告废止前省党部发布的土地问题决议。这时，岳阳传来了武汉国民政府特派谭平山、邓介山（即邓介松）、陈公博、彭泽湘等偕同苏联顾问鲍罗廷将来长沙查究事变真相的消息，在会上引起了一阵骚动。蜷集在会场中的各色反动分子当即要求张翼鹏急电岳阳驻军，令设法阻其前来。他们还深怕岳阳驻军阻挡不了，又决定由许克祥、周荣光、王东原、李殿臣、张敬兮等五人联名致电岳阳驻军，要求他们将谭平山等逮捕，就地处决。

所谓长沙“军工冲突”善后真相

“马日事变”刚发生时，张翼鹏就别有用心地对外间宣称这是一场偶然发生的驻军与工人纠察队之间的误会、冲突。就在事变后的第二天晚间，何键的副军长叶琪很神秘地从岳阳来到长沙，据说，他是奉命来处理“军工冲突”的善后事宜的。二十三日下午，我到戒严司令部去看叶琪（我任三十五军学生队队长之前，曾在叶部任连、营长多年，与他私交颇深），见那里挤满了各色人物，议论纷纷；周磐也坐在那里等候。周告诉我：张翼鹏刚才接到李仲任（三十五军第一师第二团团团长）从岳阳来的电话，说国民政府派了谭平山等大员到了岳阳，将来长沙调解驻军与工人纠

察队的冲突，李请示如何对付；张得到这消息，感到很恐慌，现在正与叶琪在里面商量对策。周听说叶琪和张翼鹏拟令岳阳驻军以保护安全为名劝阻谭平山等来长，他颇不以为然，当着客厅里许多人大声嚷着：“敷衍他们做什么？不如干脆就在岳阳将他们干掉！许克祥这回作得不漂亮，把共产党一些头子都放走了。若是我周磐，一个也不给留，要完全杀掉！”

过了一会，叶琪出来了。他当着客厅里许多人，一付笑脸地讲着：“许克祥这样闹下去还得了！目无法纪，非严办不可！”但背后却又对许克祥大加赞扬，说他有胆有识。叶琪虽没有明白宣布他此行的真实任务，但很清楚，他是来对叛变分子进行抚慰，并密令他们继续进行清党反共的。

叶琪在长沙大概停留了两天就走了。跟着，张翼鹏就把李仲任团从岳阳调来长沙，“以安反侧”。

叶琪走后不几天，约在五月二十六日，周斓奉武汉政府命令回湘执行其代主席职务，“查办”事变责任。他到长沙后，一方面叫许克祥立即率部开往湘潭、湘乡一带，同时，对其他一些叛乱首要分子进行安抚，说“事情全是许克祥搞的，与你们无关。”在他的“查办”下，反革命的叛变活动更为扩大深入了。六月一日，他以湖南省政府代主席的名义，发出通缉李维汉、夏曦、郭亮等共产党湖南领导人的通电。在他的纵容鼓励下，这时蜷集在长沙的各色反动分子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起来。六月九日，“湖南省救党委员会”发起在教育会坪举行所谓各界欢迎周副军长大会，他由仇鳌陪同到会，接受所谓各界群众的欢迎。大会当场通过了十多项反动决议，“公推”周为“湖南省救党委员会”的委员，要求他以“实力”参加“救党运动”，还明目张胆地要求他以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的名义奖励马日“铲除暴徒的武装同志”。自此以后，

长沙就陷入了反革命屠杀的血泊中，共产党员、工农革命群众和革命青年学生每天必有几十人惨遭杀害；全省各县也先后重演了“马日事变”的惨局。

也就在这几天中，公安局以扰乱治安为罪名，逮捕了几十个据说是贴标语的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并立即枪杀了其中的五个人。这是往后合法化的大规模清党反共屠杀的序幕。从此，湖南进入了空前的反革命恐怖时期。随后，武汉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上层分子叛变革命的企图已进一步显露，何键遂于六月二十九日发出通电，公开揭出清党反共的黑旗，进一步为“宁汉合作”铺平了道路。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关于“马日事变”的片断回忆

编者按：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事变，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公开进攻。在“四一二”事变的直接影响下，国民党军阀何健，策动反动军官许克祥等，于五月二十一日在长沙举行反革命政变（通常称为“马日事变”），疯狂围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以及一切革命组织，用极野蛮残酷的手段，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紧接着，又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灭绝人性的清乡大屠杀。

为了征集有关“马日事变”的史料，我们于四月二十日、三十日，邀集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魏镇（当时任三十五军教导团大队长）、参事文斌（当时任国民党长沙市第十四特别区党部委员）、杨敏先（当时任三十五军教导团分队长）、谢国馨（当时任中学教员、长沙《商民日报》主笔）、刘君武（当时任三十五军第二师营长）、秘书吴剑真（当时任省立高级中学师范科主任，后任省党校教务处代主任）、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张平子（当时任长沙《大公报》主笔）、樊国樾（当时在省教育厅工作）、以及刘德璉（当时是第一师范初师部学生）、左仲文（当时任三十五军第二师军需处长）、杨经武（当时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训练员）、李仲任（当时任三十五军第一师团长）等先生，座谈这次反革命政变的前后

情况。座谈会由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刘岷林副秘书长主持。会后，又分别访问了长沙市泥木业老工人屈绍琪（“马日事变”时任长沙工人纠察队分队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谭道平和秘书朱明章、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李淑一、屈子健、张知非、民革湖南省委候补委员李人珍、民革长沙市委委员张锡藩，以及彭傲耆、唐耀章等先生。在座谈会上和访问中，许多先生都就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具体地谈到了一九二七年长沙“马日事变”的经过。下面就是这两次座谈会的发言记录和访问记录，整理后曾经送请发言人或被访问人校阅过，同意发表。（魏镇先生因另有专文，发言记录从略）

文 斌

“马日事变”以前，四集团军总参谋长张翼鹏代行省主席职权，在表面上看不出他是反共的，心里却同情何键策划反共的阴谋。农民运动大发展，空气非常紧张。土豪劣绅们在农会威力之下，由乡下跑到县城，由县城跑到长沙，有钱的还跑到汉口、上海，如聂云台就跑到上海去了。我当时在建设厅工作，厅长邓寿荃是大地主，安化老家有山田租一两千石，滨湖有湖田近万亩。他开口闭口拥护第三国际。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要反对刘岳峙，他答：“他（指刘岳峙）不知道趋时。我们一切要慎重，莫吃眼前亏。”由此可见，他在表面上拥共，骨子里是反共的。醴陵人余湘三，是阴谋策划“马日事变”的主角。记得在“马变”以后，我同他谈过话，他洋洋得意地说：“你们不搭帮老子，还想站住脚吗？”

芸樵(何键别号)虽然是反共的,没有我到处奔走,哪有这么好!”朱德龙(何键主湘时,任省政府秘书)也说过:“‘马日事变’,余湘三之功不小。”除许克祥外,陶柳也是一个重要角色。他当时任三十五军驻长留守处主任,驻扎学院街老学台衙门,即现在的文化电影院。陶柳不满意共产党,时有怨言。所部实力雄厚,多系老兵。

“马变”前,我是国民党长沙市十四特别区党部委员,兼建设厅区分部常委。十四特别区党部设在伍家井涵德女校内,共产党员李一龙是区党部常委。区党部成员有好几百人,都是省政府各厅局的公务人员。五月二十一日晚上十一点钟,忽然听到有枪响,并且响得很密,左边枪声来自东长街(现蔡锷中路)的矿区工会,右边来自曾公祠的农会。当时我住在伍家井区党部内,事先听到外面风声紧急,怕因李一龙的关系牵涉到自己,故临时睡在厨房里。第二天才知道省农会、省总工会、省党校都被打了,死伤很多人。

“马变”发生后两三天,街上贴出了布告;看的人很多。究竟是哪个机关的名义出的布告,我现在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在布告上署名的是许克祥、王东原、周荣光、陈其祥、陶柳等五人,内容是讲共产党如何不好,一派胡言乱语。随后又成立了救党委员会,由仇鳌、萧翼鲲、陈其祥等三人担任常委。

“马日事变”后三四天,在小瀛洲席少保祠^①开了一次会,由各机关团体推派代表参加,共到了六七百人。我也是被派参加的一个。记得仇鳌、彭国钧、张翼鹏都参加了这次大会,由彭国钧担任主席,看来就是救党委员会召开的。开会后,首先报告“马日事变”

^①关于这次开会的地点,魏镇先生所记的和文斌先生所记的,互有出入,未知孰是?

经过；其次报告武汉国民政府已派鲍罗廷、谭平山、陈公博等来长沙处理这次事变，已经到了岳阳，我们要打电报不许他们来长沙。并说：共产党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千杀一千。这个电报稿在会上通过后，即要求张翼鹏签发给岳阳驻军师长周磐。张翼鹏开始不答应，经过一番纠缠后，他还是签了字盖了私章。这个“十万火急”的电报，是由张翼鹏的马弁骑自行车送到省政府译发的。一直挨了一点多钟，张翼鹏派去送发电报的马弁回来了，才宣布散会。

这次会后不久，大约是六月初，周瀾来了，由他代理省主席。周瀾来了以后，情况就比张翼鹏在的时候不同了。他嫌过去的屠杀不足，分派大批军队到各县去清乡屠杀；长沙城里也每天杀人多起，被杀的大多是青年男女学生。不久，唐生智也回来了，在省政府（今青少年宫）讲了一次话，省府各厅局的职员都参加了。他在会上批评了许克祥乱搞，违反纪律，同时也说农民协会的举动太过火。唐生智初来的时候，王东原等都很害怕（许克祥这时已经离开长沙），这时，大家才安了心。

何键为什么处心积虑要在湖南策动反革命政变呢？据我看来，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包围。醴陵的封建地主势力最浓厚，著名的大地主有史采岩，绰号“西山王”，他是三十五军参谋处长史民的父亲；陈盛芳，由作包工头而成为著名的工贼，家有田租六七千担，安源有一条街的铺屋；殷翠亭，即有名的殷老太爷；杨若源，绰号“光绪皇帝”，家有万多担租；这些把持县政的大恶霸地主，都与何键来往密切，关系很深。此外，凌璋的父亲凌恩凤，这个典型的封建地主，是何键的老师；著名的大恶霸文湘岩，是何键的同学；脑筋顽固的吴凯南、汤焕彬也都是何键的同学；这些人对何键的影响很大，如何键派人挖毛主席的祖坟，就是吴凯南出的主意；汤焕彬任何键的经理处长，可

以当面骂何键。第二，受反动军官的包围。何键底下的主要军官，如刘建绪，陶广、陶柳等人，都是同在游击队搞起的，何键受了他们的包围。一般下级军官在家乡买田置业的不知多少（何键的马弁文子明、帅保丹也各在醴陵乡下置了四五百租），他们受了农会的气，也到何键面前“伸冤诉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何键。第三，何键经常派有代表和蒋介石联系，如他离开安徽以后，即派王芄生（曾任三十五军参谋长兼安徽民政厅长）常驻上海，和各方面联络。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公开叛变革命，何键也就加紧策划在湖南发动事变，公开反共。蒋介石的反共，对何键的影响很大。何、蒋的反共活动，是互相呼应的。

张 平 子

“马日事变”以前，我在长沙办《大公报》。许克祥有个同乡彭定权，在他的团部当司书，其弟彭定义，为许的马弁。我们《大公报》编辑龚介眉，湘乡人，与彭定权兄弟里居相近，且有戚谊。因此，他们常来报社闲谈，有关许克祥的一切，我们都知道一些。

许克祥由湘潭调到长沙后，三十五军教导团长王东原知道 he 可以利用，时与往来，过从颇密。王东原一再鼓动许克祥，他说：长沙城里的工人纠察队是乌合之众，不难一举歼灭。我们举事以后，内有何键的袒护，外有绅民的拥戴，决无他故。许退而与其亲信部属密商，都主张事不宜迟，要马上发动，以免走漏消息。他走告王东原，并以电话邀陶柳、陈其祥等开会密商，公推许为总指挥，决定五日内动手，许部担任对革命机关的攻击捕杀，王东原部担任警戒，陶柳、陈其祥负责保护外侨及教会学校等。其时，《大公报》因与《湖南民报》笔战二十余日，省党部认为言论反动，责令停刊，但馆中职工均未散去。二十日晚十二时后，彭定权

忽然来到龚介眉房中，面色惊惶。龚问其故，彭说：“明晚我团与王东原部将搜捕共产党人，你报工人很多，内中必有共产党分子，若来捕杀，恐遭连累。故特来相告，希望你们早点站开。”龚问：“承你关心我们，非常感激，但不知详情怎样？”彭答：“事关军事机密，不能详告。”龚又一再追问，彭不得已，才将上述策划情形详告，并再三叮嘱不要走漏风声。

二十一日早餐后，《大公报》编辑龚介眉将先天晚上彭定权来谈的消息告诉了我。我想：既不可走漏风声，又要保职工安全，只有暂时遣散之一法。迁延到下午五点钟，在省党部工作的田波扬（我曾在兑泽中学教书，有师生之谊）来告，省党部准备通知《大公报》复刊。田波扬临走时，我附耳密告：“今夜将有大变化，你可暂时躲开，以防万一。”田见我出言突兀，转身返坐，求告详情。我笑着说：“没有什么，不过许克祥等将对你们有所行动，听说将在今晚爆发，但不知真会实现否？”田波扬听了我的话，即匆匆辞出。

这天晚餐以后，我吩咐报社职工，今夜有家的回家，无家的往朋友家借宿，将大门紧闭，只留三两个人看守。如此交代以后，我就带着妻子投奔岳麓山岳家湾宅。约在晚上十一点钟，忽然听到城里四处枪声如爆竹一般，知道许克祥果然起事了。二十三日，我过河回报馆料理一切，并请龚介眉往许克祥团部见彭氏兄弟，探听消息。据彭定权告龚：前晚许克祥派兵分路攻击省农会、总工会、省党校、省市党部等机关，被击杀的总共约四百六七十人，被捕的四十多人，共产党湖南省委的领导人如李维汉、夏曦、郭亮等都未捉到。

吴 剑 真

一九二七年五一劳动节以前，虽然蒋介石已在上海屠杀工

人，公开背叛了大革命，但长沙方面的革命空气很浓厚，工人学生组织宣传队，在街头或到农村去宣传；另一方面，反革命的气焰也很嚣张。有一次，我去看仇鳌先生，他约我第二天到他家去吃晚饭。我如约前去，记得来客中有刘岳峙、陈嘉任、廖维藩、陈介石、王凤喈、陈容、王次甫等人，所谈的尽是对各县农民运动的毁谤和一些反动消息，并有人诬蔑共产党跨党夺权。此后不久的某晚，我到市公安局看王次甫（局长），进门遇着总务主任萧佑汉。他对我说，刚才办完一件大事。又附耳告诉我，奉命捉拿“左社”分子，并把名单念给我听。我吃了一惊，原来大多数是那天在仇家吃晚饭的人。萧又告我，王次甫在得到逮捕命令时，先派人秘密送信给有关的人，然后亲自出马指挥捕捉。第二天报上登载“左社”反革命的消息，并说重要分子都逃走了。据我看，“马日事变”的促成，“左社”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光有许克祥等人的发动，内部没有人支持是搞不成的。“马变”以后，我曾就“左社”的事问过陈嘉任，他的答复很干脆：“这是共产党跨党夺权，逼得我们干的。”这句话充分显露了“左社”的反动本质。

“马日事变”前四五天，市面谣言很多，两方面的谣言都有。有的说，军队要解决农会、总工会，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有的说，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要合力解决许克祥、王东原的队伍，成立工农政府。二十日下午，我从南门外进城，路过学院街口，看见堆了砂包，架起机关枪，哨兵荷枪实弹，形势紧张得很。经过东茅巷时，总工会门前也是警卫森严，如临大敌。

我在“马变”发生的先天，就离开长沙躲到乡下去了。不久，听说省里成立了救党委员会，一般学校都关了门，只有中央军校三分校继续开办，仇鳌是救党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又兼三分校政治部主任。于是，我在六月初回到省城，走访仇鳌和谭常恺。

仇要我参加救党委员会担任青年部的工作，我不愿去，改由湘潭人言泽鹏担任青年部秘书。仇介绍我到三分校教政治课，以后又转到省党校，代理教务处主任。从此，开始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救党委员会是反动军官和政客合伙成立的，推定委员十二人，以仇鳌、萧翼鲲、陈其祥为常委。当武汉政府派谭平山、鲍罗廷等来长沙调解时，救党委员会曾在原省党部召开一次党员大会，借群众团体的名义发出电报，阻止谭平山等来省。谭平山等乘车到了岳阳，得讯后即折返武汉。周斓奉唐生智之命到长沙代理省主席，救党委员会又从各方面包围周斓，拥戴他作反动的靠山。直到唐生智回省，才解散救党委员会，成立了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委员有周斓、冯天柱、尹松乔、彭国钧、曹伯闻、李毓尧、王凤喈等。并恢复了省党校，唐生智自兼校长，派周斓代理校长。周斓当时代理省主席，实际很少过问校务，而由冯天柱负责，他算是代校长的代理人。

“马日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学生运动，竟采取野蛮手段，封闭各学校，勒令停办一年。当时除明德中学由于胡元倓的力争，照常开学外，其余的都在反动政府的命令下关门了，到一九二八年四月，才明令复校。复校后，借口加强“党化”教育，高中每周加授“三民主义”和“政治学概说”，初中加授“三民主义”和“政治常识”。并设立训育处，加强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教育，防止“赤化”；同时，规定学生入学必须填交志愿书和保证书，出了问题，保人要连带负责。学校内的国民党组织也建立起来了，省党部派人出席学校纪念周讲话，并在各校秘密收买学生（津贴学膳费），利用他们监视进步的教职员学生，操纵学生自治会的活动。反动军警闯进学校逮捕学生，也是由这些坏家伙做好引线的。

“马日事变”后，反动派实行清乡屠杀，特别是对青年学生杀

得很厉害。长沙城里差不多每天都有青年学生被惨杀。有一次，我在清泰街口碰见反动军队绑着十几个工人学生去杀，走头的是高级中学的一个女学生，桃源人，她边走边喊“共产党万岁”。另一次看见绑着九个青年工人学生去杀。最野蛮的是杀女学生时，杀头后将乳房割掉，裤子脱掉，我就亲自在教育会前坪看见过两次这样的事。有一天，北门外油铺街罗介夫住宅附近的一个木匠，早饭后出门去做工。因久雨初晴，街上泥水多，溅到衣上，他顺手将墙上一张已撕破的标语扯下来揩泥巴，被岗警看见了，指为共产党撕标语，押送公安局。陈其祥当时是省党校总队长兼长沙县县长，他在党校得到公安局的电话报告，即告知民政厅长兼党校总务处主任冯天柱。冯一手捻佛珠，一手拍桌大叫“就地正法”，陈即电话通知公安局马上处决。待到木匠家属请罗介夫到省党校找陈其祥保释时，被关的木匠已经斩决了。

屈 紹 琪

一九二六年七月到九月间，北伐军由广东打出来，一路胜利进军，势如破竹。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都有巨大的发展。七月初，长沙工人群众在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下，准备在城里武装起义，响应北伐军。后因敌军兵多械足，自己缺乏武器，又训练不久，没有实行。七月九日，受吴佩孚援助、跟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打仗的叶开鑫开始败逃，长沙人心惶惶，工团联合会组织了一千多工人，分别把守城内外各要道，维持城内秩序。叶开鑫从湘潭退到长沙的残部，多数都被工人保安团缴了枪。我那时在泥木业，也是参加缴枪的一个，记得一共收缴了三千多支枪。北伐军进长沙后，这些枪支先后被第八军缴去了，只剩下两百零四支破烂枪，放在东长街工团联合会（旧址就在现

在的蔡锷中路沙利文西餐厅。工团联合会改组为省总工会后，不久即搬到东茅巷湘汉旅社办公，这里改设矿区工会，也办过工农讲习所)。后来，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分别成立长沙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就把这两百多支破烂枪各分一半，作为主要武器。有些打不响的烂枪，经过机器工会的弟兄一修理，也就打得响了。

长沙工人纠察队共有五个分队，每个分队有四个班，每班十二个队员。其中第一二三分队是直辖省总工会的，归总工会掌握训练，队员穿着整齐的学生蓝布制服，扎蓝绑腿，一律带着长枪，背着蓝布子弹带。四五两个分队是分布在各个工会的，队员带着各式各样的武器，有长枪、短枪、鸟铳，也有梭镖、木棍和马叶子。工人纠察队员都是从各业工会中挑选出来的，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一色带着红符号、红袖章，个个精神抖擞，意气昂扬。除了这五个分队以外，有些工会还单独组织了纠察队，如泥木工会纠察队有一百多个队员，分驻在宝南街泥木工会和东长街老鲁班庙(旧址在现在的蔡锷中路五湖春茶社)，负责人是戴德和。

那时候，我们虽然是刚组织起来不久的工人，但操练起来，动作非常敏捷。记得我们驻在东长街矿区工会时，每天清早跑步集合到黄泥墩邵阳试馆坪里操练，从起床穿衣跑到操坪整队，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湖南的农民运动正处于高潮，农村中的斗争搞得翻天覆地。城市里也是一样，各行各业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地进展很快。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实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湖南后，反革命分子趁机大肆活动，到处造谣生事，破坏革命。十四日上午，湖南工

农商学各界在教育会坪举行反蒋示威和铲除反革命分子的示威大会，有几万人参加。会上，高呼“打倒蒋介石”、“解散全省团防武装”、“普遍组织农民自卫军”等口号，并当场处决了著名的大劣绅俞浩庆。我们工人纠察队参加了这次群众大会，负责会场保卫工作，看到反革命大劣绅的伏法，真是痛快得很。总工会还编了一个反蒋的歌，许多工人都学会唱了。这个歌很长，我现在还记得有这么几句：

“蒋介石是个大怪物，
党权运动起，
公然敢反对，
军事大独裁，
不听党指挥。
……”

“马日事变”以前，我是长沙工人纠察队第三分队分队长。我们分队四十八个队员，绝大多数是泥木业工会的，其余少数人是人力车工会、缝纫业工会、靴鞋业工会和活版铅印工会的。工人纠察队也有女队员，但在我们这个分队都是男的，个个身强力壮。因为是直辖总工会的，分队部就扎在隔总工会不远的小瀛洲普天春茶面馆后进塘边屋里。全分队四个班，有一个班扎在矿区工会，班长是靴鞋业工会的黄复生；半个班扎在设于皇仓坪原蚕业学校（后来是国民日报馆）内的党训班（即工运讲习班）；半个班扎在小西门石门坎海员工会；在分队部住的只有两个班，二十七个人（两班二十四人，加上我和新来的两个徒侄）。

五月十八日晚上十点钟左右，我带了一班人（都是全副武装的）到南门外社坛街电气工会去抓工贼，同时通知那边的纠察队员作好应变准备。我们走到隔学院街不远的交通银行门口，看到

学院街口堆起了麻袋沙包，中间只剩下一人宽的进出口，挑付担子也不容易进去的。街口站了许多武装士兵，来往逡巡，如临大敌。这些士兵看到我们十几个队员来了，突然端着枪跑上来把我们紧紧包围住，随即缴去我们的枪支，带进学院街三十五军留守处。敌人来势非常凶猛，我们没有办法逃脱，也来不及开枪抵抗，到了留守处，敌人把我们围在大门口操坪里，四周有枪兵看守着。这时，一个姓曹的副官出来了，他神气十足地骂我们是“暴徒”，要来抢劫他们的枪支。我对他说：“我们是到南门外电气工会去的。你们如果不相信，请打电话到总工会去问。”这个副官没有答话，傲慢地走开了，队员们都气得脑壳顶上要冒出烟火来。接着，我抑制住心头的愤怒，又向负责看管的刘排长交涉，要求发还枪支，放我们回去。他仍然不理睬。我们好几个队员一齐向他提出质问，坚决要求打电话到总工会去联系。敌人被迫答应了，一连打了两三次电话才接通。总工会得到我们被扣的消息，打电话向四集团军后方办事处交涉，才答应释放，并发还枪支。我们背着心爱的枪支，兴奋地走出学院街，回到东茅巷总工会，这时已是十九日拂晓了。

这几天，外面的谣言越来越多，形势越来越紧张了。三十五军留守处的士兵缴我们的枪；刚调到长沙来不久的独立三十三团许克祥部，也唆使伤兵故意和工人纠察队闹摩擦。我在小吴门正街、东长街、羊风拐角和军路侧近郊区农会前几处地方，都看到横行霸道的伤兵找工人纠察队闹事，第四分队有两个队员就在羊风拐角被伤兵打伤了，这两个队员是泥木业工会的。

十九日，李维汉同志召集了近千人的工人纠察队员作报告，他分析了当前形势，并布置大家化整为零，到号称“小莫斯科”的安源矿区集合。

从二十日清早起，我们背上全副武装，日夜在驻地附近轮流放哨、巡逻，准备应付事变，当时，我们三分队二十七个人，在东茅巷靠桂花井处布置了三个，小东茅巷口两个，登隆街口四个，小瀛洲同春园附近两个，其余十六个人负责巡逻。担任放哨的队员，个个手握着枪，连饭也是送到街头吃的，好象随时要发生什么事情一样。市面上也紧张起来，桂花井、登隆街一带的铺子，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就老早关上板子了。二十日上午，我到局关祠省农民协会找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戴金凡联系，叮嘱他们要百倍提高警惕，严防发生事变。路过东长街时，又到矿区工会找黄复生，请他注意提高警惕，不可疏忽。老黄答复得非常干脆：“人在枪在，人不在则枪不在！”

二十一日，我们继续担任警戒。我家住在育婴街长庆园新做的房屋楼上，同住的有三四家，都是泥木业工会的。我在外面忙了一天，晚上十点多钟回到家里，进门就告诉家里的人：外面空气越来越紧张，如果夜里发生事情，赶快下楼躲到新做的戏台底下去。我刚离开家转回东茅巷去巡查，走到育婴街靠东茅巷口，忽然听到后面街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隐隐约约看到一队枪兵端着枪跑过来。我急忙往前跑，和在登隆街放哨的队员取上联系，大家立刻散开来，卧倒在地上准备射击。敌人冲拢来了，双方开枪打了起来，片刻间，从苏家巷又冲来一群端枪的士兵，青石桥那边也冲来了一群枪兵，敌人有计划地向总工会包围进扑了。我们几十个队员，就在东茅巷附近和敌人接上了火，敌人的子弹一梭一梭地飞过来，枪声越响越激烈，我们卧倒在地上射击，连头也不敢抬起来。这样，在街头战斗了十几分钟，有两个队员已经被打死了，我们寡不敌众，又没有可以依托射击的地方，只好连滚带爬地往总工会退。我很吃力地跑进总工会，就放开嗓子大喊：“同

志们，敌人打进来了，快跑，快跑！”因为他们都正在开会，个个手无寸铁。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左脚上被流弹打伤了（现在左脚上还有四五处伤疤）。敌人跟着冲上来，密集的步枪声和机关枪声象放鞭炮一样，我和另一个队员急忙转身往小瀛洲分队部跑，不知怎样竟跌在塘里了。好在塘水很浅，我带着枪爬上塘南边，跳上屋顶，躲进小瀛洲同春园后面一家姓欧的老百姓家里。一个工人模样的青年人，拿来一套便衣，给我换掉了血迹模糊的湿透了的蓝制服。这时，听到城内四处响起了枪声，敌人已经大动手了。我非常气愤，同时又为队员们耽心，真象万箭穿心地一样难过。二十二日天亮后，我才由欧家化装跑出来，隐蔽在近郊区。

几天以后，我又混进城来，才知道二十一日晚上的情况是这样：当晚十点过后快到十一点的时候，驻扎在小吴门外老炮队一带的独立三十三团许克祥和驻扎四十九标的三十五军教导团王东原、三十五军留守处主任陶柳等反动派，纠合一千多人分途袭击了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党训班和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机关，遭到工农武装力量的奋勇抵抗，发生激烈的战斗。省总工会是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里里外外打死了七八十人，二十七个纠察队员，连我在内只剩下七个，有二十个人壮烈牺牲了（生存的七人中，现在只知道一班长吴玉坤住在长沙河西桃子湖，其余五人则生死莫明）。现在东茅巷登隆街口没有拆动的老墙壁上，还隐约看到许多的弹痕。我的弟弟屈绍裘，当时在农民自卫军担任中队长，据他告我，这天晚上，省农民协会和小吴门正街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遭到反动派军队的围攻，农民自卫军奋起应战，这两处地方打死的共计一百多人。有的人是从屋顶上翻墙脱险的。皇仓坪的党训班也被反动派攻击，死了很多人，三分队派驻那里的七个队员全部牺牲了。此外，省党校、矿区工会、近郊区农民协

会都死人不少。泥木工会的纠察队，在黄泥墩一带放哨，和敌人发生接触，苦战多时，牺牲了二十多个队员。

“马日事变”过后六七天，我又化装秘密出城，在长沙东乡檀木岭会到了朱有富，又在福临铺羊角它找到了杨福涛和一部分撤退下来的工人纠察队员。我们和当地农民协会积极进行反攻长沙的准备。五月三十一日，浏阳农民军攻到了长沙小吴门外二里牌、阿弥岭一带，与反动派军队短兵相接了，打得很激烈。我们也参加了这次攻城战斗。由于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下了“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静候政府解决”的可耻命令，被迫停止攻城，已得到的胜利果实白白地送掉了。从此，湖南成了“白色恐怖”的世界，反动派灭绝天良，在各地大举清乡屠杀，长沙城里差不多每天听到杀人的消息，家家户户被迫贴上了“努力铲共”的白条子。我还记得，“马日事变”以后，许克祥等的救党办公处，做了一首反革命的歌，让小孩子在街上大唱特唱。歌词是这样的：“巴巴头万万岁，瓢把鸡婆要枪毙。男女学生一头睡，养出儿子当纠察队。工会你莫凶，三十三团用炮冲；农会你莫恶，我们要你的脑壳。”看了这首歌，就可以看出许克祥等人的反动。

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这一笔血海冤仇我们一定要牢记住，可千万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

影 像 书

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前，我在国民党湖南省党校学习。当时，这个学校是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革命空气很浓厚。党校学生共有六个中队，每中队一百二十人，其中五个中队是男生，一个中队是女生，一般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附设

农民运动讲习班，约有三百多人，全校师生共计一千余人。

“马日事变”的前两周，党校当局大概是为了应付紧急事变，曾发布命令，不准学生请假外出；同时，大部分学生配发枪弹，加紧训练，并加强了门岗守卫，严密布置内哨。

五月二十一日晚上，星光黯淡，乌云层叠。部分同学荷枪实弹，警惕地守卫着。约在十时以后，从学校的西南方面传来时稀时密的枪声。一会儿，校门口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同学们从睡梦中惊醒，很多来不及穿衣着履，也没有上级的命令，纷纷向校门口蜂涌奔驰。

反革命武装部队企图一下子解散省党校，遭到党校同学的英勇抵抗，一时不能得逞，遂转而利用教育会坪的矮围墙作掩体，架起机枪，向校门口的同学猛烈扫射。同学们被机枪狙击，无法冲出。一时校门口的过厅内被人群堵塞，既不能冲出去，又不能折回来，以致遭受惨重伤亡。敌军冲进校门，以白刃向同学们刺杀；还有少数同学，赤手空拳与敌搏斗。在敌兵喊杀连天的威逼下，同学们向校内四处逃散，顷刻间又不约而同地大部分集结操场，纷纷由土山上或者缘厕所屋顶爬到后面靠水风井的一道丈多高的围墙上，有的亡命跳墙，有的抱着电线杆滑下去。墙外敌军哨兵，先喊口令，继以开枪射击，又有不少伤亡。一片呼号呻吟之声，惨不忍闻。

我系逾墙缘电线杆而逃脱者之一，落地后径向黑暗无人的方向疾行，转过两道弯，跑进一条死巷子里头，再不敢回头另找途径。忽然听到巷子口上有几个敌兵在交谈他们冲进党校进行劫掠的情况。有的得意洋洋地说，从女同学手上抢得金戒指；有的不甚满意地说，在寝室里翻箱倒篋，好不容易搜得一些银洋和钞票。一会儿，有一对脚步声越来越近，在转角处用手电筒向巷子里照

射一遍，我因紧贴一户人家的墙门死角，幸未被他发现目标。

枪声渐渐稀疏了，隐约听到远处传来的口令声。我偶然蹲在地上摸到一根楠竹，靠墙直竖起来，使尽生平气力，缘竹而上，爬上墙垛。直到天色大明，见楼房内有人披衣起床，才爬屋缘梯而下，和屋主相见之后，告以遇难脱险经过。谈话中得知他是楚怡学校英文教员曹老师。他叮嘱我找一处可靠亲友暂住，迅速设法回家。我在曹家吃过早饭后，打算先去党校寻找行李。走出巷口，钻进人丛中，路过水风井一带，见昨夜跳墙地段，遗尸数具，用草掩盖着。转弯行至教育会坪前沿马路，纵横摆着几十具尸体，围观者甚众。党校大门有敌兵把守，不敢进去，寻找行李的念头只好打消。于是，转道至东长街伯母家，相见欷然，留住两日，送我几块银洋，一套衣服，逃亡武汉。

张 锡 藩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马日事变”以前，我在省立高级中学教务处工作。这个学校是由本省几个省立中学、师范学校的高中、高师部合并成立的，由罗驭雄担任校长，谭常恺任教务长，缪岷山任总务长，校址在南门外书院坪（今第一师范），学生有近千人。当时，全省农民运动、工人运动正在蓬勃高涨，学生运动也同样发展很快。高级中学是长沙学运的中心，进步学生控制了学生会的活动，教职员学生经常到校外去参加示威、游行、演说、贴标语，做化装宣传工作，革命的空气很浓厚。呆在学校里读死书的，只是极少数的人。

五月二十一日晚上，大约在十一点钟的时候，忽然听到城里发出枪声，起初响得很密，直到半夜过后才慢慢稀少。第二天，学生外出上街的，不少人被反动军队殴打，又看到四五具被屠杀

的革命烈士的尸体，摆在学校旁边尚未安埋，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教职员学生因而离校四散。剩下的学生只有两三百人，有的外出就改穿便服，不着学生装，免遭不测。还有少数低级职员留在学校，我是其中之一，住在进校门不远的一个小房间里。

事变后一星期左右，有一天清晨，天还没亮，许克祥的反动军队约一连兵力，突然包围袭击学校。一时枪声大作，并吹冲锋号，喊杀之声不绝。我听到枪声之后，立即披衣起床，躲到附近厕所里。反动军队很快就从后门打进来了，到处横冲直撞，其势汹汹。在学生第四宿舍搜查时，翻箱倒篋，许多学生身上的手表、钢笔、金钱都被搜去了。女生多被殴打。不久天亮，反动军队下令全体教职员学生都在学校大门前坪里整队集合，听候点名。这时，大家只好胆战心惊地站在坪里，一个军官拿出一份黑名单，一个一个念，凡点了名字的从队伍中站出来。当场捕去进步学生张维、袁慨两人（后来不久，这两个学生都被惨杀了）。经过这次事件，人人自危，不知什么时候会有大祸临头。

又过了一星期左右（具体日期已经记不清了），反动军队第二次到学校搜捕，形势更加严重。虽然经过第一次搜捕之后，学生提高了警惕，但是由于斗争经验不够，这次被捕的比第二次更多，达十余人。其中有原第一师范转来的学生傅某，系学生会负责人之一。此外还有哪些人，现在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这次被捉去的十多人，后来大都被杀害。

反动军队为了屠杀青年学生，后来还到学校进行过第三次搜捕。这时，我已离开长沙回到浏阳原籍，具体情况，无从得知。

“马日事变”以后不久，反动派为了彻底反共，镇压学生运动，勒令全省各公私立学校一律停办，有的私立学校改办补习班，公立学校则一律关门。省立高级中学也跟着关门了。

杨 敏 先

一九二七年三四月间，何键派王东原来长沙成立教导团。当时，我刚由三十五军汉阳学生队毕业，派到教导团第一大队见习。教导团团部及一大队大队部刚由学院街后方留守处迁入四十九标靠西边的二三栋营房里。一大队大队长是魏镇先生，这是一个学生大队，学生还没有招收进来，只有我们第二中队有几十个学兵，是由第八军教导团徐权那里拨来受训的部队中、下士班长和老兵。队长没有来，由一个中尉队附王远青负责。我们几个见习官，担任分队长职务。

五月二十一日晚饭后，上级有命令不准出去。随后宣布当夜有友军缴纠察队的枪，解散总工会；我们担任自卫警戒，断绝交通，不许有人在我们的警戒线上出去。戒严的区域是由五十标、协操坪、四十九标沿便河之线。我带了我们队上的学兵在便河边一带担任警戒，入暮后，就断绝了行人，整夜也没有人和部队从我们警戒线上出去。在执行警戒任务时，王东原和魏镇先生曾来便河边巡视过。大约在深夜十一点钟，城里的东南部分开始先响枪，有许多枪是朝天打的。经过一两个钟头的激烈枪声之后，就进入沉寂或断续的枪声中。一直到第二天天亮后，浏阳门、小吴门外一带还有枪声。

这次事变，许克祥是临时指挥官，他的部队是进攻部队。陶柳（教导团二大队大队长）担任城防指挥和守卫学院街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驻学院街旧学台衙门。学院街口堆起了麻袋沙包，满街布有岗哨，并派有巡查部队，巡查街道。在这次事变中，反动派疯狂屠杀，以小吴门正街曾公祠、省党校、总工会等处死伤最多。具体的数字，无从统计。

陈 铁 坚

“马日事变”发生以前，三分校的革命空气是很浓厚的。当时，石醉六担任校长，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如李维汉、夏曦、李达、郭亮等都兼任政治教官，徐特立、蔡和森等也来作过大报告。国民党教官作大报告，学生多不爱听，在底下玩石头；如果是共产党教官作报告，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毫无倦容。

五月二十一日晚上，许克祥等发动反革命政变，三分校也是他们攻击的重点之一。这天晚上十二点钟的时候，城里的枪声响了，紧接着，枪声越响越密，响到我们学校附近了。我们在学校里，隐约听到外边穿皮鞋的急促的脚步声，知道是被军队包围了。石醉六听到枪声后，早已逃走，在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也不知去向。第二天天亮后，校门口还架了两挺机枪，不准教职员学生出去。后来警戒松了，我到城里看看。总工会办公地点东茅巷湘汉大旅社，经反动军队捣毁后，翻箱倒篋，狼狽不堪，坪里躺着三四具尸体，出来的巷口上也有几具死尸；此外，茅亭子附近也打死了几个人；这都是我亲眼所见的。其他城里城外听说也打死很多人。

五月三十一日，浏阳农民军几千人攻打长沙，由永安市经黄花市到达张公岭，先头部队冲到了五里牌、杜家岭一带。反动派非常惊慌。但是，下午起枪声稀少，到黄昏时候就没有打了。后来才知道是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令取消农民军的这个革命反击行动。

六月六日还没有天亮的时候，长沙学联负责人田波扬和他的妻子陈昌甫，被反动派惨杀在火车站的荒坪里。田波扬临刑时坚贞不屈，路过小吴门还大喊“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田波扬是浏

阳人，和我家相距不远，又是中学先后同学。他在六月初被捕后，我基于同乡同学的关系，曾邀集浏阳学生三十多人，打报告到铲共委员会要求保释。报告是由我送到张敬兮那里的（因为当时他担任三分校地形筑城教官），他很惊奇地对我说：“你们不要管这些事！”过了几天田波扬夫妇就被害了，天亮时杀的，到黄昏时还不准收尸。这天晚饭以后，我邀了浏阳同学萧振汉、罗则鸣等前往帮助草草收殓。

“马日事变”以后不久，省政府代主席周斓来兼任三分校教育长；随后，仇鳌来当政治部主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记得在七月间的一个下午，反动派在三分校捉去两百多人，关在复兴街监狱里，归铲共法院审讯。听说是在大官园抄出共产党人的名册，按名册逮捕的。其中有一些人被反动派杀害了，现在想起的就有安徽人李烈和浏阳人李琥，他们都是在火车站荒坪就义的。还有一个没被杀掉冲监出来的孙代农。

刘 德 璩

一九二七年春，我在第一师范初师部读书。当时，一师高师部在南门外书院坪，初师部并入稻田女师，男女同学。稻田女师隔东茅巷不远，省总工会办公地点就在东茅巷湘汉旅社。

五月二十一日晚上十一时许，我们已经熄灯就寝，忽然听到枪声大作，大家从梦中惊醒。这时，激烈的枪声从东茅巷一带传来，有人就觉察到是总工会发生了事故。女同学起来躲到床底下，比较进步的男同学则组织临时纠察队，四处巡逻，轮流站岗，大家都通晚没有睡觉。

第二天，学校临时纠察队继续巡逻站岗，不准自由出入。有个别工友、同学到校外探听情况回来，有的说，昨晚总工会、农

民协会、省党校等处被攻打，死伤多人；有的说，军队正在到处捉人，街上还有不少死尸；有的说，穿学生装的特别是剪了发的女学生上街，不是被军队拦阻，就是遭到侮辱。在这种恐怖气氛中，男女同学都不敢外出。这天傍晚，我换上便装，到校外探听消息，看到马王街、东庆街一带商店、住户，门窗紧闭。在东茅巷与马王街接口处，摆着工人模样的两具死尸，柑子园口摆着一具女学生模样的尸体，脸上血迹模糊，看样子是被叛兵用刺刀刺死的。反动派军队到处巡逻放哨，路上行人稀少，一片凄凉景象。这是“马变”晚上和第二天的情况。

美 国 概

“马日事变”时，我在国民党湖南省教育厅工作。教育厅地址在现在的新华电影院，和省党校是贴邻，党校就在现在的省文化局和教育厅。

“马变”前几天，外面风声很紧，谣言很多。二十一日晚上，约莫十一点钟的时候，城里枪声四起。我住在教育厅内，寝室靠近党校这边，清楚地听到反动派军队向党校打枪，也听到捣毁东西和捉人时的惨叫声。这时，我躲在寝室屋角里，怕流弹伤人。省农民协会在局关祠曾公祠（今长沙市十四中学），那边的枪声也特别厉害。许克祥这次叛变，袭击了省农会、总工会、省党校等处，到处捉人，大肆屠杀。省党校打死的人不少，跑出来的也有，捉去的占多数。在捉人时，彼此相持不下，喊叫声不绝。直到午夜过后一两点钟，学校里才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了。第二天，党校里冷清清的，没有一个学生。小吴门正街船山学社内（今中山东路中山图书馆内，当时总工会在此办有工运训练班）死了二三十人。东茅巷省总工会也死了不少的人，大街上打死的人很多，反

动派对有共产党嫌疑的人都疯狂屠杀，这是“马变”当晚和第二天的情形。

“马日事变”以后，成立了各种惩共组织，到处捉人屠杀。刚才有位先生谈到田波扬就义的情形，确是事实。有一天，正是黄昏时候，我到环城马路散步，忽然听见杀人号声从肇嘉坪吹出来，绑着六个青年学生去杀害。其中有一个女学生是我认得的，名叫张微，是桃源女师学生。这六个青年学生当时就在马路当中用大刀砍杀了。浏城桥下靠车站这边有一块斜坡，也是杀人的地方。有一次，我看见反动派绑着几个青年在这里枪毙了。过了几天，我走到浏城桥，又听到杀人的号声，这次绑了十几个人，就在车站附近荒坪里被杀了。溁浦有个姓夏的青年，也是在小吴门外就义的。后来，清乡司令部成立了，杀的人更多。有两句话当时很流行：“宁愿错杀千万，不可漏走一人”，可作为充分的证明。

李 仲 任

一九二七年，我任三十五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马日事变”之前，部队驻在岳阳，任务是维护后方交通。其时在岳阳驻扎的部队很多，四乡农民已有组织，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马日事变”发生以后，武汉政府派了鲍罗廷、谭平山、陈公博等人来湘彻查。他们到了岳阳，被我们的部队扣留，师长周磐打电话给张翼鹏，请示如何处理。当时长沙方面回了电报，指示处理办法。周磐看到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其势迅猛异常，风声很紧急，于是把他们放回武汉去了。过了一两天，接到张翼鹏的电报，要周磐派一团人到长沙维持治安，师部指派第三团去长沙。我们于五月二十四日由岳阳搭火车赶到长沙，团部驻在旧藩台衙门，部队分驻小吴门、浏阳门一线。团部由特务连驻守，卫门口堆起沙包，

架了重机枪，戒备很严，为的是以息事宁人的态度保存实力。我到长沙后，和王东原、余湘三、晏国涛等人都会过面，他们在谈话中对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很不满。我们的部队名为维持治安，实际上是来保护反革命秩序的。在几个星期以后，有大股农民赤卫队由浏阳方面猛扑长沙城，就遭到我们的顽强抵抗。

杨 经 武

一九二七年春，我在长沙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带职第二大队任上尉训练员。三分校校址在现在小吴门外的经纬新村，原湖南陆军讲武堂旧址。

五月二十一日晚餐后，大队长文九德对我说：今晚有动作，许克祥将派兵解散省农会、总工会等团体，并逮捕各首要人犯。当时，三分校学生是有枪无子弹的，文九德要我挑选二三十个学生，到校本部去领子弹，担任本大队的警戒任务；并面嘱严加戒备，毋稍疏忽。另外，又派上尉训练员杨亚能率领武装学生三十名，协同校本部警卫排，担任校门口警戒任务。第一大队的武装学生，担任校外周围警戒任务。我带领学生布置妥当后，约八时许，本大队训练员张起舞从外面吸鸦片烟回来，对我说：城里四处戒严，断绝行人，沿街岗哨满布，商店都关了铺门，形势紧张，如临大敌。大约十一点钟，市区枪声四起，响个不停，直到第二天清早才解严。许克祥的堂兄弟许支亚来告诉我们：昨晚把总工会、农会都取消了，纠察队的枪也收缴了，主要负责人没有抓到。

“马日事变”以前，省农民协会办有一个政治训练班，地点就在现在中山东路的省中山图书馆。三分校派我到训练班兼任军事助教，每周去教一次操。事变后第二天，五月二十二日是星期日，

我到训练班去看，坪里死了十几个人，鲜血淋漓，惨不忍睹。

许克祥是湖南湘乡人，行伍出身。一九一二年投入宝郡守备队当兵，递升至上尉连长。一九二〇年冬率部投奔沅陵镇守使蔡巨猷，被擢升为该部营长。当时蔡部割据湘西，专为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特商护送烟土。许妻出身青楼，善于逢迎，勾结烟商，获利甚巨，因而在湘乡购置田产很多，成了大地主。后来又投奔川黔联军总司令袁祖铭，升充旅长。一九二七年一月，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在常德捕杀袁祖铭后，将许克祥的部队收编，委他为独立三十三团团长。“马日事变”前，许部由湘潭调到长沙，驻在小吴门外炮队坪。事变发生后，许克祥又派营长许振初，率兵一营开往湘潭、湘乡一带，进行清乡屠杀。六月半间，听说唐生智要查办他，又把部队带往郴州，投奔范石生，由范委充该部独立三十旅旅长。一九三〇年秋，蒋、桂、冯、阎中原大战，许克祥奉蒋介石之命，率部开往陇海前线，与冯阎作战。以后升任国民党第二十四师师长，开赴江西南丰、南城等县，参加反共内战。

谢 国 馨

“马日事变”以前，我在长沙一面教课，一面担任《商民日报》主笔。《商民日报》是国民党省党部商民部办的，社长周海龙，主编伍芋农。当时，省党部是左派领导的，这个报纸配合《湖南民报》，做了不少宣传工作。

一九二七年春季，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在乡下打土豪劣绅，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全部推翻了。毛主席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正是地主豪劣大肆攻击农民运动，说乡下“糟得很”。这种议论由乡下反映到城里，又由城里反映到部队。我有一个表弟在李云杰部当连长，他的伯父是安化的大土豪，

跑到连上作客，侄子招待很好。象这样，乡下土豪劣绅同军队有一点关系的，都跑出来了，到处造谣煽动，惟恐天下不乱。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夏斗寅又在武汉叛变革命。这时，长沙城里已有风声，街谈巷议常常谈到这个问题。

“马变”前几天，风声很紧急，大家意识到时局将有变化。二十一日晚上，我到报社去，路上已经戒严了，满布岗哨，紧张得很。十点钟左右，街上的交通完全断绝了。我躲到落星田新化人晏某家里。大约在十一点钟的时候，许克祥的部队发动叛变了，打了几个钟头，总工会、农民协会都遇到抵抗，死伤的人很多。自此以后，浏阳门外每天都有屠杀，被杀害最多的是青年学生，其中有小到十四五岁的，真惨得很。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每天都听到屠杀的消息。杀人的刽子手，除许克祥外，还有公安局长周安汉、长沙县长陈其祥等人。有的杀人布告，是许陈两人会衔出的。

左 仲 文

“马日事变”是何键策动的。

一九二七年二月间，何键任三十五军军长，我是该军第二师（师长刘建绪）的军需处长。这时，醴陵的大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李昌楨（号子循，李隆建之父）、殷萃亭、杨若源、傅熊湘等人也都到汉口会见过他，向他反映了醴陵农民运动的情况，无非是别有用心造谣诬蔑。这对何键策动“马日事变”是有直接影响的。听说后来长沙方面也派有代表去汉口会见过何键。

这年三月某天，我在汉口大同旅社会见了唐生智总部政治部某科长和别的一些人。闲谈之间，谈到湖南农民运动能不能搞成

功的问题，有的说不能成功，因为湖南军官在外面的很多，怎么会容许他们搞成器。这位政治部科长说，可以成功的，湖南军官虽多，主要的是何键；何键的部队，只要把刘建绪的几杆枪提掉，余剩的就不成问题了。我于四月间解饷到许昌前线，同刘建绪讲了上面这番话。刘要我转去时到驻马店下车，告诉何键。我在驻马店下车后会见了何键，把汉口听到的议论告诉了他。他沉默了一会，抬起头说：“不要紧，马上会转变。”由此可见，何键对于策动长沙的反革命政变，是早已胸有成竹的。

一九二八年冬，我回到长沙，有一次同余湘三谈及“马日事变”，我说：人家说“马日事变”是何键策动的，我不大相信。当时，何键在驻马店，许克祥在长沙，相隔这么远；张国威虽在长沙，又不会代表何键去联系。余湘三大言不惭地说：“你哪里知道，许克祥与何芸樵（何键别号），一南一北，当中联系都是我一个人。”

刘 君 武

“马日事变”以前，我在三十五军第二师任营长，驻扎河南。当时，醴陵县几个著名的大恶霸地主，如陈盛芳、殷萃亭之流，由武汉一路跟到河南，和何键搞得很密切。另一个地主易雨仙，由醴陵乡下跑到汉口，又跑到何键的队伍里，硬要来当兵。象这样把部队做防空洞，借以逃避农会斗争的，并不是个别的现象。

“马日事变”的前一天，许克祥把派在省府担任警卫的一排人撤走了，又派其团附李华龄带了枪兵把守电报局（张翼鹏在事变后拍给唐生智的电报，是他亲自到电报局拍发的）。由此可见，许克祥发动这次事变，事前是计划很周密的。

屈 子 健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工人，湖南的反动派受到鼓舞，也就乘机活动，阴谋破坏革命。国民党右派刘岳峙等组织的“左社”，大肆散布谣言，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乡村“共产共妻”，搞得满城风雨。

是时，我在小吴门外中央军校三分校政治部担任秘书。“马变”以前，三分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空气是很浓厚的。四月中旬起，在教育会坪召开群众大会时，三分校政治部常常组织学生化装宣传队，展开街头宣传活动。

但是，反动派的气焰也更为嚣张。何键三十五军的伤兵在长沙城里经常向工农群众找岔子。记得是五一劳动节那天，我在水风井亲见一群伤兵拿着铁棍截击游行示威的农民自卫军，打伤了许多农民。到了五月半间，城里的谣言更多，人心惶惶不安。反动派军队在街头堆置沙包，架设机枪，好象就要发生什么事情一样。这时，三分校政治部仍然出动学生宣传队，到街上写墙壁标语，流动讲演。十九日，工人纠察队押着一个造谣的反革命分子在街上经过，突被三十五军留守处的枪兵拦截，发生纠纷，吓得附近做生意的连忙关铺板。

五月二十一日晚上十点钟以后，许克祥、陶柳等反动军官，带兵分途向省市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省党部、省党校等革命机关进攻，工人纠察队仓卒应战，终因寡不敌众，没有打退反动派的进攻。反动派还捣毁了特别法庭，打开监狱，放出被押的土豪劣绅。第二天，这些家伙就到处耀武扬威，寻仇报复。

“马变”这天晚上，我在东长街家里忽然听到砰砰砰的枪声，夹杂着机关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才知道是发生事变。我到

大门口从门缝往街上察看，反革命军队急驰而过，喊杀连天，街道上不见人行。等到天亮，枪声停止了，街上冷清清的，行人稀少。下午，漫步街头，看到反动军警到处捕人，局关祠、东茅巷一带血迹遍地。三分校校长石醉六和在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人都不知去向，学生中平日色彩鲜明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都下落不明了。教育长余范传等幸灾乐祸，现出了原来的反动面貌。

五月底，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派周斓回湘代理省政府主席，并兼任三分校校长。周斓和余范传劝我仍在政治部工作，我坚决不干。他们找了仇鳌来当政治部主任，我于六月一日办完移交，悄悄搭车到武汉去了。

谭 道 平

一九二七年，我在长沙中央军校第三分校学生队第三大队受训。五月二十一日深夜，突然从人声喧嚷中惊醒，听到外面枪声四起。这时，全体的同学都张皇失措地从床上爬起来，对这突如其来的枪声感到惊愕。忽然大队值星官走来，向大家宣布：“这是铲除党内不良分子，与大家无关，不要惊慌，不许外出。”并要大家都到楼下教室集合，清查一下人数。约莫经过一小时左右，外面的枪声很稀少了，才回到楼上寝室去睡觉。实际上谁也睡不好，都是呆呆地等待天明。

第二天清早，学校不许学生外出，只有一部分带职队的学生是现役军官，他们的行动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外出。从他们的谈话中，才知道许多革命机关如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和省农运讲习班等都被袭击，死伤了许多人，也逮捕了许多人，罪名是“阴谋暴动”。又有人说，皇仓坪的一个党训班被封闭，里面打死了人。后来我和好几个同学曾去看过，屋里空无一人，什物

零乱，有两个死尸僵卧在血泊中，一个死在电灯总开关附近，旁边还有一张楼梯。据说在事变发生时，那人去关电灯，被枪兵杀死的，情况很惨。我们经过的地方，凡是重要的街头巷口，都有双人站岗，似乎特别注意我们的举动。过去非常活跃的市面，现在笼罩着恐怖的阴影，好象大祸又要临头了。

“马日事变”以前，三分校的革命空气是很浓厚的，有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到学校作过报告，受到学生欢迎。后来听到有人说，在事变发生的当晚，三分校的前后门都有许克祥的军队监视，还架了机关枪，因此，值星官宣布不许学生外出，以免发生事故。事变发生时，有部分学生逃走了，有些人被逮捕。我还记得被捕的人中有李斌、李烈两个同学，都被反动派所杀害，并枭首示众。

三分校校长石醉六，在事变的第二天就不见了，由教育长余范传代理。当时有人说，石校长有共产党嫌疑，因为他作报告时，经常领着教职员学生喊口号：“革命的站拢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事变后约莫半个月，一天的早晨，忽然听到学校外面的冲锋号声和喊杀声，越来越逼近校门。大家拥到校门口观看，有七个共产党人就在附近火车东站北首的空坪上被杀害了。其中有田波扬夫妇。田波扬曾在长沙学联工作过，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威信，我们听到他被杀了，内心非常难过。

经过“马日事变”，整个湖南处于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三分校也不例外。过去那种生动活泼的气氛被扫得一干二净，政治讨论停止了，文娱活动取消了，革命口号也不再喊了。整个学校是死气沉沉的，人们好象失去了灵魂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李 人 珍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在长沙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我的姑父

陈经渭，醴陵八步桥人（抗日战争时在家病故），当时充任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直属连长，驻扎南门长郡中学，我经常到他那里吃饭玩耍。“马日事变”前三天，长郡中学外面忽然堆设沙包，如临大敌。我问姑父这是什么原因，他对我说：“总工会纠察队要缴我们的枪。你们不要再到外面游街、贴标语，乱喊乱叫，当心掉脑袋。”

“马日事变”那天晚上十一时许，他率领他的部队，由南门正街经县正街，马王街到东茅巷夹击省总工会。事变后第二天，我到 he 那里吃饭，全桌八人，除我以外，都是军人。在吃饭时，我的姑父得意洋洋地谈到昨夜攻击总工会的情况，说工人纠察队不堪一击，他们在攻击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另一个军人说：“何老总（指何键）来电后，许团长对在长沙的部队进行了几天的联络部署，一切做得很周密，最后才开始动手。”

朱 明 章

一九二七年四月，我由三十五军汉阳学生队毕业，派到新成立的教导团见习。教导团是这年五月初在长沙成立的，驻扎在小吴门外四十九标。全团三个大队，我被分配在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担任分队长职务。大队长是魏镇先生，第一中队和第二中队是学兵，第三中队是学生。一中队队长马某，二中队队长邓德璋（长沙人，保定军校毕业），队附王远青，下辖三个分队，分队长是杨敏先、朱明章等。全大队开始只有几十个学兵，以后增加到三四百人。

五月二十一日晚饭后，我们奉令带领学兵出发担任警戒任务，警戒区域是长沙北门外自经武门、四十九标、五十标、便河边以至湖迹渡之线。我带了三十来个学兵在湖迹渡附近渡口和山头担

任警戒。当时，经武门口架了几挺重机枪，是教导团第三大队担任警戒的。约在夜里十一点钟，城里开始响枪了。但在我们的警戒地区，却没有动静。我们警戒了一通夜，第二天上午才撤回来。

“马日事变”前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策划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是，从分配我们担任警戒任务来看，王东原等与许克祥是互相策应、配合一致的，他们并没有置身事外。

李 淑 一

一九二八年北伐军进抵湖南，柳直荀同志被任为湖南省政府委员，并被选为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以主要精力从事农民运动。那时省农民协会设在局关祠艺芳中学里面。

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的前两天，他叫我准备搬家。因为当时情势紧张，蒋介石已公开背叛革命。当晚他就没有在家歇宿。五月二十日下午，他来到顺星桥（我父亲的住所，我是这天上午搬回娘家的），和我作别。想不到那一次我就和他永诀了！

五月二十一日深夜，忽闻枪声四起，火光冲天。我听到局关祠那边机关枪和步枪声响个不停，子弹在空中呜呜地飞过，知道事情不好了。这时，全家的人都起来了，提心吊胆地坐在堂屋中静听，半岁的孩子躺在怀中吃奶，因为奶水不够，哇哇地哭起来。外面的枪声越响越密，又不敢出去探听。好不容易挨到天亮，枪声稀了，请人到省农民协会附近去探听，据说农民协会里里外外到处都是尸首，但是没有柳直荀。

后来，据直荀的妹妹告诉我：“马日事变”第二天的早晨，直荀化装由长沙坐小火轮到湘潭，拟与湘潭方面同志集结武装力量反攻；因被人发觉，又逃到浏阳。在浏阳乡下被人捉了，假称传

教的牧师获得释放。只好逃回长沙，在火车东站附近厕所内伏匿一天，当晚搭车到武汉。那时武汉政府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准备与蒋介石合流，形势越来越紧张。直荀和许多同志一道撤到江西，在南昌参加了八一暴动。

张 知 非

“马日事变”，当时社会上只知倡乱的是许克祥，其实，许不过是一只走狗。这次事变完全是何键所策动的。

我与何键在小学同学两年，与何的秘书长凌璋在湖南高等学堂同学四年。当我在高等学堂读书时，何在王先谦所主办的崇古学堂读书。该校设在岳麓道乡祠，靠近高等学堂，我与何仍时常来往。因此，我深知何键与凌璋的思想向来是很顽固，很落后的。凌璋的父亲凌恩凤（前清拔贡）是何的业师，素为何所崇拜。一九二六年秋，醴陵农民协会要东南西北四大乡各检举著名土豪劣绅二人，西乡所检举的第一名即是凌恩凤，次即文湘崖（也与何关系亲密，马日事变后，为醴陵屠杀农民的首要刽子手，解放后被镇压）。何与凌口虽不言，而心实痛恨。

当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时，何即蓄谋叛乱。其时，何任第三十五军军长，我任该军第二师政治部总务科长，随同该军开赴宜昌。适凌璋、龚长鲤（何的参谋长，字小峰，常德人，与何为保定同学）准备赴苏留学，何强我代理秘书长职务，并以他的私章交给我，要我代他批阅公事。某日，何在酒醉后，以致顾和尚（军中呼为顾老师）的长信交我阅看，信的内容是彰明较著地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并说，另有一信写给唐生智。询问我的意见如何。同时，他还以重金饵我，企图引我为知己。他对我说：“我们作事要有知己，你先拿三千元去安家，以免顾

虑。”当被我婉辞谢却。未几，李立三同志自汉口来电，促我速赴汉，我于除夕应召前往。事先，未取得何的同意；临行，才交退他的私章，告知其事。何闻之愕然，虽未见怒形于色，却一言不发，仅仅唔唔了两声。我抵汉之日，向李立三同志详陈何键反对党、反对三大政策的情形，力言对何不可信赖，须早为防范。

不久，我被调为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师长叶琪（广西人）因伤足，住武昌医院，由第一团团长周磐代理师长职务。师部初驻常德，旋移岳阳。其时，何键即派参谋余湘三来岳联络，密谋反共。

“马日事变”之前，何键已率所部第二师和第三师经由岳阳开赴驻马店，仍派余湘三在长沙伙同后方办事处主任陶柳之流与国民党的右派张翼鹏等紧密联系，密谋叛变。“马变”后不久，武汉方面委派谭平山、鲍罗廷、邓介松、陈公博等五代表（另一代表的姓名忘记了；当时，代表并随员一行共十五人）经岳阳前往长沙进行调处。我与周磐同到岳阳车站迎接代表。请他们下车小住，并电知长沙方面准备欢迎。代表们下车后，师部设宴于岳阳楼。正当宴会时，突然接到湖南省政府主席张翼鹏的十万火急电，嘱周磐就地代表五人悉数枪决。周以电交我，我当于席间引谭、鲍两代表离席，示以长沙来电。谭、鲍两代表见电报后，即退席先行，其他代表和随行人员随亦与谭、鲍等同时折回汉口^①。为了了解长沙来电真相，越二日，我偕岳阳县工会主席和农会主席赴长沙。我单独会见了张翼鹏，他对我说：“反共已成定局。唐老

^① “马日事变”发生后，武汉国民政府曾派谭平山等赴长沙彻查，途经岳阳。其到达岳阳的日期及被当地驻军阻挠，折返武汉的情况，魏镇、李仲任、张知非诸先生所叙述的，互有出入，未知孰是？——编者

板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反正我们的布告和标语都已贴出来了。”我见局势已无可挽救，当即返岳，转往驻马店，谒见何键。何起初推诿不了解“马日事变”的原因，说：“不便提出主张。”我说：“两湖之人均说由公策动，那个不知，何人不晓！”何颇有惭色，询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说：“公要通电表明态度，表示拥护三大政策。”何略为沉吟，即嘱我代为草拟电稿。我出与军政治部秘书和宣传科长共同起草。何见电稿，认为可发，惟措词宜稍和缓。翌日，我又去谒何，何说：“我已亲笔缮写了呈送国民政府的代电。明日，汪精卫和孙科等将由汉赴郑，欢迎冯玉祥。他们的专车通过驻马店时，我将到车站迎接他们，那时，将代电当面交给汪、孙二人。”当时，何以亲笔所写的代电示我，我信之不疑，遂于当日启程返岳。未及十日，而何键自驻马店发出通电，明日张胆地反对共产党，反对三大政策。

唐 耀 章

“马日事变”以后，原先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国民党省、市党部，都被许克祥等解散了。五月二十四日，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救党临时办公处，推定许克祥、王东原、李殿臣、周荣光、张敬兮等五人为主席；发布命令，拿办“暴徒”分子。许克祥等五人并以救党临时主席团名义，发布臭名昭著的反共通电。随后，国民党右派、土豪劣绅的代表人物彭国钧、萧翼鲲等，勾结许克祥等人，成立湖南省救党委员会，公开篡夺了省党部的权力。五月底，在原省党部办公地点召开了一次名义上的成立大会，实际仅有一小撮乌合之众参加。会上，推定许克祥、陈其祥、仇鳌、萧翼鲲、彭国钧、谭常恺、李毓尧、王凤喈等十余人为委员，而以仇鳌、萧翼鲲、陈其祥三人为常委。彭国钧虽不是常委，但他

是这个反动组织的重要骨干之一。

周斓一到湖南，即被省救党委员会一般反动政客所包围。六月九日，省市救党委员会在教育会坪召开党员大会欢迎周斓。周斓偕仇鳌等人到会，发表反共演说，当场决议：公推周斓为省救党委员会委员，请他以实力参加救党运动，奖励铲除“暴徒”的有功人员。

省救党委员会成立不久，长沙市救党委员会也跟着成立了。记得成立大会是在省教育会礼堂（今省人委礼堂）召开的。名为大会，实际上只到了两百多人。事变后刚到湖南不久的代理省主席周斓，由省救党委员会常委仇鳌陪同到会，他发表演说，叫嚣要铲除“暴徒”，清党救国。在这次会上，推举彭兆璜、柳厚民、张致元、王守仁、周海龙、唐耀章、仇毅、江振权、李大琮、李克晟、陈克刚等十余人为委员。其中彭兆璜在赵恒惕统治湖南时期曾任省议会议长，柳厚民和周海龙代表商界，张致元系市公安局代表，王守仁系警备司令部代表，仇毅和李大琮都是代表教育界的。市救党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柳厚民、王守仁、唐耀章、周海龙、江振权等五人，具体分工是：柳管会务，王管组织，唐管宣传，周、江分管工商和青年工作。办公地点设在党部东街（今民主东街）原市党部内。

市救党委员会成立时间不久，开过两次委员会议，商讨准备发动各基层组织，检举“暴徒”分子，并举办“共党自首”工作，这两个计划都是由柳厚民起草的。唐生智回湘时，市救党委员会贴出了“欢迎唐生智同志返湘清党铲共”、“欢迎唐生智同志领导救党运动”等反动标语。此外，还记得江振权曾做过一篇题为“大家起来救党”的反共文章，经我修改后，送交《全民日报》发表。

省救党委员会原是一撮反动军人、政客搞起来的，唐生智回湘以后，有些无聊政客被撵走了，又在救党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省党部改组委员会，由周斓、冯天柱、尹松乔、彭国钧、李毓尧、王凤喈等担任委员。随着省救党委员会的被解散，市救党委员会也停止活动了。

“马日事变”后湖南各县的大屠杀(一)

编者按：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是湖南反动派对革命进攻的开始。紧接“马日事变”之后，反动派在各县对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全省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为了反映当时屠杀的实际情况，我们正在向各县市征集这方面的资料。现在先将已收到的几篇在这里发表；以后收到的将陆续发表。

“马日事变”回忆片断

“马日事变”前，我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军长为何键，副军长叶琪，周磐为师长。其时，我师奉令驻防岳阳城，担负维护后方交通的任务。在当时说来，这是一个很平常的驻防部署。及“马日事变”发生后，才恍然大悟，这个部署原来是一个包藏祸心的措施，名曰维护武长路交通，实际是对驻武昌的叶挺部队实行监视，以策应许克祥等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军事叛变的安全，所以命令我师预先占领岳阳这个战略要地。

“马日事变”发动后不几天，我师忽接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张翼鹏电令：火速派兵一团开驻长沙，维持治安。师部令我团赴长担负此项任务。我团于五月二十四日由岳阳车运，当日到达长沙。到长沙后，我团团部驻旧藩署内，各营分驻小吴门外及浏城桥之线，担任警戒。当时长沙市面情况紧张，我团部门口堆起了

沙包，架有重机关枪。其时，长沙驻军，除许克祥的三十三团外，尚有王东原的三十五军教导团，周荣光的警卫团和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陶柳的警卫大队。我团到达长沙部署就绪后，即与周荣光、王东原等团长联名张贴布告，内容大意为许克祥的叛部，业已肃清，各界人等务须各安生业云云。表示我们是来镇压许克祥部的叛变、保护善良人民的。其实，这时许克祥叛部除一部分已去湘潭继续屠杀工农革命群众之外，仍有一部分留在长沙，我们的安民布告全是奉命行事。我团奉命分区分段派兵巡逻大街小巷，士兵和警察均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名曰维持治安，实则保全许克祥等的反革命叛变，以安反侧。

自从我们贴出安民布告、派兵巡逻以后，市内表面上逐渐恢复秩序。省政府也张贴布告，大意是：奉汉口国民政府电示，今后本府继续拥护孙总理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云云。同时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也有电来省，说是要坚决维护三大政策。当时武汉的报纸还继续用大字标题印着汪精卫的口号：“革命的向左转，不革命的滚开去！”官方的宣传和长沙的现实竟是如此矛盾，纷然杂陈，我的头脑被弄得十分混乱，真伪莫辨。最初，我以为武汉的国民政府还要继续联共，而南京的蒋介石又在疯狂地清党反共，到底谁是谁非呢？好在我们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管他什么！你说要维护三大政策也好，你说要清党反共也好，我们唯有跟着你们头头跑就是了。当此时局混乱之际，大家都在等着看武汉政府的谭延闿、汪精卫、唐生智等与南京方面的蒋介石的把戏如何耍法，如何结局。

“马日事变”后约十天左右，有浏阳农民自卫军两千余人向长沙猛烈反攻，很快就冲到小吴门与浏阳门一带。代主席张翼鹏即令省城驻军分途堵击。我团第二营在小吴门杜家山一带展开抵

抗，相持一小时后，农军不支，即由东屯渡向浏阳方面撤退。我军乘胜向阿弥岭、湖迹渡、捞刀河至永安市一带追击。战斗中，农民自卫军方面曾遭受重大牺牲，被俘者均惨遭杀害。

自此次战役之后，湖南国民党政府的反共路线已更为明朗化，清党反共运动已全面展开了。各县都先后重复演出“马日事变”的惨局。

六月十四日，湖南省政府军事厅发出分路清乡电令如下：

“湘省暴徒啸聚各县，亟应肃清，以根本解决，其兵力分配如下：

1.许克祥酌抽三十三团军队，以一部分赴湘潭、湘乡、宁乡清乡，以一部分留省警戒。

2.周荣光督率警卫团担任省城内外警戒，并保护省内上下厘卡、城厢各机关。

3.李仲任团抽调一部分前往醴陵、衡山清乡，一部分留省协同各军警戒。

4.每营派兵分赴长沙县所属各乡镇清乡。

5.熊震师向桃源方面警戒，并酌抽军队担任常德、沅江、安乡县清乡之责。

6.王锡焘师担任宝庆、新化、祁阳清乡，并担任向武冈方面警戒之责。

7.周磐、周希武、张岱（团长）协同向鄂西警戒，并应酌抽军队担任岳阳、临湘、华容清乡之责。

8.陈汉章旅负责湘西方面警戒，并抽调军队担任辰谿、溆浦、安化清乡之责。

9.戴斗垣司令向津澧方面警戒，并抽调军队担任石门、慈利、大庸、永顺清乡之责。

- 10.俞业裕团担任衡阳、常宁、耒阳、资兴、郴县清乡之责。
 - 11.王德光团对于全州方面警戒外，并酌抽军队担任零陵、东安、祁阳、道县、宁远清乡之责。
 - 12.罗定（司令）担任攸县、茶陵、安仁、酃县清乡之责。
 - 13.浏阳、平江、湘阴三县之事宜，另商陈嘉祐军长酌派军队前往办理。
 - 14.湘西、湘南边境各县，俟由前方抽调军队回湘，再行举办。
 - 15.此次清乡，限令到后十日内一律肃清。”
- 我团奉令后即开赴醴陵，正式投入反共。其时，该县的各级农民协会是我团攻击的主要目标。（李仲任）
- （民革湖南省委员会供稿）

“马变”后常德地区的大屠杀

“马日事变”以前，常德地区的政治情况和反动派系（包括孙文主义学会、国家主义派、左社等）十分复杂；反动派的阴谋手段也很毒辣；军警和豪绅勾结一起更是处处与人民为敌。当北伐军初进常德时，常德的驻军是第八军教导师周斓部，县长左宗固，公安局长王大寅（旋换了左海寰）。因当时尚在国共合作期间，他们表面上还和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常德市、县党部合作，实际上是各怀鬼胎，特别是“左社”分子仍在肆无忌惮地发展反动组织。迨至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叛变后，留湘北伐部队也渐不稳；常德公安局长换了杀人魔王朱兴曙；驻常部队只剩下独立旅熊震部，也将分驻外地的零星队伍以整训为名调来常德集中。在长沙反动派发动“马日事变”时，常德与外埠的邮电轮船突被封

锁，长常交通隔绝，彼此情况不明。可能这时常德反动派就已与熊震部有了联系。五月二十日那天，常德已被人民公审镇压的大恶霸杨守康的宗族及其所收买的流氓歹徒突然纠合百余人，将西郊区农民协会委员长萧洪贵（溆浦人，长沙兑泽中学毕业）捉住，挖出眼珠，剥去手足，割掉耳鼻，捆绑于黄包车上，在大西门外游堤。萧初尚忍痛挣扎，高呼革命口号，反动派竟把他的舌头割下。农民协会闻讯，立派农民自卫军赶去，反动派已将萧的脑袋砍下而四散逃跑了。

这时，我住在常德烈士祠的湘西工农干部训练所。在五月二十二日的夜里，熊震独立旅的学生（兵）队总队长唐生明偕其教官马骥、牛耕田及该旅政治指导员胡越等同来干训所聊天。我以邮电轮船均停，询其何故？唐则吞吞吐吐，答非所问；其余的人似乎想说而不敢说，只说了“时局也许有变”一句，便告别了。

二十四日拂晓，熊震等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紧闭各城门，配合朱兴曙的警察队、县政府的警备队、军警稽查处的稽查队等包围搜查国民党常德市、县党部和总工会、农民协会、工农干训所、湘西民报馆以及其他各人民团体。这些单位大都无力抵抗，只有听其搜查。我在干训所遥闻枪声，即和几个同事分避邻舍，我是爬树越墙跳下隔壁空园废屋内而幸免的。这时农民协会的自卫军已因萧洪贵被残杀案开往郊外弹压反动派去了，留会武装很少。只有总工会会有纠察队三、四十人，尚能进行自卫抵抗，当与熊震部队战斗良久，对方竟用机枪扫射，纠察队大部牺牲，由后门跳城逃出者极少。总工会委员长颜南山的父亲已有六十余岁，当场被杀；组织部长滕代胜被捕。群众死伤亦多，到处都是鲜血进流的尸体。

与进攻上述各机关团体同时，反动派的军警又到省立第二中

学围捕校长兼国民党市党部执委会常委胡佐武及该校训育主任兼市党部监委会常委张祐。胡当场被捕，张事先已避开；军警错捕英文教员张芳，并捕去兼任湘西民报总编辑的著名史地教员陈观祥。张、陈两人不久均由民报记者张登岳（张在反动派方面有熟人）负责保出。此外还捕去商民协会委员长贺凤璋、笋业（即搬运）工会委员长文恒益、烟业工会委员长鄢亿成、织袜工会委员长王光熙、学联会干事陈敏，湘西汽车路局代表朱熙御及该局工会委员长李昭杰等人。朱熙御、李昭杰当天被杀于文庙泮池边。滕代胜、胡佐武、王光熙经熊震、朱兴曙等审问，受刑极重；滕在被打被碾时，虽体无完肤，终不叫痛。旧日官场迷信，谓被刑讯者如不叫喊，则审讯者将要倒霉，因此，滕愈是不叫痛，他们愈是拍案喊打，直打得皮开肉绽，筋断骨折，才怒喝士兵将滕及胡、王等三人一并拖出处决。滕此时已完全不能行走，系抬往东门外沙河边杀害的。胡被杀时喉管尚未全断，痛苦挣扎半天，双手抓地成为土坑，始咬牙怒目而逝。王生前事母至孝，死后，其七十高龄的老母前往抚尸痛哭，竟被反动派用枪柄将她打成重伤，抬回家不久也惨死了。

反动派从此成天捕人杀人。除上述被捕的贺凤璋、文恒益、鄢亿成、陈敏诸人均遭惨杀外，又继续捕杀共青团常德特支书记李芙、新闻记者联合会委员杨天儒，国民党常德县党部执委会常委陈人金、东郊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张文宏等人。常德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张峻，因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一名善于打球和赛跑的运动选手，平日练有一手功夫，在农协被包围时曾奋勇冲出重围，奔往故乡澧县，终于在原籍被捕；当时虽经我岳丈黄贞元（辛亥首义人士）力保，无奈反动党棍张炯（张峻是张炯任省二师范校长时的学生）等坚决主张要杀，还是由澧解常杀害。在被杀害的人中，有一批

枪毙六人，内女性五人，男性一人（系店员联合会委员高寄生）；其中有一个女的当时没有死，倒在死尸堆里，晚上爬出，要求当地一位菜农秘密送信到家里，深夜将她抬回，听说后来医治好了。又常德后河周家店店员联合会委员周国栋拒捕爬上屋顶，飞掷砖瓦，击伤不少反动军警，但仍被反动派捉下杀害。

这个时期的省立第二中学，是由三个学校合并而成，规模较大，学生有一千余人。当校长胡佐武被捕惨杀后，反动派并派兵把守该校，不准员生出入，强迫甄别审查；经审查后继续被捕系狱者，更不知其数。

工农干训所和湘西民报馆，房屋被捣毁，财物被劫夺。反动派旋即将革命的湘西民报，改为反动的常德民报。

反动派为了进一步长期镇压革命运动，又陆续成立了一系列的反动机构如国民党救党委员会（旋改称为改组委员会）、各级清乡委员会、铲共法院、铲共义勇队、团防局、挨户团等等，形形色色，不胜枚举。

反动的国民党常德县党部（这时常德市党部已被撤销），从救党和改组委员会起，一直由张炯提拔其狗腿熊刚毅长期把持，至熊病死为止。常德清乡委员会则由唐鸿谟主持。这一千人，都是以反共杀人起家，一贯与人民为敌的。（许和钧）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马变”后邵阳地区的大屠杀

长沙“马日事变”后的第三天，邵阳的共产党领导机关接到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谭、柳两位秘书长由湘潭发来的通电，通告反动派许克祥等已在长沙发动军事叛变，希各县严防反革命

异动。随后又接到以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领衔的电报，命令邵阳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开赴湘乡永丰集中，支援进攻长沙。邵阳地方党组织，当即决定派省农运特派员刘惊涛（当时邵阳党组织农运负责人），邬建农（县农协执委兼农运特派员）和雷毅菴等率领农民自卫军于五月二十五日赴邵东两市塘。他们刚到两市塘，即被驻在两市塘和太乙乡一带的区“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尹伊重（尹原系太乙乡团总，他的这支“农民自卫军”系团防队改编的）诱骗至团山匪徒巢穴。当夕，刘惊涛、邬建农、雷毅菴及随同前往的李伯钦、李畴、石霜坚、吴伯屏等和另外一人均惨遭杀害，带去的部队亦被其袭击而散。据事后调查，尹伊重诱骗惨杀八人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刘惊涛率队到达两市塘传达省、县农协的命令时，尹虚伪表示遵命集中部队，一同开赴永丰；并以“接风”为名，邀请刘等同至其大队部晚餐。饭后，趁刘召集会议之际，尹亲率叛兵包围住所，用排枪从两侧窗户乱射达半小时之久，当场有七人壮烈牺牲，其中邬建农身中二十余枪。雷毅菴身中四弹未死，开后门逃至附近农民家中，化装绕道回县城；次日天晓，因伤重剧痛难行，隐藏在麻田内，至中午被尹匪率队搜获，用马刀乱砍十余刀，牺牲于麻田道路上。尹匪将八人遗体抛弃在预先挖好的一个土坑内。死者家属前往收殓。尹派人阻挠勒索，并威吓要株连家属，但在群众的帮助下，终将遗体夺回。尹在惨杀八人之后，随又将团山附近一带农会捣毁，并大肆搜捕农会干部，逮捕农会会员，施行严刑拷打，监禁罚款，逼得邵东一带农民四处躲藏，妻离子散。太乙乡农会负责人李翰仪、李翕如、刘寿令、李绍芳等坚贞不屈、亦先后遭其毒手。刘惊涛等八人被杀害后，在城内牺牲的，尚有原邵阳县总工会委员长向暄和共青团邵阳负责人之一戴天及工农革命群众十余

人。

就在五月下旬，陈光中率匪部流窜到了邵阳。他缴了唐生智部下王锡焄旅所属李绥猷的一个连的全部枪械，并大肆攻打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此时，地方豪劣、党棍纷纷入城组织所谓“救党委员会”，勾结县政府，设立挨户团，扬言打倒“暴徒分子”，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六月初旬，陈匪光中向武冈、新宁、城步流窜，王锡焄回邵任邵阳警备司令，七月间即派兵分赴各县“清乡”。此时邵阳的“救党委员会”亦奉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命令，改名为改组委员会，他们与县长骆鹏勾结地方豪劣，配合反动军队，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屠杀。邵阳县团委书记李道基被改组委员会委员杨国楚拘送警备司令部后遭杀害，李曾受严刑而坚贞不屈，牺牲时，高呼口号走至刑场，沿途观众都为之感动泪下。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欧阳秋曝亦被反动派从溆浦押回邵阳就义，反动派并将他的头割下悬于青龙桥上示众。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发动群众于黑夜取回欧阳之头，连同遗体送回隆回安葬，并在桥柱上留书：“打倒军阀！”“我们要为死者报仇！”

这年秋冬之交，毛主席在湘东领导秋收暴动，邵阳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大力展开宣传活动，制造声势，牵制敌人，在城乡遍发传单（如《告邵阳民众书》之类），并在通衢闹市书写各种革命标语。致使反动派恐慌异常，赶忙宣布戒严，挨户清查户口，到处检查行人，连城郊卖蔬菜的都被禁止上街。

一九二八年春，何键派刘建绪率部驻防邵阳，担任第六区清乡司令，指挥辖区反动部队、各县县长和挨户团总局继续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邵阳有县委负责人王璿、梁湘云等十余人惨遭杀害；在武冈有地下交通站负责人易官午和书记邓季龙

等牺牲；武冈县委军委负责人董刚和工运负责人刘云龙则在赴新宁组织暴动时壮烈牺牲。

是年五月底，湖南清乡督办署调整全省清乡区，何键以会办兼第三清乡区指挥，辖邵阳、湘潭、湘乡等十六县，以所部刘建绪、陶广、李觉等担任辖区清乡事宜。各县均设清乡委员会，以县长兼委员长、豪劣头目为副委员长，将挨户团改为清乡队，设立“惩共法院”，并在城乡举办“五家联保”、“十户联结”。何键曾亲自来邵阳部署清乡事宜。在各公法团的欢迎会上，邵阳当时的反动派刘鏞等尽力吹嘘何键发动“马日事变”的“功勋”，何键则大发“铲共务尽”和“宁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反革命论调。随即又在邵阳、武冈、新化锡矿山、新宁、城步各县城乡进行疯狂屠杀。当时革命群众在邵阳被反动派逮捕的有两百多人；地下党负责人员中有张炯、刘继先、邓镒、申毅、李芬、罗琦等六人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九日牺牲于邵阳市；李秋涛和饶文玉随后牺牲于新宁；王奎田牺牲于武冈；杨卓惠、张珣和伍宗汉三人在城步组织暴动，被反动派的清乡部队逮捕解回邵阳就义；同时锡矿山的矿工被反动派加以“暴徒分子”的罪名而逮捕者亦达二百余人。七月间，清乡指挥部复派部队至邵阳龙山（现属新邵）矿区和太芝庙一带，围攻湘西南特委和龙山特区委组织的地下武装，并入山搜捕湘西南特委工运负责人和龙山特区委的共产党人。

一九二九年三月，何键攫取了湖南省政府主席，将清乡督办署改为清乡司令部，自兼全省清乡司令，更疯狂地举行“清乡铲共”。除沿用前任所颁布的清乡法令外，并先后增颁清乡法令、条例多种，以加强对革命党人和工农群众的镇压。

何键接着又派章亮基兼任宝庆警备司令，并拨发光洋伍千元，责令邵阳反动派修建工事，“限期彻底铲除共党”。当时邵阳县长

刘肇汉、国民党邵阳县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刘鏞，公安局长周珍杰等重新成立清乡委员会，积极训练团防部队和“铲共义勇队”，继续检查户口，举办五家联结；并命令各区乡在要道修建碉堡，经费则责令各乡团总就地筹措。各乡团总与土豪劣绅任意诬工农群众为“暴徒”，到处勒索，罚款罚谷、明抢暗夺，闹得四乡鸡犬不宁。刘肇汉还勾结国民党县党部召集各公法团会议，将挨户团总局所辖常备队扩编为十四个队，官兵增为一千四百多人，并由田赋项下征收团款附加年达二十七万多元（当时湖南省政府规定自一九二八年秋起每两正供附加团款六元，而邵阳则增为七元）。

反动派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做好了部署，更是侦骑四出，进一步在城乡大肆捕杀；先后在邵阳杀害了欧阳青等八十多人，在武冈高沙市杀害了共产党武冈县委农运书记刘卓，又在蔡家坡杀害了共产党员四人。其他各地，也有无数革命者被反动派杀害。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工农红军一部，在共产党地方组织和革命群众的配合下，解放了新宁和城步，并围攻武冈县城，将何键的章亮基师打得七零八落。何键吓慌了手脚，又亲自来邵阳部署“防剿”事宜，将湘西南各县地方团防部队，调集武冈增援，这些团队沿途大肆劫掠，随又在宝庆所属各县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据当时宝庆警备司令部公布，单在邵阳被杀害者即达百余人。

一九三二年以后，何键摧残革命，采取了更毒辣残酷的手段，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均以秘密处决的办法，用麻布袋装沉河底，或掘深坑予以活埋。邵阳市双清亭下的深潭，曾有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被反动派暗害沉尸其中。（根据座谈会记录整理，参加座谈会的有：胡子康、蒋昨非、王昌明、曾志素、石易安、刘抱义、陈新宪等先生。陈新宪执笔）

（政协邵阳市委员会供稿）

“马变”后反动派在石门的屠杀

一九二七年五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接着，各县亦先后发生了同样的反革命事变，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了残酷的屠杀，石门也不例外。我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回到石门，先后任县立第一高小和县立中学校长，并担任了国民党县监察委员，亲身经历了县里的反革命事变，对于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印象犹新。现就记忆所及，略述如下。

“马日事变”后几天，石门县长刘夷按照上级反动政府的指示，勒令县立中学及全县的小学停办、各群众团体停止活动，并于五月二十七日（农历四月二十七日）捕杀县总工会委员长邓恒太（新关人，染业）和缝纫工会的易忠玖、谌二爷（皆天门镇裁缝）；继又捕杀新关农民协会委员长阎昌奎、委员阎于德、阎于谟、阎昌凤、王恩学，城区小学教员涂湘、刘祖永、申前元、涂自发，福田小学教员杨实务、杨义臣，花蓼小学教员蔡来臣和蒙泉的青年申辅臣等多人。此时县城中小学的教职员多数下乡宣传“毁苗”（铲除鸦片烟苗）未归，得免于难。同时国民党县党部（左派掌握的）在中、北两乡掌握了一部分有力的武装——罗效之的挨户团常备队（罗系一在乡军人，“马变”前一度混入革命队伍，任县挨户团常备队队长，一九二八年夏天叛变），所以刘夷尚有所顾虑，不敢大肆屠杀。然全县的革命组织，受了反革命的这一打击，已趋瓦解，有的人向外逃跑了，有的转入地下活动。于是城乡的土豪劣绅，又大肆活跃起来，他们在县城散发传单，列举十大“暴徒”及其“罪恶”，意欲加以残害。我也被列名为“暴徒”之一，只得暂时蜷居乡下，不敢进城。

是年十一月，省方派周纪万来县接任县长。周一到县，就来一个下马威：当团防局长袁慰卿前来谒见时，他指袁为同情共产党的人（袁确有此表现），就在县署内厅将他乱刀杀死。接着又派警察局长官嗣西到县立中学，勒令教员伍伯显，盛联熊二人即日离校，以“防共产党潜孽暗长”。他并对官嗣西说：“县党务方面看申悦庐怎么办。”意在对我进行威胁（我在“马变”前任国民党县监察委员，“马变”后成立改组委员会，仍任我为委员，我未就职）。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农历正月初一）晚，石门新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年关暴动”。事后，县政府派警察队到新关乡下，逮捕了当时住在家里、参加了“年关暴动”的常德师范附小教员杨绪韶和常师学生单绪球；又到南乡，协同恶霸团总逮捕了小学教员蔡晴月、龚受益、蔡凤鸣、贺任之、刘子普等人。杨绪韶等被捕后，经过严刑拷问，均于二月六日（元宵节）在县城就义。

官嗣西等在暴动发生时逃往津市，与先后逃往该处的一些土豪劣绅勾结驻在当地的黔军四十三军（军长李鑫）雷世光师来县镇压。雷师师部驻城隍庙巷福音堂，其所属宋团驻五通巷。部署既定，大屠杀便开始了。

三月二十三日（农历闰二月初二）上午九时，县立中学补习班（这时县中已经停办，由一批从北京、武汉回县的大学生联合原来县中的教职员，呈准开办了一个县中补习班。我亦被邀回城在该班教课）正在上课，雷师的团长宋某突率枪兵包围学校，然后枪兵入内，迫令全体教职员学生在大礼堂集合。宋某站在中央，大声吼叫：“你们石门中学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搜查！搜查！”枪兵即逐个问教职员的姓名；问到宋人杰，便用绳子将他捆绑上楼；

接着又气势汹汹地到教职员寝室搜查。官嗣西之弟官肇襄（亦在宋团当什么官佐）亦同来校，帮助行凶。他手持短枪，命枪兵将教职员学生分拘两间教室内，自己登上讲台，大呼：“向左右站开！”大家瞧他不起，都坐着不动。他即要枪兵将全体教职员捆绑出校。我亦于这次被捕；学生二百余人则被拘留校内，不许外出。与此同时，宋部枪兵还分别到第一高小、女高小、教育局、县党部等学校机关搜捕教职员多人。被捕的人均被押到五通巷宋团部。枪兵将他们所带的银钱钞票及手表、钢笔、眼镜等比较值钱的物件全部搜去，然后分别拘禁在几间房里。下午又将他们解到福音堂师部，经过七昼夜的严刑审讯，大多数人被杀害，只有极少数人获释。

我被押到宋团部后，遇见了该部秘书高尚（曾任石门县长，与我相熟），他说替我设法。不久我被释放出来，在一个学生家中躲了两天；学生的家长替我找到一张通行证，我才逃到乡下的一个农民家中。

三月二十九日（农历闰二月初八），雷师一次屠杀十七人于上街河洲观音庵前，其中有县中补习班行政负责人苏清镐、邢业炳、云开源，教员宋人杰、龙声灵、伍经恕、熊彦明，第一高小校长邱本泉，教员廖宏保、伍逸如（女），县视学员伍崇嗣、文玉珊，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廖仲元，和一位体育教员李某（张仲平之妻。张曾一度任中共石门县委书记）；还有三个人的姓名已经记不起了。

以上所举“马日事变”后石门县被反动派杀害的人，只是一些比较知名的人士；工农群众被屠杀者，尚难计数。以石门那样一个小县，在短时间内，有这么多的人被杀，可见杀戮之惨！

（申悦庐）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供稿）

“马变”后反动派在常宁屠杀的片断回忆

一九二七年，常宁水口山是个拥有五千多工人的矿场。“马变”前，工人们联合附近农民，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群众革命运动。其时，矿务局原有矿警百余名，已改为工人纠察队。笔者是当日的纠察队员之一。大约在一九二七年六月间，曾任常宁县团防局局长的萧宜春（是个穷凶极恶的土霸，常宁人称之为“萧屠夫”），被农民打垮后，又在鱼塘纠集游兵散匪五百余人，分两路向水口山进攻。工人纠察队虽极力抵抗，但由于寡不敌众，加之弹尽，在死伤狼藉中撤退到豺子岭，清点人数，已不满五十人。在内无弹粮，外无救援的情况下，余下的队员只好分散潜伏，并将残有的枪支拆散埋藏。是役不仅矿场的工人纠察队伤亡很大，并且匪徒攻进矿场后，曾用机枪对正矿井扫射，屠杀了不少藏匿在井内的手无寸铁的矿工和职工家属。

同时，反动派在常宁县境也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单就笔者所见，有下列数例：

官庄农民协会委员长谷雨亭被常宁县清乡委员李之盛，吴子才等砍成三节以后，首先陈尸示众，因为来看的人并不多，并且引起了观众们的一把把的眼泪，李、吴等刽子手一怒之下，便改为抬尸示众（当时，群众诅咒他们是送尸上门）。他们纠集了狗腿子多人，把谷雨亭的尸体的中段（腰部）横架在一只箩筐上，把头部和脚部两段吊在箩筐两边，用一根丈多长的粗竹杆抬着，摆在游行的队伍当中，游行队伍是由狗腿子裹胁一些人组成的，前面打锣，后面喊口号，在官庄一带的村落游行。常宁风俗，除了自己家里的丧葬可以抬棺经过自己的门口以外，决不允许别人扛

着死尸过门的。因此，他们抬尸游行所到之处，居民都纷纷把门关上，连小孩子也不让出来窥看。同时，那些被裹胁参加游行的人们也一个个地半途溜走了，最后连扛尸的人也溜跑了，剩下的只有几个狗腿子，他们在莫可奈何的情形下，把谷雨亭的尸体抛在荒山上，宣布：“不准收尸，让狗去吃掉！”

由水口山回到官庄的洗砂工人谷知鹏被李之盛、吴子才、谷晓岚等无中生有地加以“勾通共匪”的罪名，指挥枪兵用乱枪击毙后，也宣布“不准收尸”。由水口山回到官庄的纠察队通讯员周遵鉴被砍掉了脑袋后，刽子手兴高彩烈地拿着他的脑袋挥舞几下，宣布说：“有敢收尸的，以此为样。”由水口山逃回的纠察队班长刘人发在中途被匪徒们抓住，活活地把眼珠挖掉，凌迟处死。

我还亲眼看到一队匪兵绑着一个用麻袋罩着头部的人解到松柏河口（距水口山十多里）后，便全身塞进麻袋，投入河内。由于不知道被淹死的人的姓名，又无人敢向队兵查问，害得好些有儿女逃亡在外的老年父母在家里日夜哭泣，他们生怕被淹死的就是自己的儿女。

“马变”后，反动派在水口山和常宁县境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被杀的人很多，其残酷是灭绝人性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简直使人难于置信。

（根据谷皇年有关“马日事变”的来稿摘录整理）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湖南省党校 的反共活动

一 吴剑真

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前，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办有省党校。它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具体领导下，培养青年革命干部，在当时的总的革命工作中作出了一些贡献。

“马日事变”时，反革命部队在进攻省党部、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的同时，也进攻了省党校。在对抗中，党校师生有的被捕杀，有的突围逃出。原来朝气蓬勃的党校遭到了彻底摧毁。

是年七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决定继续开办省党校，设校务委员会，以唐生智、周斓为正副主委，冯天柱、曹伯闻、尹松乔、雷铸寰、李荣植、陈其祥、彭国钧、李毓尧、罗介夫、谭常恺等为委员（校务委员中除谭常恺、陈其祥两人外，都是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委员），校务委员会决定校内人事、党务训练、教育规划、军事管理等事宜；并由唐生智兼校长，以周斓代校长，冯天柱（时任民政厅长）为总务处主任（周斓不常到校，冯实际上是代校长的代理人），李毓尧为党务处主任（党务处直属省党部），罗介夫为教务处主任（罗未到校时以吴剑真代理），谭常恺为指导处主任，陈其祥为总队长。

党校主要课程的讲师如下：三民主义——陈天鸥、黄庭荫、米世珍；政治——谭常恺、伍意农；经济——唐德昌、荆嗣仁；

建国方略及建国大纲——吴晦华、周八百；历史——张坦然、罗驭雄；新闻宣传——杨汉辉；劳工运动——陈天鸥；合作概论——侯哲莽；社会问题——吴剑真；农业——李维章；教育与群众心理——邹谦。

在省党校的主要负责人中，彭国钧、李毓尧、谭常恺等是代表省党部的。我与彭国钧有师生关系（彭曾任长郡中学校长，我是该校学生）；“马变”前我与谭常恺在全省高级中学同事，交情也很好；“马变”后不久，他们邀我参加了国民党在湖南的一个秘密小组（后来我离开了这个组织）；因此，我由他们的介绍，到省党校任讲师，并因罗介夫担任了陈嘉祐军的政治部主任，不能分身来校，就以我代理教务主任。在我就任教务主任后，彭约我到他家商定讲师人选。他提出陈大榕、曾省斋、黄庭荫、吴晦华、张坦然、任凯南、唐德昌、周八百等人。我又与冯、谭交换了意见，随即编定全部课程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提出任课讲师名单，请示代校长周斓，经周核定后，即分发聘书。彭指定要聘请的陈大榕、曾省斋两人，我有意将他们排斥，彭对此颇为不满。任凯南则拒不受聘。

这些人形成两个小集团：黄庭荫、张坦然、吴晦华、周八百等结成一气，唯彭国钧、李毓尧的马首是瞻，自命为国民党的“核心”，以监视异己为己任；吴剑真、杨汉辉、罗驭雄、米世珍、荆嗣仁等又结成一派。两派经常暗斗，争夺学生尤为激烈。谭常恺、伍蕴农则暗中支持后者，这就为后来湖南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种下了根子。

“马日事变”后的省党校，是一个培植训练反共反人民的基层骨干的场所，它用种种办法，诱骗正在革命道路上徬徨的青年，使他们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当时省党校的课程以三民主义为主，

以政治经济学、社会问题、劳工运动、农民问题、合作概论等为辅。三民主义一课完全是照本宣科。政治学的主讲者则极力宣扬欧美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和“法治”，连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精神也被阉割了。其他经济学、社会问题、劳工运动、农民问题等课的主讲者，率多抄袭欧美和日本资产阶级御用学者的改良主义，以及考茨基、托洛斯基、布哈林等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谬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无耻的诬蔑；更狂妄地鼓吹“共产主义革命是从恨出发，三民主义革命是从爱出发”，来反对阶级斗争；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也肆意加以曲解，极力为反共反人民找理论上的根据，以麻痹青年学生。

省党校的主要训练工作为党务处所掌握。党务处直接对省党部负责，其职责是：一、把学生编成若干小组进行讨论（每组二十到三十人，每天讨论两小时）。讨论内容，以清党、组党及组织民众团体为中心，以宣传反共反人民为目的；由党务指导员出席主持，直接抓学生的思想，以此作为甄别学生的根据（李毓尧、谭常恺常亲自参加讨论）。二、分批介绍学生加入国民党，编为党小组，选择其中积极的反动分子，报由省党部分派到各县市党部工作。三、发动和指示学生在校内举行清党运动，号召“误入歧途”者自首，规定自首者必须检举同伴，检举可以赎罪；又发动一般学生检举共产党人，以表示对国民党的“忠诚”和对共产党的仇恨。被检举的人中，情节轻者，自首后或留校禁闭反省，或开除学籍了事；情节重者则送特别法庭或长沙县公署（陈其祥总队长兼长沙县长）处办。当时学生中有一个杨宗汉，是共产党员，在校内有革命活动，被检举后立即送交特别法庭，致遭杀害。杨被害后，校内有同学在操场墙壁上写了“杨宗汉精神不死”几个大字，党务处和总队部大为惊慌，当即下令进行清查。有两个学

生逃跑了（忘其名）。女生罗觉愚（前稻田女师学生，共青团员）经同学检举，被逮捕送押长沙县公署，到次年才被保释。当时校内禁闭室每天总有一二人被禁闭，此出彼入，室无闲空。被开除和送法庭的人，为数亦不少。

李毓尧、陈其祥等还发动党校学生，在校外进行“铲共”活动。他们指使学生在外出时遇见自己以前认识的有共产党嫌疑的人，立即报请岗警协助捕送长沙市公安局或长沙县公署；又号召学生如有知道在各县的共产党人的地方，即可密报党务处行文到各县逮捕。从党校学生余琨在省党校周刊第十、十一号合刊上发表的《本校同学铲共之经过》一文中所记载的事，可以窥见当时省党校的罪恶活动之一斑。兹节录于下：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捕获共匪五名：男犯黄挹梅，黄吉，黄亚，夏博文，文淑环（女），皆送长沙县公署。”

“二十三日，捕获共匪向敏、刘定胜、张孝武等三名，皆女犯，送长沙县公署。”

“二十四日下午，在经武门外大垅（砚瓦池）第七号破获一共匪机关，搜出暴动计划，暴动大纲，通告一纸，子弹十一颗，大爆竹一大包，军服甚伙，火药燃料及共产书籍一大皮箱。并当场拿获匪徒黄纲礼、吴果能二名，及有关系之女犯李淑华一名，连同证据送交特别法庭。在余家塘招贤旅馆捕拿刘放之，适刘外出，而共匪要犯帅杰恰于是时送通告与刘，前往捕刘之同学，将帅拿住，在其身边搜出共党支部之地点及负责人姓名一纸，随即连同证据，送交长沙县公署。在望麓园宁乡寄宿舍内搜出共党工作日记等证据，并当场拿获李玉阶，喻让二名，连同证据送交长沙县公署。在黄泥堰一汤学舍内拿获共匪黄益弥一名，并搜出共产党书籍及信札多种，送长沙县公署。在登隆街由女同学捕获共匪女犯

周文哉一名，并证据多种，送交长沙县公署。在杨家巷捕获共匪周再兴、汤泽英等两名，连同搜出证据，送交长沙县公署。”

“二十五日，在大西门外盐运坡谦太和对门捕获共匪廖文振一名，当往拿时，廖隐卧楼上，及搜至楼上，廖由天窗登屋，就捕后，送交长沙县公署。在药王街源和商号捕拿共匪龙运寿一名，连同证据送特别法庭。在戡子桥第九号拿获共匪刘定申一名，随即送特别法庭。”

“二十六日在各地寻获共匪伏爱林、何力、彭贞顺（女）、王据筹、刘海斋、张骏等六名，连同搜出证据送交特别法庭。”

“二十八日在麻园岭松园破获共匪机关，当场拿获共匪汤易寰、汤云衣、汤克三、汤鬻等四名，送特别法庭。”

“二十九日捕获共匪陈光采一名，送特别法庭。”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在长师附小捕获共匪要犯伍钟山一名，又在长沙市立第一小学捕获刘邵岚一名，在泰安小学捕获鲍纯甫一名，三处均搜获反动宣传品多种，及支部名册数张，共产党书籍数十本，连同证据送交特别法庭。”

“一月五日在白马巷胡普生药室内拿获胡秀影、胡淑媛二女犯，送交特别法庭。”

“九日下午本校同学在湘雅医院遇着安乡已经通缉之共匪周恒伟，当即以向日同学关系，询其住址，随即带队往捕，就捕后，当夜即送特别法庭。”

该文作者在文末说：“这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报道罢了；所报道的，也只限于最关重要的一部分；其他如所拿获的嫌疑犯，以及无关重要的共产党徒，或者已送特别法庭，或者已送长沙县公署，而报纸上多已登载，若再一一重叙起来，未免太过于琐屑，我的报告就此结束。”

余琨的这份报告和笔者在前面所述的事实，可以反映当时国民党湖南省党校的罪恶活动的一斑。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一九二九年春，省党校选派学生五、六十名，协同军警，到岳州围捕前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解回长沙，惨遭杀害。

省党校已成为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的尖兵。从“马日事变”后，经过唐生智、程潜、鲁滌平三任省主席，校名由省党校改为国民党党务人员训练所，内部人事也有变动，而反共反人民的行动则只有日益加强。省党部还在省党校或党务训练所毕业生中，挑选了一批凶恶强悍的分子派充各县市党部的骨干，积极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二 许茹春

一九二八年，我在国民党湖南省党校第二期受训。结业后，适逢国民党反动统治内部发生派系纠纷，党校学员除个别调走外，大部分均留校听候分派工作。这时正是湖南的反动政府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屠杀的时期，省党校负责人为了邀功，就把这些留校听候分派工作的学员临时组成“铲共义勇队”，直接投入这场疯狂的屠杀。这个队由长沙县县长、省党校总队长陈其祥兼总队长，由原任省党校各期军训教官为中队长，学员改称队员。总队之下，并未具体分工，也未再编分队，统称为“铲共义勇队”。“铲共义勇队”组成以后，只要听到那里有共产党员，就派队员到那里去进行搜查逮捕。它的活动不经常，主要是配合军警行动，特别欢迎的是外界告密。

一九二九年春季，约在农历三月间某日晚饭后，忽然有个青年奔来党校找队员罗璋，一见面就说：“你们赶快作准备，长沙来

了一个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现住在老照壁中南大旅社。”罗璋问他是那一个？那青年回答：“不要问，以前和你我都很熟识，见面就会知道。”罗璋也就没有再往下问，马上去党务处报告指导员李维章，说要带十几个队员去捉共产党。经李维章许可后，他也不去知会中队长，就由他挑选十二名队员全副武装出发了。

我为好奇心驱使，也匆忙穿上制服，跟在罗璋后面。我们在未进旅社以前，预先在旅社附近布下岗哨，禁止行人通过，然后罗璋带领三个武装队员连我和密告一共六个人走进旅社，叫账房交出号簿。我们逐号房间查看，没有发现我们要找的对象；锁着的两间房子，看名牌也不认得。于是罗璋就问那密报的青年：“喂，胡光煊！你怕看错了罢？”我这时才知道那告密的人叫胡光煊：并进一步了解胡与罗都是共产党的叛徒。我们失望地走出旅社。正准备去撤岗哨的时候，胡突然指向正南面来的一辆黄包车对我们说：“来了！来了！”我照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车内坐着一个魁梧奇伟的大汉，嘴上蓄着短短的八字胡须，年龄大约四十上下，精神饱满，两眼发光。我心里就感到对方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物。

黄包车到中南旅社门前停了下来，坐车的人下车把车钱付了，就昂然走进旅社。我们马上跟踪转来，把旅社头门关闭，不许任何人出入；仍由原来的六个人上楼去。茶房把锁开了，这个人已进入房内。罗、胡两人随即跟进房去，我也进去了，三个武装队员站在房外。这人一见罗、胡，即呼他两人的名字，问他们几时来到长沙，顺便又问我姓什么？并且招待我们坐下喝茶。他的态度从容不迫，倒把我们呆住了。静坐一两分钟后，罗璋才开口说：“陈先生，许久不见了，你怎么也到长沙来了？”那人答道：“我要到上海去，路经长沙，因赶不上火车，故在此逗留一天。”

这时我似有所悟，想到这位陈先生，大概就是两年前听人说

过的陈佑魁。小声向胡光煊一问，果然是他。正回忆间，胡光煊问罗璋怎么办，罗即转问陈佑魁带了些什么行李；陈马上在床里边拿出一口尺多长的紫色小皮箱，把锁匙扭开给我们查看。箱内仅有省党校上年出刊的“农运和工运”刊物两本，还有用小毛巾包的三只金戒指，此外什么也没有。罗再追问还有其他物件没有，陈站起来指着他的身体，对我们大声地说：“一身之外，别无长物。”并问我们要不要解衣检查，罗、胡两人齐声说：“不需要了。”当即要他随我们到省党校去。他就把身上穿的那件灰布长衫拍了几拍，戴上一顶酱色博士呢帽，手提皮箱，随我们下楼步出旅社。其时大约是晚上九点钟。

陈佑魁到达省党校，就由党务处指导员李维章将他引到一间预先准备的房间里，随即差人送来床铺被盖和茶水，并问他吃过晚饭没有，他回答说今晚不吃。李要他今夜好好休息，说完便转身出来；旋指派两个武装队员在他住的房间的两头甬道上站岗监视。第二天早上，校丁送来茶水和菜饭（三菜一汤）。这些都是李维章事先指定专人负责办的。饭后，李维章向陈作首次试探，劝他自首。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万万不能。”李又要罗璋去把胡光煊叫来，要他们两人以私人的关系去进行劝说；结果被陈骂得狗血淋头，抱头鼠窜而出，以后连面也不敢见了。嗣后，李维章又先后请了潘世谟等几个指导员和教师去劝陈自首，也都被陈严词拒绝。陈到省党校不觉又是四五天了，眼看劝降不成，李维章非常焦急，于是又请教务处长陈嘉任和他的兄弟陈嘉勋（教师）亲自出马。这两个人在当时湖南政教界是有相当声望的，他们自己也以为有几分把握可以说服陈佑魁自首。我和几个同学预先就到陈的住房窗口等候窥察情况。旋见陈氏兄弟联袂进去，他们首先和陈佑魁攀宗族关系，继又谈及各人留学的国别和经过以及所

习的科系，然后逐渐转到策动自首的正题上来，说是只要陈愿意自首，马上就可恢复自由，并保证他以后的地位。

说也奇怪，经过这次谈话，陈佑魁似乎有了转变，他站起来表示愿意接受两位同宗的规劝，但是有个要求：请给他一个星期的考虑，在这个期间，再不要派人去和他谈话，让他写篇自传，同时希望把他的自传逐日分段在报纸上发表。两陈对于他的这个要求，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从陈嘉任兄弟去后第三天起，陈佑魁的长篇自传就在《国民日报》上与读者见面了。自传的前面，加了一段编者的按语，介绍作者的身分以及他为什么要来长沙自首。陈在自传中略述他的家庭情况、个人出身，以及在德留学所结识的朋友和最喜欢阅读的书籍，思想的变化，政治路线的选择，参加共产党的经过。这篇自传连续登载六七天，没有间断过。《国民日报》自刊登陈的自传那天起，每天都要加印一两千份，以满足临时读者的需要。

陈佑魁的自传最后续完的一天，省党校和国民日报社忽然打起官司来了。原因是自传结尾有“甘愿砍头、流血、牺牲，此志坚决不渝，希望再不要向我作任何妄想”一段激烈的话。省党校责怪报社编辑，为什么不斟酌加以删改，报社则责备省党校为什么事先不加审查，就把稿子送来，双方争辩不休，结果都受了处分。

这天晚上，李维章匆匆来到陈佑魁的房间，见面就问他见过今天的报纸没有。陈答已见过。李说：“你既答应自首，为何又在自传后面写上这么一段，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陈很慷慨地答复李说：“这就是我的成功。我不但今日成了功，明天还要成仁。既成功，又成仁，这是人生最痛快的事。这个痛快事，又只有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才能做得出来。现在我的任务，已告结束；要做的事、

要说的话，都已在我的自传中交代清楚。我陈佑魁死了，后面还有千百个陈佑魁，都会照我这样去做。我再没有什么顾虑。前次要求你们给我几天时间写自传，现在要求你们尽快把我处决。言尽于斯，望你们快点执行。”第二天早饭后，陈佑魁就被押往“惩共法院”。

陈佑魁自被解送“惩共法院”后，一连几天，没有消息。又过了一两天，李维章从外面回来，我们齐向他探问有关陈的消息。李开口第一句便说：“没有办法劝说他！”我们说：“办法是慢慢想出来的，此刻不要急于逼他自首，等一个时候再去策动他不好吗？”李说：“这还要你们来说，我们老早就这样想过了，而且也等待过。他早已抱定牺牲的决心，尤其是到法院以后，他整天都在房里闹，逢人便骂，有时还高呼‘打倒欺压人民的国民党’、‘共产党万岁’这类口号。今天已由‘惩共法院’召集各机关团体代表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决定将他判处死刑。明天还要继续开会研究，要特别做一番宣传工作。”

第二天李维章从“惩共法院”回来时，公开向我们宣布处决陈佑魁的各种措施。反动派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扩大“铲共”的宣传，把杀害共产党“要犯”的血腥罪行变成一次反革命的“示威”，以加剧白色恐怖气氛。除命令各机关团体强迫组织群众参加游行外，还规定不论机关团体的大小，须一律自备白竹布一匹，制成大幅反动标语。“惩共法院”召开的联席会议除了指派省党校“铲共义勇队”负责防范共产党劫法场之外，还决定派四十名武装向游行经过地带两侧搜索警戒，以防共产党的突然暴动。

星期日是反动派杀害陈佑魁的一天。这一天，长沙市所有大小报纸都在第一版用特大号字刊载“惩共法院”判处陈佑魁死刑的“罪状”，还刊登了许多杀气腾腾的反革命社论和专论。上午七

点多钟，李维章率领四十名省党校“铲共义勇队”队员去“惩共法院”提解陈佑魁，将他押赴游行行列。

陈佑魁被绑在游行队伍中，两旁有四名手持马刀的刽子手簇拥着他。他在途中带着无比愤怒的神情不断高呼：“工友们记着：今天是陈佑魁被反革命杀害的一天！”“打倒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铲除残害人民的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尤其是最后这句口号，他喊得特别响亮。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他看见路旁一群工人楞视着他的时候，曾大声对他们说：“你们革命不要灰心，不要以为有许多共产党员被魔鬼吞掉，就感到革命前途绝望了，共产党员是杀不尽的。你们继续努力干啦！”押解他的队伍，每当他呼口号或向群众喊话的时候，就叫号兵吹冲锋号和连声喊杀，阻挠他的叫喊。结果还是达不到目的，只要号声和喊杀声一停，他又马上怒吼起来。党校的学生，见他这样强悍不屈，就用木棍、竹杆朝他痛打，他即回头怒斥打他的人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惨无人道？我现在已被你们绑赴刑场去杀头，我向人民讲几句分别的话，都不许可吗？你们真是丧尽天良！”慷慨激昂，毫无惧色。最后，游行队伍停在浏阳门外的一片坟场。陈佑魁知道是刑场到了，乃大步向前，选定了归宿的地点，英勇地就义了。

（政协衡阳市委员会供稿）

我参加了何键的清乡大屠杀

欧 冠

“马日事变”之后，湖南的反动统治集团曾紧接着反革命叛变的实现，对全省的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进行过一次疯狂的屠杀和逮捕，使湖南人民陷入空前的白色恐怖的浩劫。但由于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正忙于互相倾轧，一时还来不及集中全力于反革命的镇压和屠杀。至一九二八年上半年，随着“西征军”的胜利和取得湖南的统治权，国民党反动派内部得到暂时的稳定，他们就马上腾出手来，更有计划有组织地倾全力进行清乡，对全省城乡革命群众、共产党人和他们所谓“土匪”、“暴徒”进行大规模的残酷镇压和屠杀。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以清乡为湖南全省的中心工作，特成立全省清乡督办署，由省政府主席程潜和鲁滌平先后兼任清乡督办，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兼清乡会办。一九二九年二月，何键勾结桂系军阀赶走鲁滌平后，他就以省政府主席身份自兼清乡督办（一九二九年四月，改为全省清乡司令部，何自任全省清乡司令）。从这个机构成立起，何键一直就实际负责主持它的全部罪恶活动。

何键是湖南大封建地主阶级的忠实代理人，自任全省清乡会办、督办之后，就决心继续完成其“马日事变”的“未竟之业”，企图将全省的共产党人、工农革命群众和一切进步人士斩尽杀绝。湖南全省清乡督办署成立后，将全省划为十一个清乡区，各区设区司令一员（后改划为五个大清乡区，各区设区指挥一员；衡永

区则特设清乡司令部，由何键自兼司令），调集了第六军（程潜兼军长，李明灏为副军长，部队驻平、浏、醴地区，受命清乡不久，该军即哗变）、何键的第三十五军、吴尚的第八军、鲁滌平的 第二军之一部，许克祥的独立第三师、陈汉章的独立第六师、陈渠珍的独立第十九师等十几个师的兵力，辅以各县十几万团队，限期肃清全省“共匪”。何键满以为经过这样短期的疯狂屠杀之后，其反动统治的心腹之患就可以从根拔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在清乡督办署成立之初，他们很乐观地以六至八月份为“清剿时期”，九至十一月份为“考成时期”。

我是怎样当上何键的刽子手的

早在一九一八年，我就认识了何键。那年，我在赵恒惕的第一师贺耀组团当营长，参加驱逐张敬尧的战争，二月间在临湘负伤，退下来在衡阳休养。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老同学李毓英同何键。那时，他们都是赵恒惕部的排长，刚从前线败退下来，脱离了队伍。经李介绍，我认识了何键，彼此谈得很投机。不久，何键只身回到醴陵，与张国威等招兵买马，成立游击队，自任司令。一九一九年，他受宋鹤庚收编，率部移驻永兴，其驻地与我邻近，从此，我们之间的个人接触也更多了。他同张国威闹意见，曾多次拉我们去调解，对我们表示很感激。一九二八年，我在贺耀组部任上校参谋，济南惨案发生后，我被解职回湘。这时，湖南清乡督办署成立不久，曾与我同时在贺耀组部任过团长的刘晴初任清乡督办署参谋长，他与我私交颇厚，经其介绍，我会见了何键。他立即派我为零陵县清乡督察员。从此，我就当上了何键手下的一名可耻的刽子手。

清乡督察员是清乡时期何键派驻各县的“钦差大臣”，负责监

督县长和清乡委员会的工作，其地位和权力都在县长之上，每月正薪为二百元，办公费五十元（县长正薪最高为一百八十元至二百一十元），人选多属何键认为忠实可靠的得力爪牙。

我在零陵县作了两个多月的清乡督察员。一九二八年冬，何键应我原籍宁远县地主豪绅的请求，调我任宁远县清乡督察员。当时，永州地区清乡的中心任务是清剿阳明山的周文部。负责宁远县清乡工作的为曾任陈复初师连长的挨户团副主任何飞鸿。他虽也是替地主阶级效力，但县里地主豪绅的小派系很多，矛盾很大；何飞鸿在清剿中处处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以致周文曾一度攻占宁远县城，杀死了县长，引起多数地主豪绅的不满，认为他有通“匪”的嫌疑，不肯死心替他们卖命。一九二八年九月间，他们派欧如圭、黄伯熙、郑子礼、李平章等为代表，联合宁远旅省的几个头等豪绅李辑五（李毓九之父，曾任湖南兵工厂厂长）、郑华清（曾任江华县长）欧鸣高（长沙育群中学校长）、王昌德（长沙楚怡工校教员）等向何键请愿，要求调我回宁远负责清乡；同时与我商谈回宁远的条件。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如何控制和加强县团队武装的问题，当向他们表示：“马日事变”前，我回到县里，农民协会认为我是土豪劣绅，要办我的罪，弄得我无法在宁远安身，只好逃避到武汉；现在我只有两支驳壳枪，有什么本事回宁远县清乡呢？经过商谈之后，他们决定由县里筹集三万块光洋，到省里买两百枝步枪和三万发子弹，作为另行成立团防武装的基础。由于李辑五这帮人的活动，这批枪械子弹很顺利地买到了手。何键的死党之一、驻防零陵的某独立师师长张其雄也极力怂恿。他对我说，如我回宁远负责清乡，他可派所部易维扬团帮我三个月的忙（易为我弟弟的同学，对我待以兄长前辈之礼，唯命是从）。当即派卫队送我到道县。临别时，还送了两把马刀给我，对

我说：“我没有别的礼物送你。你回到宁远后，把这两把马刀砍钝了，就算是你的成绩。”道县驻军为江华、道县、永明三县团防指挥唐熙的部队，他是那几县的土皇帝。他的儿子唐孟侯（湖南省惩共法院院长）与我同过学，私交很好。我过道县时特地去拜访他，向他请教。他对我说：“你们宁远的问题，主要是地方武装力量不够，又没有人领头。你回去正合式。”唐熙同何飞鸿也不对头，他对我说：“何飞鸿想保全实力和地位，暗通周文，你回宁远后，第一步就要干掉他，否则你的事就不好办。你初次回到县里，实力不够，我可派连把人帮你的忙。”我就是这样在何键的调遣、宁远县的豪绅以及毗邻各县地主反动武装大小头目的全力支持下回到宁远县的。

我回到宁远不久，就买到了一百四十多枝双筒枪，很快就成立了两个连；同时要县长将何飞鸿调为团防筹饷主任，由我以清乡督察员身份兼挨户团副主任，实际掌握县的团防武装。是年底，我们便乘第一次进剿周文的军事行动，在易维扬团的帮助下，一举将何飞鸿的六个连全部吃掉了，收了他五百多枝枪。何本人逃往道县，后为唐熙所捕杀。这时，我将县团队扩充为两个营，实力大为增强。

宁枉毋纵，大肆杀戮

宁远县为二等县，清乡委员会由十一人组成，县长熊兆贤兼主任，我任副主任，委员由各公法团公推，全县九个区每区推一人，由县长加委。清乡委员会在清乡开始时的第一项重要工作是清查户口，由各区公所按何键的统一规定，将共产党员、革命群众（他们称之为“暴徒”）同土匪、窃盗、流氓、土娼、烟犯、赌徒等一起编入“另册”户口，作为迫害和屠杀的对象。这种“另册”

实即地主豪绅当权派所一手编造的黑名单。县清乡委员会除了负责编造这种逮捕和屠杀的黑名单之外，主要任务是下乡清查。我们当时为使清乡搞得“彻底”，规定清乡委员三人一组，带着团队武装分途下乡查点。查点小组每到一地，将附近各村男女群众集合，按区公所编造的正册和“另册”点名清查。点名时，将名列“另册”的“共暴”分子当场叫出来集中到一边。全部查点完毕后，就将这批被叫出来的人立即进行审讯，有时连这种审讯形式也不搞，即由清乡委员同区，乡长交换意见后，拉出三、五人当场处决。对名列“另册”而点名不到的人，规定必须由五家联合具结，限期追回投案。如限期已到而人仍未追回，具结的几家人都得坐牢。这样，逼得具结各户只好出钱派人四出寻找。

究竟由各区、乡长编入“另册”的人是否都是“从恶有据”？当然是没有的。何键对我们的指示是：“你们要凭良心办事，不要放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如遇紧急情况，当杀就杀；若照法定手续办事，上面就不好批了，共产党的祸根就永远不能消灭，地方就永远不得太平。”他这指示的真实意图，就是要我们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那时还没有建立起严密的保甲制度，各区乡编造户口册时难免有遗漏。清乡委员下乡查点时，为了不使一个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漏网，有时还临时搬出各姓的族谱来查对。清乡委员杀了人后，一般规定是由县清乡委员会报请全省清乡督办署（清乡司令部）备案了事；但事实上常是连这种呈报手续也不办。因为当时的团防局和以后的团防区指挥部的编制都很小，只有一名司书，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办这些例行公事；更主要的是何键给我们宁枉毋纵的指示，使下边根本不重视什么法律手续。有一次清乡司令部打我的“官腔”，责成我们杀人应“依法呈报备案”；我就要求清乡司令部给下边扩充人员编制，这样

把他们的官腔顶了回去。

在何键这种宁枉毋纵政策指导下的清乡屠杀，既可不向上面呈报，下边处决人犯时又可不经正式审讯，也不公布被杀者的“罪状”，这就不仅使地主豪绅可以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屠杀，同时也给他们大开个人报复之门。究竟当时有多少人惨遭屠杀，有多少人无辜被害？我现在无法说出一个确切的甚至大概的数字。记得清楚的是清乡期间被处死刑而上报备案的只是少数。据一九二九年全省清乡司令部编印的《湖南全省清乡总报告书》载称：自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十一月，由清乡督办署直接判处死刑者七十八人，核准各区指挥部判处死刑者七百一十三人，核准各县判处死刑者九百三十二人，共计一千七百二十一人。这显然是由于反动派自己不敢真实记下这笔血债而被大大缩小了的数字。至于在各区清剿战争中被杀害的数字更属无法统计。

那时，整个湖南，就是这样被何键杀得鬼哭神嚎，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凡未经清乡委员查点的区、乡，只要一听说清乡委员要下乡了，吓得小孩都不敢哭出声来。有些胆子小而又无力外逃的人，听说清乡委员要下乡查点了，惟恐“在劫难逃”，多有杀鸡杀鸭，饱吃一顿，准备在查点时被拉出屠杀的。

何键对留在本省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是如此残酷屠杀，对被迫逃亡到外面的，也从不放松。在一九二八年开始全面清乡之后，清乡督办署根据各县报请通缉的达一千四百多名，其中绝大部分是“马日事变”后被迫逃亡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组织的干部。何键还经常根据密报、暗访所得的线索，派人到外省将他们逮捕回省加以杀害，给各县的反革命地主豪绅扬威。我亲自知道的一件事是：宁远妇女运动的重要干部、共产党员柏忍，于“马日事变”后逃往广西，经她的家爷郑华清查访到她的下落后，于

一九三〇年报请何键将她捕回宁远杀害；何键还赏给郑华清光洋五百元。

对周文部惨无人道的集体屠杀

在清乡大屠杀中，当时我自认为“有功于桑梓”的一件事，是对周文部的一场大屠杀。周文系一桶匠出身的地方武装的首领。一九二七年以前，他先后将出没于阳明山地区的各股地方武装组织起来，声势浩大，曾受范石生收编为独立旅旅长。“马日事变”后，他的部队开始与工农革命力量联合，打着“中国共产党湖南区永属农民自卫军”的旗号，活动于阳明山旭日洞、垒下、石家洞、咀石口、野鸡尾、白果市、鲁塘、西山一带。当时据报他的部下多为退伍士兵，男女数千人，有枪数千枝，黄埔学生赵某（忘其名）为之主持一切，被认为是湘南的肘腋之患。何键曾亲到衡阳，调集大批队伍进剿；后来责成张其雄师限期清剿，均未奏功。一九二九年五月，我奉何键令调任五县团防指挥，负责指挥对周文部的第二次围剿。这次除我自己所辖五县团队全部参加外，还有张其雄师的易维扬团，许克祥独立师的欧阳天化团、唐熙的两个营都归我统一指挥；桂阳、常宁两县也派团队参加堵剿。我们首先对山区采取严密封锁、断绝粮食供应的办法将周文的部队围困了一个时期；再组织敢死队轮番突袭其主要据点；并乘他们粮食供应断绝的时机，到处张贴“投降不杀，每人每天发伙食洋一角”、“投降后每枝枪奖光洋十元”之类的标语和告示，进行政治瓦解。最后，周部士兵走投无路，被迫携械出来投降的人很多；除受降三千多人枪、给资遣散外，还俘虏了一千多人（周文本人逃亡到广西恭城当桶匠，一九三四年经宁远商人告发，何键移文广西捕回宁远处决）。这么多俘虏如何处置？我同阳明山附近几个县

的县长商议，他们都表示：“每人每天一角钱的伙食费，县里负担不了。或杀或放，随你们决定。”我们考虑：这批俘虏是至死不降的“顽匪”，放了会成大问题；长久关起来，既无地方安置，又要花费很大一笔伙食费。正当我们感到难于处置时，欧阳天化、易维扬和我同时接到了张其雄转来何键的命令：将全部俘虏就地枪决，一个不留，以绝后患。道县和宁远的俘虏被分别集中在一个大庙里，在接到何键的命令后，都立即遵令枪决了。欧阳天化团所俘虏的八百多人，被集中在阳明山口的石家洞、荒塘两个村子的中间。有一天，欧阳天化用电话通知我，要我替他买两百根棕绳送出。他将全部俘虏用棕绳捆绑，每一根棕绳绑五个，集中在一个山窝内，架起两挺水机关枪，对准这八百多人疯狂扫射。结果，绝大部分俘虏惨遭杀害，只有极少数人幸而活着逃了出来。满口四维八德的何键，为了地主阶级的“天下太平”，竟不惜犯下这种灭绝人性的集体屠杀的罪行。

为了斩草除根，地主豪绅们对周文部队中被俘的妇女儿童也一个都不放松。有些六七十岁的周部士兵的母亲也被捕杀，其罪名是“匪太婆，不该养出儿子当匪”；被俘的四十多个青年妇女，有半数被杀，其余二十多人被以二十元一名卖掉；还有一些十二、三岁的小孩也同样惨遭杀戮，其罪名是“匪崽子，长大了仍会当匪的。”

这些都是我亲见或亲手办的事。其他各县屠杀的惨状，当可想见一般了。

何键统一团防武装及由此产生的同地方豪绅之间的矛盾

团防武装是各县的地主豪绅对人民群众实行反动统治的实力基础。何键在清乡以及他的整个反动统治时期，一方面依靠各县

的团防武装，配合正规部队，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群众进行不断的军事“清剿”和残酷的镇压，同时，又想法设计将各县的团防武装从地主豪绅手中逐步地攫夺过来，以扩大他自己的政治资本。

从清乡督办署成立开始，何键即利用他实际负责这一机构的机会，将全省军政大权集中于清乡督办署（当他驻衡阳时，还曾正式挂过湖南全省清乡会办署的招牌，后来才更改名称为衡永区清乡司令部）。

从那时起，他就处心积虑地借整顿团防武装之名，采取统一团队枪枝和团防经费等措施，企图逐步控制各县团队。一九三〇年上半年，他进一步实行统一团队编练、调遣、清剿计划、人事任免、工作考核等事权于其全省清乡司令部，实行分区联防，以打破团队县有的传统；并撤销挨户团的乡镇分局，使地方豪绅失去操纵团防武装的凭借。经过整顿之后，县挨户团改设常备队和四乡守望队。守望队按“正户”现住该地之壮年男丁三人抽一、五人抽二的办法组成，作为地主武装的基层组织。县的常备队由各乡守望队抽选队员组成，服役三年，每年抽换三分之一。何键这一套整顿团防的办法在实行时，经常受到人民群众的抵制和地主豪绅的敷衍。

一九三〇年下半年，何键认为挨户团、守望队这类名称沿用已久，对清乡反共没有什么激励作用，通令一律改为“铲共义勇队”。据何键自己解释，这个名称的变更，一方面可使共产党人看到处处都是“铲共义勇队”，因而“无处施其压迫利诱手段”；另一方面，可使“民众以为自己既是铲共义勇队员，如使共匪侦悉，全家必有不测之祸，如此可以促进民众铲共的决心”。实即用这种极其毒辣的手段加强白色恐怖、裹胁群众，企图将广大农民群众

都驱到地主豪绅这一边来，作他们反共的工具。

这时各县常备队的人枪平均约四百多，全省团防武装共有枪三万多。何键将全省划为二十二个团防区，各区设区团防指挥一人，也有以资历较深的县长兼任指挥的。我当时以区团防指挥兼衡阳五区保安副司令（司令为段珩）。一九三一年三月，又改划为二十个区；各区派团防督练员一人，负责整训团队。经过了几年的疯狂屠杀之后，湖南全省几乎变成了一座血腥的大监狱，群众一听到“清乡”两个字，无不谈虎色变。何键似乎也感到这两个字太刺目了一点，遂于一九三三年将全省清乡司令部改名为保安司令部，将全省划为六个保安区（后又改为九个区），各区设区保安司令一员，负责控制各县的团队；县铲共义勇队改为保安团或保安大队。按何键的统一规定，一等县设甲种保安团，辖步兵十二连，或加机枪一连；二等县设乙种保安团，辖步兵九连；三、四等县设甲种或乙种保安大队，辖步兵六连或三连。各县保安团队虽划归各区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调遣，枪械则仍由各县自筹自给。经过这次统一扩编之后，何键所掌握的全省团防武装约有十多人枪（除县保安团、队之外，另有全省保安司令部直属的两个保安旅）。有一次，何键对我说，如果蒋介石要他出兵，他可以抽调三十万人。原属各县地主豪绅的团防武装，这时已成为何键挟以自豪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本了。

这时，湖南人民每年要被迫拿出三百多万元银洋供养团队。一九三五年全省团款岁入概算达四百多万元，几占全省岁入概算的三分之一（全省地方岁入概算为一千三百五十三万七千余元）。这笔巨额支出，主要来自田赋附加，一小部分出自湖田亩捐。湘南各县田赋的团款附加平均按正供一两征银十五、六元，最高的如宜章县达二十元左右。至于各县、区、乡在团款的名义下征收

的各种临时摊派杂捐，更属无奇不有，名目多至一百余种。加以各县团款收缴和经理的杂乱无章，催科衙役来往不绝，大小豪劣层层从中渔利，全省人民所受横征暴敛之苦当以此最为深重。

何键将全省十多万团防武装和几百万团款都抓到自己手里，夺走了原为各县地主豪绅所赖以榨取、压迫人民的凭借，不能不引起他们对何键统治集团的不满。当一九三四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突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北上抗日后，湖南地区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封建地主阶级感到稍为可以安枕了，因而纷纷向何键请愿，要求发还各县的部分团队、团款。我适应着他们这个要求，曾于是年四月呈文何键的保安司令部，提出三项建议：（一）各县无论有无“共匪”，应有常备枪兵一百至二百四十名，以为镇慑地方及搜剿零星“共匪”之用；无论情势如何紧急，此项枪兵不得调出县境，即部分地恢复团防武装县有。（二）将全省现编之团队二十四团及两个独立旅缩编为十八个团，多余枪兵发还各县，编为有枪的铲共义勇队，不足时由各县自行调集民间散枪。（三）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度团款附加由每两征银五元改为四元，以一元作各县有枪义勇队的给养，不敷时由各县自行筹集。这几项建议的目的，在于恢复各县地主豪绅直接控制团防武装和团防经费的传统。我这建议在报上公布后，各县地主豪绅都纷纷发表快邮代电或呈文保安司令部热烈响应。衡阳县的地主豪绅还以各公法团的名义给何键上了一个呈文。文内数说何键“将各县团队编归省有，调离乡井，远戍邻封，闾里失长城之恃，萑苻生窥伺之心。……今精兵良械，悉被编去，仅余数十枝废枪。回忆未并编以前，湘南二十四县，除汝城、酃县、宜章一隅外，从无共匪之影踪，俨有承平之气象。人民购械筹饷，举办团防，剜肉医疮，原期自卫，乃扫数

驱赴前线，毫不惜其身家，揆诸措施之宜，似失忠恕之道。”地主豪绅的当权派为了他们自己鱼肉人民的需要而同何键大争其“忠恕之道”，当然是活见鬼，不过对为数甚多的地主阶级分子和小有产者因负担巨额的团防捐款而引起的怨恨，他们确也感到有点不好交代。湘南二十四县的地主豪绅在以“湘南人民救灾会”的名义指责何键的通电中说：“湘南二十四县每年二百多万元团队饷糈，因团队外调而输送于异县，致使农村破产，地方元气斲伤。”何键对湖南人民的反革命统治，原是以封建地主势力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他们这种内部矛盾的加深，当然会危及他的统治基础，影响他在蒋介石那边押的赌注（他曾吹嘘可以抽调三十万军队）。为了缓和一下各县地主豪绅的不满，何键对他们提出的这些要求，不得不作些让步，令各区保安司令部酌情处理，准各县保留部分团队归县长指挥使用，并将全省团队由二十四个团和两个独立旅缩编为二十个团和两个独立旅。

我在堵击红军中作了替罪羊

我从一九二八年任清乡督察员起，几年之间，替何键拼命出力，得到了他的重用。一九三一年，当阳明山周文部被肃清，江、永、道三县团防指挥唐熙死去，何键便将江、永、道三县并入五县，派我为八县团防区指挥，不久，又提升我为零陵区保安司令。一九三三年，我又奉调为郴州区保安司令，我仍照过去在零陵区的做法，经常往各县巡视“督剿”。一九三四年，萧克率红军先遣部队长征，突入湘南。时何键嫡系王东原师驻防郴县、桂阳一带，一闻红军将通过郴、宜西行，吓得连夜向耒阳撤退，要我防守郴宜公路线。我那时实力只有几百团防部队，也只好让路。等红军大队通过后，王东原才进到郴县，慢慢替红军送行。事后，蒋介石

石追究红军得以安全通过的责任，何键却向蒋介石报告，说是由于欧冠阻击不力，将我撤职查办，并谎报王东原于闻讯后率师由耒阳驰往郴、桂、蓝、嘉等县追击，斩获甚多，应予嘉奖。其实，王东原师的追击只捉到几个走不动的红军徒手病兵。我当时曾向王东原建议：“红军大队尚未过来，如果你们真要迎头打红军，我有一计可供参考，即先将部队埋伏在蓝、嘉、道、宁一线山区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照现在这样尾追送行，是抓不到红军一根毫毛的。”王东原回答得很老实：“尾追、腰击都可以，迎头打则不行。我们有的是仗打，现在何必着急呢？总得留点老本才行”。实际上，何键在多年对红军的“围剿”中，一贯就是这样保全自己的实力以应付蒋介石的功令的。我被撤职后，到衡阳见到二十八军参谋长何友松（宁远人，与我同乡友好），他对我说：“我已对刘建绪军长说过，如果真将欧冠撤职扣押，郴、桂十县，谁来防守？”他又说刘建绪已报告何键，仍要我回郴州供职。后来，刘建绪也劝慰我说：“撤你的职是应付蒋委员长的。红军安全通过了重要防线，不撤办几个将领，怎么好对上面交账？这是何总指挥的苦衷，你务必谅解。”经过他们这样一打一摸，我得到了安慰，又回到郴州替他们拼命去了。

不久，红军长征主力过境，又是经过郴宜一带。王东原闻讯，又事先全师撤到来阳，再退缩到攸、醴线，替何键拱卫长沙、保全实力；他自己则远走长沙，坐以观变去了。临走时，他交给我三万发子弹，令我死守郴、宜。我只好坐困郴城。结果林彪的大军只由距城十多里的乡村通过，我才侥幸度过这一关。但事后何键反责我胆小，没有出城追击。

与湘南游击队的战斗

红军主力全部过境后，一九三五年，老共产党员李林留在湘赣粤边区组织游击队，声势浩大，弄得湘南各县的地主豪绅寝食不安，环请何键划郴州为绥靖区，准许我便宜行事，并停止党政工作六个月，以便我倾全力对付游击队。何键满口答应，立即派我为郴宜绥靖区主任。我抽调郴县、宜章、汝城、桂东、永兴、资兴、桂阳、临武、嘉禾、蓝山等十县团队对游击队进行疯狂扫荡，在六个月绥靖期间，与游击队大小战斗数十次，团队本身也遭到严重损失。尤其在黄茅岭战斗中，保安团一营伤亡大半，只剩下三十名回来。嗣后，李林的游击队因补给困难，群众也经受不了保安团的压迫，多不敢藏匿游击队员，使得游击队员处于严重的饥饿和屠杀的威胁下，走投无路，携械投降的不少。最突出的是李宗保部有三百六十余人携械向我投诚，经我亲自点验后，改编为独立营，移地整训。何键深恐他们“顽梗不化”，将遗后患，终于设计将他们调往平江一带参加“围剿”，暗中将他们全部消灭了，李宗保本人最后也被何键杀掉。

罪恶换来的奖赏

我这样为地主阶级卖力，替何键的反革命统治效劳，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因而被何键引为心腹干员，除全力予我以支持之外，还不断给我以政治上的提拔和鼓励。一九三二年端节前，我到长沙向他述职，他以端节送礼为名给我五百元光洋的奖金，还发给我一块“马日清共纪念章”。何键在这次请我吃饭时对我说：“你能调集团队肃清阳明山的残匪，附近几县的旅省士绅一致称赞你，认为你替桑梓造福不小。虽也有人到我面前告你的状，

但我一概替你承担下来，你是一个不靠什么人情背景、过得硬的模范军人。我一向是用人不疑，今后你只管放手去作好了。”何键这番话正说到我的心坎上，使我深感知遇，更加为他卖力。一九三六年国民党反动政府举办“国大代表”选举，何键圈定我为“国大代表”。那时我任郴州区保安司令，没有花费一块钱，没有请过一次客，就得到了这个头衔，我也自认为这是我“过得硬”的证明。一九三七年，何键自己下台之前，还派我到蒋介石的庐山训练团受训，以为我日后的晋升之阶。所有这些，一方面是何键从政治上着意牢笼，使我死心替他效力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何键对我忠实执行其反共反人民的屠杀政策的奖赏。我的“名气”也因此愈来愈大。一九四七年王东原当湖南省政府主席时，要我到衡阳担任警备司令兼衡阳市长、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和区保安司令等职。我因想活动监察委员的闲职，辞不愿就。王东原有一次找我说：“湘南地方的治安一定要请你负责。你不长期住在衡阳也可以，只要你在那一带贴些你署名的布告，就可以威慑一方了。”我说：“难道你这个省主席的声名不比我更响一些？”他说：“说实在话，在湘南二十七县，我得拜下风，今后非继续借重你不可。”王东原对我的这一番奖饰奉承，自然也是同我忠实执行何键的反革命屠杀政策的罪恶分不开的。

死于我屠刀下的人真是记不清、也数不尽。解放后，通过党的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努力，我的认识有一定的提高，对旧我基本上已无留恋。我写下当年屠杀史实的片断回忆，以为历史见证，并借此表示对人民、对革命先烈的无限愧悔，略抒我对何键的切齿痛恨。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浏阳县清乡屠杀的片断回忆

彭 源 瀚

浏阳是我省著名的革命老根据地之一。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灭绝人性地在这里进行了极其残酷的清乡屠杀。一九二八年“西征军”入湘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派我担任浏阳县长，在任虽只有七个月，做了很多危害人民的事情。现就回忆所及，如实地叙述出来，以存当年白色恐怖的史实。

一

一九二八年，我任国民革命军西征军第四路军总指挥部中校参谋。同年二月，西征军进入长沙，总指挥程潜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及湖南清乡督办。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兼任清乡会办。四月间，省政府任命我为浏阳县长。这个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有一天，浏阳在省士绅邱筱阶（西乡大地主，时在省府有个挂名差事）来访，畅言无隐。他说：“我县为湖南‘五阳’（指衡阳、岳阳、邵阳、益阳、浏阳）之一，不贪不滥，一年三万。县长卸任之日，地方上送三万块钱，是可靠的老例。”起程的前日，向各级长官谒见请训，照例训勉一番，而以何键的指示最具体，给我的印象最深。他说：“浏阳、醴陵、平江都是‘匪区’，而浏阳介于平、醴之间，为‘共匪’必争之地，也是我们必守之地。你的责任很重，到任后应以全力集中清乡，首先就要加强清乡委员会的组织，充实挨户团的力量。实力充足，才好放手办事。宁可错杀，不可轻

纵，有什么困难，可以写信来，我替你解决。”

何键又说：“浏阳驻军现有叶虎臣的一团，最近准备增调一个营去，部队很快即到，你赶快先去到差。在清乡期间，县长的职责，最重要的是坚壁清野，消灭祸根，使‘共匪’无所藏匿。并说：“浏、醴、平地势险要，距省城又近，一日纵寇，百年之患，稍有忽略，将会死无葬身之地。你绝不可徘徊犹豫，致误大事。”

何键的这番谈话，十分露骨地表现他在阴谋策动“马日事变”之后，念念不忘在全省各地制造清乡大屠杀。经他这么耳提面命，我心里也有了底子，决心按照他的指示办事。继而听说叶虎臣团在浏阳达浒吃了败仗，地方团队也被红军打得七零八落，我又有些畏惧，感到要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了。我在旅馆里预先拟好一张布告，内容大意是劝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不许在浏阳实行“烧杀”，如果仅有信仰问题而无实际行动，应责成家族、保甲、学校、行业，负责管教。这种作法，无非是以欺骗手段麻痹革命群众，好让自己安稳地骑在人民头上做太平县官。

二

一九二八年五月初，我由长沙到浏阳就职。当时，对于浏阳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只知道红军在东乡达浒、沿市、官渡、永和、张坊、东门市以及南乡文家市一带很活跃，他们在游击活动中以劣势武装战胜国民党的优势武装，如在达浒一仗中把叶虎臣团打得焦头烂额，溃不成军，挨户团更是吃了许多败仗。在县级反动统治机构方面，县政府分设三科，职员和吏役共计三十多人。警察局有武装警士五十多人，虽驻县城，也常下乡清剿。清乡委员会由县长兼主任，副主任由挨户团副主任董泽汀兼，委员有朱德龙（省清乡督办署驻县督察专员）、吴葛初（国民党

浏阳县党部常委)、周霁光(县政府承审员)、陈阅初、孙发颂、邱伯虞、谭某(各区公所主任)、吴荃芝、宋某(吴宋均系专任)等共计九人,有关惩共案件,均由该会转报省清乡督办署核备。清乡委员会控制的挨户团(团防总局)由县长兼主任,董泽汀任副主任,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寻本然、第二大队大队长陈谟、第三大队大队长李克庆,每一大队辖三个中队,每中队辖三分队,共有官兵约千人,武器仅有步枪,且口径不统一,子弹极缺乏。挨户团士兵主要是由原先的铲共义勇队编并来的,也招募了一些散兵游勇和流氓地痞,其中许多人是帮会分子。全县划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分设区公所,区以下设乡公所,乡以下有保甲长。董泽汀、吴荃芝、陈阅初、孙发颂、邱伯虞等都是全县著名的大恶霸,他们掌握了反动政权和地方武装。“马日事变”以后,农村普遍建立了保甲联坐法,五户一联,以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乡保都各有枪支、梭镖等武器。

我在莅任之初,看到红军势力强大,地方情况复杂,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很想环境早日平静,做个太平县官,与各方面相安无事,下任之日,腰缠三万元,一家温饱可以永无忧虑了;另一方面,何键的告诫对我起了很大的鼓励作用,在这种矛盾心情的支配下,我一方面贴出在省城预先拟好的布告,并在布告贴出的几天以后,召集六七十个被认为有共党嫌疑的青年学生,在县署礼堂听训。我首先叫他们在孙中山遗像面前跪诵总理遗嘱和礼运大同篇,然后宣读清乡条例和布告,并诬蔑共产党一顿,最后交各该校长领回管教。另一方面,想到要巩固自己的反动地位,必须督率团队,配合驻军,加紧清乡反共,消灭祸根。浏阳东乡的达浒、沿市、永和、东门市、南乡的文家市等地,我都带领团队去“清剿”过红军,在任七个月间,约计被害者将近百人。

而在疯狂地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的刽子手时，自己突然发生严重疟疾，病中胡思乱想，怕是宿孽使然，于是，便请了几个和尚，在南市开了七天经忏，超彼往生，并自愿皈依佛法，戒杀放生。实际上是既想立地成佛，又没有放下屠刀。

我在率领团队下乡“清剿”中，没有直接和红军接触过一次。往往根据区乡公所的情报，某地有几百几千红军游击队活动，迨率领团队前往，却又不見一人。这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一、区乡公所的情报不的确；二、红军正确地执行了游击战略方针。

浏阳县监狱在县政府附近，我到任时，在押人犯有八十多人，以后又有由驻军和团队陆续捕送收押的。被捕的人生还者少，丧命者多。县政府所用的刑具或刑法，有荆条、大板、小板、夹棍、敲螺拐、吊打等项。严讯逼供、酷刑拷打是常有的事。虽然也有未曾打过的，但伤于捶楚之下，或释放后在若干时日内因伤重致死或成残废的，约有十多人。袁旦初同志就是在县政府被打伤的一个，又如北乡潘某，是在被打伤释放回家后不久死亡的。一九二八年七八月间，挨户团逮捕了十几个人，以现行烧杀的罪名，送县处理，只审讯两次，就全部杀害了。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农历十月初九），当地一般豪劣为我张筵庆寿的时候，一次处决了在押的十多人（详情见后）。所有被害者，不论其是不是真正的红军，一律戴上红帽子。除这批屠杀外，个别或少数被害者也是一样。有的人在拖出“陪斩”后开释，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也有一个人是在“陪斩”以后又遭杀害的。整个浏阳县，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

三

浏阳大规模的清乡屠杀，经费从何而来呢？县政府的行政经

费和司法经费，历来列入国家预算，在田赋正供项下抵解。其他单位经费，均由地方开支，主要是田赋附加。“马日事变”后，特别是大举清乡以后，在在需要经费，附加额一加再加。浏阳全县的田赋正供为四五万元，而附加税竟超过正供一倍，甚至两三倍。大地主豪绅都是地方当权派，他们不仅不理睬附加，即正赋也积欠多年不缴。粮差胥吏望门却步，县政府也无可奈何。层层摊派的结果，直接遭受压榨最重的是广大贫苦农民。他们既是清乡屠杀的被害对象，又是清乡经费的榨取来源。

此外，征收商捐和其他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也是清乡经费的来源之一。原来规定，田赋附加由田赋征收处代征，商捐等项由商会代征或发包。但是，地主当权派各霸一方，设卡征税，俨然“独立王国”。如陈阅初等未经县府批准，在东乡设卡征收粮食出境税，敛钱不少。又如县府禁宰耕牛，而警察局长阳奉阴违，置之不理，以后就大征屠宰税，有不少的屠户因欠税被逮捕，重罚之外，还遭受拷打、监禁。

浏阳历来为富庶之区，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军阀混战，连年兵祸，国民经济不断遭受摧残。特别是鄂军夏斗寅部驻扎县境时，疯狂搜刮，创巨痛深。“马日事变”以后，反动派的苛索强取，更有甚于夏斗寅者。虽然疮痍满目，我却无动于衷，并且变本加厉地压榨劳动人民的血汗，以满足清乡屠杀的需要。曾记得某次问董泽汀：“清乡经费够了吗？”董说：“不够。”我又问：“为什么不够？”董答：“好多人没有交足，或者干脆不交。”再追问为什么不交时，他说：“你不懂得筹款的秘诀”。并解释说：“前次为增抽附加税向省里请示时，刘厅长（财政厅长刘岳峙）的指令说：‘在铲共前提下，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应准备案。’这段文章，就是筹款秘诀。依我之见，把它通告全县，使之家喻户晓。并规定迟延不

交者，科以滞纳金；倘再顽抗不交，即以袒共究办。这样，还有谁敢不交呢？经费充足，就好整编团队，大举清乡，不正符合刘厅长的指令吗？”一番对话以后，从此照计而行。在“铲共重于一切”的大题目下，县政府以及区乡公所员役追索欠税，急如星火。老百姓因欠税而被拆房屋、牵猪牛、抢衣物，是常有的事；有的人还因欠税而戴上红帽子，绳捆索绑，敲骨吸髓，极人间之惨状。反动统治阶级的吸血者们，到处敲榨民脂民膏，层层贪污中饱，这种残忍贪婪的搞法，带来了老百姓的悲惨呼声：“要钱不要命总算是好的，只怕要了钱又要命，要了命还要钱！”

四

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以前，浏阳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协会成为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勇气百倍地向地主豪绅展开斗争，声势极大。在这年二月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逮捕了反动透顶的县警备队队长唐秉忠，并当场予以正法。县长萧耀也在群众的压力下悄悄地溜往长沙。“马日事变”以后，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挨户团，配合反革命军队，大举“清剿”革命势力，到处非法逮捕和残酷杀害革命群众，全县成了暗无天日的恐怖社会。一年之中被反动派残酷杀害的革命群众，数以万计，惨绝人寰。

我刚到浏阳不久，第二军二十三师周翰团即开来浏阳担任“清剿”任务。随后，该师全部移驻浏阳清乡，周翰和师长朱耀华，都是著名的反共刽子手。这年夏，第六军十九师张棚东部、刘钊部刘济仁团、何键部李少丹团及另一个独立营先后来到浏阳，一时大军云集，向革命根据地展开疯狂进攻。在清乡屠杀期间，我控制了监狱、法庭和地方团队，成为反革命军队的有力帮凶。虽

然事隔三十多年了，有许多狼狈为奸的罪恶活动，还是记忆犹新的。

一九二八年七月，共产党人在平江起义，湘赣边境一带红军势力陡然壮大，国民党湖南省主席鲁涤平电令刘鏊、朱耀华两师前往“进剿”。朱师全部由浏阳推进到平浏毗连之线，实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时，我根据朱耀华的布置，将挨户团一个大队分驻沿溪桥、永和、文家市一带，其余两个大队均拨归周翰指挥，随同“进剿”。当朱、周两个刽子手由县城出发时，我和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吴葛初一道去送行，恬不知耻地恭维他们，说：“公等乃平、浏两县民众的救星。今当戎装倚马之际，更佩为国宣劳。只因大旆匆忙，未及犒劳士卒。异日凯旋，再行郊迎，以表敬意。”事后得知，朱耀华探知红军已从平浏之线向江西前进，便乘机采取大水推沙的手段，向这些地带层层冲刷，一直追到平江长寿街。据随周翰“追剿”回来的挨户团官兵说：这次确实贯彻了逢人便杀、见屋就烧的“三光政策”，特别是平、浏两县毗连的献钟一带杀得最彻底，男女老幼，不能幸免，被害的有一两万人。杀人时因爱惜子弹，不是刀刺，便是活埋。在疯狂屠杀中，某些稍有良心的士兵，也为之手软。平时，周翰的团部驻扎在浏阳县城东门。他的部队出去活动多在夜间，拷打屠杀也多在夜间。被害人数，无法统计。

同年九十月间某夜，周翰匆匆地来到县政府，闯入我的内室，他说：“东街何竹伢子是共产党，她家设有秘密机关，现有许多人正在那里开会，准备在城里暴动，我的部队下乡未回，无兵可派。请你赶快派人把他们抓来，我在立等。”我马上派队兵前去，不久回报说：“我们出发时，街上已无行人，东街更是寂寂无声。我们把何家前后围住，才一涌而入，只仿佛有个黑影从墙上闪过去，追着寻找，渺无踪迹。只有何竹伢子和一个老婆婆，已经带来了。”

此外，没有查出什么证据。”队兵的回报和周翰的说法完全不符，怎么办呢？待我回到内室找周商量，他已不辞而去，临走时只交代工友：“人抓来以后，请彭县长马上把他们处决，我有要事回去了。”既有嘱咐，只得将她们收押。次日到团部再找周翰，他已下乡去了。转身回到县政府，早有一些职员和士绅在等我。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何竹伢子是个妓女，从未离开县城，平日与她往来的都是“正派人”，决无暴徒分子。既不涉及清乡，应请从轻发落。有人接着说：我们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听说前年北伐军过境时，县长不是与她也有杯酒之缘吗？难道一席之欢，就有什么政治嫌疑！经他们这么一说，我想既有这么多人证明她没有嫌疑，又没有拿到丝毫证据，经过这样一番思考，即以秘密卖淫的罪名，罚款开释了案。事后查明，何竹伢子是浏阳著名的妓女，姿色很好。周翰来浏以后，何即被他独占，不料好景不常，师部到浏后，副师长刘某（忘其名字）也悄悄摸进了何家。周虽侦悉，而无可奈何。这天恰好乘着刘到何家过夜，便捏造大题目，假手别人对他侮辱一顿，自己却不露面。队兵看到的跳墙的黑影，正是朱耀华的副师长刘某。

距何案发生不远的某天，接二连三地收到控诉状，控告姜芸兰是“共匪”，她把祖宗牌位夹在裤裆内，是大逆不道。甫经传到县府，又收到几十个人联名的几个保状，证明她没有政治嫌疑，只是恋爱对象的思想可疑，家庭和族众不许她结婚，她就在家吵闹，污坏了祖宗牌。再问原告，只是复诵诉状，提不出其他证据。问她的父母，只含泪说：“求县长作主”。问姜本人，她一言不发，只是啼哭。再三追问，只说：“这是冤枉，求县长作主”。当时我心里打算，她的关键问题在头上的红帽子，如果不避重就轻，破坏她的婚姻，这顶红帽子就摘不下来，问题会变得更严重。因此，

当众宣布：“为婚姻问题而污坏祖宗，是家长管教不严，应予交保开释，另行择配。”这时，在场诸人都不开腔，而姜芸兰则愁眉苦脸地说：“冤枉呀！”我听她喊一声冤枉，便冒起火来，拍着桌案说：“硬要冤枉你这一次，我很明白的！”旁听的人也都附和说：“县长真是秦镜高悬。”过了十多天，与第一科某科员闲谈及此，他说：姜案表面很简单，骨子里却复杂得很。她和某人恋爱成熟，将要结婚，不料章亮基（国民党第十六师师长）部周副师长也爱她漂亮年轻，坚要娶之为妾。姜家一面严拒，一面准备结婚，而周某不仅不死心，且利用他的财势，对姜家进行威逼利诱，并串通姜姓族众包围她的父母。她的父母无法应付，便推在女儿身上，听其自行作主。因此，她本人不得不出面斗争；斗不过那些人，就要孩子气，搬着祖宗牌向地下甩成两半边。不料这样一来更加促使了周某的胆大妄为，所谓原告和保人，都是周所收买的姜族败类。其恶毒用心是：一则先给姜芸兰戴上红帽子，然后将她的恋友罗织成狱，而置之死地；一则保出女方，而将她的恋友趁势拖下水。结果对女方恋友的毒害，虽没有做到，却达到了蹂躏姜芸兰的目的。县府判结后，姜仍不愿另行择配，由于顾虑恋友生命的安全，只好屈志从周，旋被周带到长沙去了。

从上述何、姜两案的叙述可以看出，在“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旧社会，反动统治者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动辄给人家戴上“共匪”、“暴徒”的红帽子，其卑劣无耻到了何等程度。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浏阳一班豪劣地主正在为我张筵庆寿的时候，陡然听到城外断续地发出枪声，并且越响越密。原来正在狼吞虎咽的人，一时被吓得作鸟兽散。我自己也已张惶失措，这时，周翰的副官匆忙地来了，他对我说：“‘共匪’已攻迫县城，本团即准备出击。团长说，城内防堵事宜，全由县长负责。”

这个副官刚出门，周又派人来说：“团长讲，情况很紧张，你如想保全县城的话，就马上消除城内的祸根，执行前几天对你所进的忠告。否则，为了顾全大局，就要派人来洗监。望你当机立断，莫再犹疑。”我同意了他的意见，即时从监牢里拖出有共党嫌疑的十几个人加以处决了。所谓周翰的“忠告”是什么呢？他和我在前几天有如下的一段对话：

“县政府现在关押了多少人？”

“大概有一百多人。”

“既然关了这么多，为什么不迅速处决？”

“尚待侦察审讯。”

“这些人都是你亲自抓来的吗？”

“都是挨户团、警察局、区乡公所抓来的。”

“他们都是本地人，哪里有错抓的。如邵振维是县党部要董泽汀去抓来的，南乡的张某，是孙发颂等抓来的。难道他们闭着眼睛抓吗？而你出巡回来后，对这两个要犯只问过一次，关了好久还不处决，这是为什么呢？”

“纵然都是要犯，也有轻重之分，总要搞清案情才能处决吧。”

“我与你休戚相关，清乡期间大家的责任都很重，不得不进忠告。万一出了岔子，彼此都担当不起的。”

这次大屠杀过后几天，周团营长蒋某（名字已忘记，过去与我在第二军军官学校同学）对我说：你的寿诞很热闹呀！周剃头（周翰绰号，形容其嗜杀成性）开了个大玩笑，真是太煞风景。这时我才恍然大悟，那天城外发生枪声，原来是周翰的恶作剧。我之草菅人命，与周如一丘之貉。因为个人之间虽有矛盾，而反共反人民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如前所述，我是在西征军入湘后，因程潜的关系出任浏阳县长的。到任未及一月，程潜即被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免去本兼各职，并遭拘禁，鲁涤平继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清乡督办。在波谲云诡的政潮中，泰山变成了冰山，顿悟权势之不可恃。加以清乡屠杀惨无人道，自己是实际参与者，扪心自问，内疚弥深；瞻念前途，不寒而慄。因此，于同年底自请辞职，不料竟触怒了鲁涤平，批示撤职查办，由朱耀华保荐该部秘书柳叔戎继任浏阳县长。这一消息传出去，全县就哄起来，吓得我坐立不安。我看到大势已去，怕吃眼前亏，遂于某天傍晚悄然出走。原来腰缠三万元的打算，已如春梦一场了。

我是何键祸湘初期直接参与清乡屠戮的一人，在浏阳做了许多危害人民的罪恶活动。解放后，经过党的教育和自我改造，思想认识有所提高；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参观浏阳农村建设，目睹各项生产丰收，群众安居乐业，对比新旧社会，真有隔世之感。今天回忆这段史实，进一步认清了旧我的丑恶，并借此略抒自己的忏悔心情，向浏阳人民请罪。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何键豢养的一条毒蛇——陈光中

周 桢 唐希扑 戴 岳

邵阳大匪霸陈光中，是蒋匪帮的忠实走狗，是何键手下一条最凶恶的毒蛇。他从当土匪出身，历受招安，更以疯狂地屠杀人民和共产党人，累升至中将师长，一生的血腥罪恶，罄竹难书。湖南解放后，他仍坚决与人民为敌，以国民党隆回县长兼反共救国军司令组织反动武装与人民解放军顽抗，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被解放军围歼逮捕，旋在邵阳公审伏法。

我们以亲见亲闻，结合陈匪旧部口述以及各地人民的控诉，将陈匪一生罪恶史实作概要的纪述，让大家看看这个大匪霸的穷凶极恶的面貌，同时也可反映何键的血腥统治的一个侧面。

从土匪起家到投靠何键

陈光中，原名桂生（后改名桂三），又号德隆，光中是他受招安以后起的官名。他出身地主家庭，原住邵阳大东乡双泉铺附近，后随其继母迁居邵阳市鼓楼亭。他从小父母双亡，赖继母与胞兄凤翔抚养成人。陈凤翔为前清秀才，曾课陈光中以经史，但陈赋性顽劣，不爱读书，偏好使枪弄棍。年甫弱冠，即背其母兄与地方流氓出没花街柳巷和酒馆赌场。由于他生得清瘦如猴，又学得一套猴拳，当时邵阳人给他一个外号，叫“陈三猴子”。

一九一八年北洋军侵入湖南，南、北军发生混战时，陈光中离开邵阳，在长沙勾结流氓聚赌贩毒。他们赌博时，设套玩假，

常使邵阳一带卖木瓢和砂罐的小贩输得空手而回，有的甚至倾家荡产，被迫自尽。后来他更结识了当时驻防四十九标的刘重威团部的马弁李伯蛟（刘、李都是邵阳人），除经常邀集一些无赖到李家聚赌吃喝外，还倚势诈骗，武装走私。

李伯蛟随刘重威离开长沙后，陈光中失去了依靠，经幼年同学谢煜涛介绍到当时驻防常德的第一师贺耀组所办的学兵营当学兵；受训后，即在谢部当班长（谢当时任第一师团长）。一九二三年，部队由溆浦移驻湘阴，他与邵阳人颜藻生合谋劫夺同团第二营营长的马弁的一支驳壳枪跑回邵阳，开始在麦子口一带“关羊”（即拦路抢劫）。随后聚集匪众日多，便在邵阳、隆回、武冈一带到处抢劫，闹得鸡犬不宁。他们抢劫来的钱，除了吃喝，便以之购买枪弹。当时邵阳有些巨商勾结地方官和防军往来洪江、贵阳贩卖鸦片，旅途相遇，亦有遭其洗劫的。他们正想请求将陈招安，以靖地方，适驻防湘潭的十二旅旅长唐希朴派机关枪连长何干回邵阳招兵，遂有人以此商之何干转请于唐希朴。唐部当时刚由骑兵团扩编为旅，正缺乏实力，便欣然答应收编。陈光中虽然接受了招安，却仍心怀鬼胎：一方面凑了三十几支枪，亲自带到湘潭受编，以求得一官半职，光耀门第；另一方面又把好的短枪私藏在邵阳，准备重操“旧业”。唐将他们编成一个排，并入机枪连，委陈为旅部上尉额外参谋。

陈光中在唐希朴旅部住了一个多月，野性难驯，借故请假回到邵阳，冒充奉唐命回邵招兵，啸聚旧日徒众，拿出原藏枪支，又打着“司令”旗号，在邵阳东乡一带抢劫；同时吞并附近零星散匪，扩充实力；对于地方团队则采取见强就走，遇弱就吃的办法。此时驻防邵阳的刘重威，看到陈光中回到自己防区来作乱，并时常暗自勾引他的部下零星地拖枪逃走，便派部队到东乡去清

剿。陈光中以众寡悬殊，又只得要挟邵阳士绅再托何干向唐希并请求招安。

一九二五年秋，陈光中仍狡滑地玩弄两面手段，把大部分短枪留藏在邵阳，自己带了三十几支枪投奔到桃源漆家河唐的旅部来（唐此时任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唐又给他一个空衔差事。年终，陈又借故请假回家过年。翌年春，唐希并派李东林带枪兵一班送他伯父的灵柩回邵阳安葬。三月，唐生智赶走赵恒惕进驻长沙，唐希并和刘重威等均在长沙被扣。陈光中乃趁机煽动李东林，骗取了这一班人的枪弹。当时刘重威部闻刘被扣而军心浮动，陈又勾结李伯蛟等大肆活动，扬言要为唐、刘两旅长报仇，以勾引刘部士兵为匪。不到两个月，他们又啸聚了百多人枪，行劫于黑田铺、白马铺和界岭一带。此时进驻邵阳的唐生智部队，曾派营长陶柳带队进剿。陈便将匪众拖到龙山脚下太芝庙附近，假意向驻在洪桥的陶柳输诚，表示愿意受编。陶柳信以为真，派一个连去接收，却被陈设伏袭击，将该连全部缴械，并击毙连长李某。陈实力突增，乘势又吃掉东乡一些地方团队，便在朝阳寺聚集匪目，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自称“天命司令”。

一九二六年五月，叶开鑫攻占长沙，唐生智率部退至衡阳。周磐率第二师第四旅的一部移驻湘乡，看到陈光中又聚有数百人枪，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便又把他招安过来，编为第六团补充营，委陈为营长。同年秋，北伐军下长沙，周磐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第一团，周任副师长兼团长，陈光中担任第三营营长，并参加北伐，直趋武汉。

一九二七年长沙“马日事变”以后，陈光中野心大发，又脱离周磐，自称反共先遣司令，从沅江经益阳、安化、新化，向邵阳流窜，沿途袭击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到邵阳又乘虚夺取

唐生智部王锡涛旅的一个营的武器，并发出反共讨唐拥蒋的通电，随率匪众流窜武冈、新宁、城步、绥宁和广西边境，疯狂地屠杀人民。他在城步几次打电报给南京的蒋介石，历数唐生智的“罪状”，更竭力赞扬许克祥等在长沙发动的反共叛变，表示坚决反共，因而获得蒋介石的嘉许。一九二八年秋，受委为湘东剿共司令，率部从武冈开到浏阳、平江一带。后复受湖南当局委为独立第五师第二训练处处长（相当旅长）。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湖南省委组织平江起义，陈光中率部截击起义部队，并洗劫当地人民。明年，蒋桂内哄，陈光中奉委为讨逆先遣司令追击桂系；战事结束，仍被调回浏阳、平江待命。此时湖南省主席何键，以为原第五师第一训练处二团团长刘济人和陈光中均系唐希朴的旧部，乃任唐为长岳铁路护路司令以统辖刘、陈两部。唐衔命至平江，陈郊迎甚恭，表示拥护，并要求当副司令。但第二天他突然率众强行军间道由靖港渡河，经宁乡、安化，拖到邵阳老巢去了，唐的护路司令也因此流产。事后，陈的经理处长颜吉阶代陈向唐解释，说陈怀疑何键要唐当护路司令是暂时的利用，目的在缩编他的队伍，所以他决定不如早些离开为妙。陈光中把队伍拖走之后，何键又派谢煜涛往邵阳招抚，委陈为独立第七旅旅长，调湘东兼任清剿纵队司令。

何键对于反复无常的陈光中是不放心的，他想把另外一支力量打进陈部以资钳制。于是在一九三〇年，将戴斗垣残部编成的独立第九旅（旅长童昆）调往浏阳与陈部合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卅二师”，以陈光中为师长。陈知道何键的用意，把童昆旅建制打烂，分割编到自己的基本队伍里去，并采取各种方式，迫使童昆及其所属军官纷纷辞职。这样，童昆的一个旅就白白送给陈光中了。不久，何键令陈光中率部开赴茶陵、攸县“进剿”

湘赣边区的红军。随又拨湘西土著部队陈子贤旅给陈，合编为第六十三师，仍以陈为师长。何键的意图仍在牵制陈光中，所以陈子贤旅虽纳入六十三师建制，实际上陈光中并不能指挥如意。

何键虽收编了陈光中，但始终把他作杂牌军看待。陈光中虽也常存戒心，自己搞自己一套，但在反共的大前提上，他是唯何键之命是听的。在何键每次发生剿共军事时，陈总是自告奋勇，愿为急先锋。所以一般人认为何、陈的结合，是何利用陈反共，使自己部队保存实力，并居功邀赏；陈则甘为其利用，表示忠诚，借以达到自固的目的。这种说法是合乎情理的。但除此之外，陈光中搜刮抢劫来的财富对何也多所贡献。陈就独立第七旅旅长时，路过长沙，曾亲自送何烟土二十担；陈从贵州调回湖南时，一次送云南上等烟土一百五十担，茅台酒四百坛，白木耳一百斤。这只是举两个例子以概一般。

陈光中当了师长之后，虽然没有再公开拖队伍上山了，但其骄横跋扈，深为军长刘建绪所忌。但刘考虑如撤其职，则适逼其变，散其众，又势不可能，乃密谋伺隙暗杀之。一九三七年冬，刘部十六师师长彭松龄于沪战中调职回长沙，适陈光中亦由钱塘江右岸防地请假回湘，逗留长沙。不久，刘的经理处长张干群由浙江携来刘的手令，要彭暗中将陈杀掉。彭有顾虑，没有执行刘的命令（据彭松龄提供的资料）。当日寇在浙江金丝娘桥、全公亭一线登陆后，陈光中稍事抵抗，即撤退到钱塘江南岸。陈因作战不力被调到陆大将官班受训。刘建绪乃乘机控陈不听指挥、纵兵残民等十大罪状；同时，杭嘉湖地区难民亦纷纷向国民党军委会控诉他的罪行。蒋介石不得不将陈交上饶第三战区长官部看管。陈名虽被禁，实则蒋介石暗令三战区长官顾祝同优予照看。他在上饶坐“官牢”期间，仍然住着华丽的公馆，过着优裕的生活，悠

闲自在，宾客盈门。浙赣线总崩溃后，陈也被释回湖南。

陈光中回湘后野心未死，通过周磐与何键的关说，得王耀武任命为挺进军第六纵队司令。他即派其“朝阳兄弟”分途招收徒众，取出历年分散藏匿的武器，并由周磐从驻武冈的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二分校借给一批枪支，勉强凑成三个支队，在武冈、洞口、山门以至衡、祁、邵边境一带鱼肉人民。抗战胜利后，他的部队被编遣，他带着大部分匪众回到邵阳家乡，让各人重操“旧业”，以致邵阳四乡又到处闹匪，他自己则在家里坐地分赃。

控驭部属和扩充实力的种种手段

陈光中以土匪家起，其所以能在何键手下步步高升，当了八年师长，主要是由于他坚决反共、屠杀人民、得到何键的赏识，但陈也还有他一套与众不同的做法，使他的实力和地位获得不断扩大和巩固。兹就其主要的略举数事以说明之。

陈光中部队的人事权完全由他独自掌握，谁也不能过问。部队的核心力量，就是他在邵阳朝阳寺结拜的那些所谓“朝阳兄弟”，连长以上的军官大都是由这些人担任，外人莫想插足。总指挥部和军部派人到师里来工作，他总有办法使他们不能立足。如前所述，何键曾派童昆一个旅插进来，结果是被他吃掉。他为了保持其土匪班底的清一色，即不愿外人进入他的部队，也不愿送干部到军事学校去受训。在他看来，军校学生都是拥护蒋介石或拥护何键的，学了本领回来，就会不认得他了。所以当时的六十三师，对于上级的调训总是置之不理，实在推不脱的时候，才送一两个去应付一下。

当陈还在当新编三十二师师长的时候，他觉得单靠朝阳兄弟，对内固然好驾驭，可是对外应付就有些不方便了。于是，他

决定到外面搜罗一些军校出身的人来充任幕僚。后来，六十三师的参谋长李仲任，参谋处长宁苞和各级的一些参谋人员都是通过各种关系从外面请来的。这些幕僚人员只不过是给陈装装门面，办一办例行公事，实际上，重要的事情都是由副师长李穆明（“朝阳兄弟”）秉承陈的意旨一手包办。幕僚们既然是请来装门面的，因而在生活上也获得陈的特别优遇。陈的目的是希望他们为自己向外作些宣传说点好话；这些人当然也乐得而为之。

六十三师的“朝阳兄弟”，每人都佩有内嵌陈光中照片的金质朝阳会证章，一望而知为师长的拜把兄弟，谁也怕他三分。但是，陈光中对于这些人，却统治得非常严格，不仅可以随便处罚，而且可以任意处死。有个当营长的“朝阳兄弟”朱伯赢（邵阳人），因为不同意陈光中的某些作法，有次在开会时提出要请长假，陈光中满面笑容，当场照准；但暗中示意卫士在送朱出门后将他枪杀了。有一个秘书也是因为要请假回去被杀害的。尽管陈光中口头上常说“道合则留，不合则去”，大家既明知跳不出他的手掌，又谁敢以身试之呢。总之，在陈光中底下作事的人是“顺我者生，逆我者死”。听说在他五百多朝阳兄弟中，先后有三百多人被他杀害。

陈光中常常向部属强调“军人要绝对服从”，他说：“明明是白的，我硬要说他是红的，你们也一定要说是红的，这才算是绝对服从师长，这是军人的天职。”大概是为了树立“威信”，他曾经多次对部属实行集体罚跪，连最亲信的团长李伯蛟、副师长李穆明都不例外。

六十三师虽然有旅的编制，但陈光中深恐旅部侵占自己的职权，规定平常时期，旅部的人员都调到师部工作，旅司令部的旗帜也收藏不用，实际上就是撤销旅部这一级机构，使他能够直接

统驭团以下的部队。但是，到了上面派员来点验，或者有其他需要时，随时又可把旅部一套人马摆出来。

陈光中对于所属官兵，有时也使用笼络的手段，称兄道弟，无所不谈。记得在他吞并了童昆旅之后，心情异常舒畅，有一天在浏阳文庙内集合全师班长训话，一反平日凶暴的态度，大呼：“各位兄弟们，你们个个红光满面，只要努力跟师长干，不久的将来，包你们个个有官当。你们现在不是已经挂上了斜皮带吗？这只是在我们师里，班长才有斜皮带挂（一般部队士兵是系腰皮带）。今天已预兆，你们将来个个前程远大”。这一番话，骗得大家眉飞色舞。随后，他亲自指挥队伍，并师部官佐排列在孔圣大殿前的台阶上准备照相，留下台阶中央雕有双龙抢宝的一块位置，故意喊参谋长坐。参谋长当然知趣，拉着副师长坐在双龙两旁，再推着陈光中坐在龙头上，好似封建帝王坐在金銮殿上一样。陈哈哈大笑，得意忘形。事后，全师班长都换发了新的派令。他们互相道贺，并纷纷表示：只有绝对服从师长，努力“剿匪”，不怕没有官当。

何键统治湖南后，标榜“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所谓八德，曾通令四路军各部和各级行政机关，必须在所有各种公文纸上印上八德字样。陈光中为了逢迎何键，也到处宣扬八德，借以麻痹所属官兵。他所到之处，辄树立当时社会上习惯作宣传用的刻着“淫为万恶首，孝为百善先”字样的石碑，不同之处，是在碑上另刻一大圆圈，圆圈中刻一“井”字方格，井字中又刻“良心”二字，井字八方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这就是所谓“人格图”。图的下面还刻有“各本良心，行此八德；八德勿亏，完成人格”字样。同时，于官佐用的皮图囊、皮壳饭盒上都印上“人格图”，士兵用的干粮袋和油布上也都用油漆绘上“人格图”，并将“人格

图”的内容编成军歌给大家唱。陈在对官兵讲话时常说，一个人一定要这样做（按图上刻的做），才能算有人格。

陈光中也和其他国民党部队长一样克扣军饷，但其方法却与众不同。六十三师官兵薪饷一律分为三等，如一般上尉，打折扣后的固定月薪，一等为八十元，二等为七十元，三等为六十元；少校一等为九十元，二等为八十元，三等为七十元；但上尉连长特别，一律为月薪八十元。当时官兵们把这叫做发“等等饷”。各级官佐除按月领“等等饷”外不准任何人吃一个缺，所有截旷都集中到师部。陈光中虽克扣军饷，但还经常说他的“财政公开”，表示与大家“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他的乘轿后面，常吊着一只装着光洋钞票的箱子。他向大家解释说：“我们这个师，还要当心上面打主意（怕编掉），一旦有事，我们的队伍随便撤到哪个地方去，有这些钱，几个月不怕冒饭吃。”当时大家还相信他的鬼话，因为其他如十六师、十九师甚至两三个月没有饷发，有些士兵还逃亡到六十三师来。六十三师虽发等等饷，到底还是每月兑现，比几个月不发好得多，所以大家也很满意。

发放的薪饷既然与领取来的不符合，这个帐怎样报法呢？陈光中的办法是：由师驻长沙的办事处一手包办，捏造成千上万的假名字，刻出私章，并且连师部的关防也另刻一颗，每月照例造出假名册到四路军总指挥部去领款，真名册是从来不上报的。既然造假，浮报自不必说。至于伤亡或病故的士兵，照例可以领得一笔安埋费或抚恤费，但规定必须缴呈伤亡或病故士兵的符号和尸体照片才能领款。陈光中在这上面也能大捞一笔，办法还是造假，例如伤亡一个士兵，就从不同角度或变换装束将他的尸体照上几张不同的像片，旧符号则由办事处加工制造，这样，死一个人就可领得几个人的钱。

陈光中当土匪时期的武器，多半是一些破烂不堪的东西。被何键收编之后，何对他很不放心，同时他与刘建绪的关系也没有搞好，所以四路军总指挥部对于六十三师的武器装备扣得很紧。为了解决武器装备问题，陈光中除在每次作战后浮报损失外，还在长沙楚湘街设立一个修械所，以重金向汉阳、沈阳和巩县各兵工厂雇来一批技师自己修造。后来扩大为一个规模不小的兵工厂，不仅能造普通车床、刨床、步枪、子弹，还能造捷克式轻机枪、卅节式重机枪、迫击炮和枪榴弹等，产品质量不亚于汉阳兵工厂出品。同时更通过南京的某种关系，向美、英、德等国的军火商购进大批的手枪和冲锋枪以装备他的特务营。陈光中还规定在所有的长短枪的弹巢旁刻上“你拿着这支枪，消灭赤匪，抗御外侮，保卫国家”的字样。

制造了武器，就需要地方储放。陈光中的武器仓库也是狡兔三窟。在长沙的仓库只是挂着一块牌子，存货不多；大部分武器储存在邵阳的仓库里。

灭绝人性的烧杀

六十三师有个“爱民歌”，歌词是：“爱民歌来仔细听，军人先要爱百姓，如今百姓吃了苦，全靠我们来救人，……”这个歌是陈光中亲自和秘书编出来的，师里士兵把它唱得烂熟，不仅每天吃饭或上操之前要唱，甚至在抢了老百姓的粮，杀了老百姓的猪，牵了老百姓的牛而“凯旋”时，还大唱其“爱民歌”。这一点也不奇怪，陈光中的言行除了反共之外从来是不一致的，他口口声声说“良心”、“人格”，实际上，他是一只丧尽良心，灭绝人性的野兽！

一九二八年七、八月间，陈光中在平江长寿街追击平江起义部

队受了挫折时，便在长寿街附近大肆烧杀，单在长寿街一次就杀了七十三人。平江东南乡被其杀害，直到解放后还有姓名可查者达一千七百余（平江代表张玉农在公审陈匪时的控诉）。

一九三〇年八月，陈所部独立第七旅进攻浏阳红军，因渡河时船民逃避，他便令直属部队追回船民三十余人，用马刀砍死在河边。接着又趁黑夜将官渡居民所有房屋放火烧光，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死。陈光中并令刽子手把被杀害人的左耳割下到旅部缴数，由他的军需处长亲自点验发给奖金，每只人耳奖银元五元。一九三一年五月八日到十日，陈在浏阳铁属山、横山、佛岭等地区疯狂地烧杀，共烧毁房屋千余栋，杀人如麻，造成二十里内无人烟。

又据茶陵县人民代表谭光荣控诉说：陈光中到茶陵进攻苏区桃水时，一次杀了工农群众八十多人；进攻严堂、尧水时杀了五十多人；在高垅大桥下杀害七十四人；在腰陂书院杀了革命同志二十四人。

一九三二年，陈光中率六十三师由茶陵进驻江西莲花时，他的几个士兵到梧塘村去搜劫，被村民活捉送交赤卫队。陈迁怒梧塘居民，令李伯蛟团连夜包围梧塘村，在拂晓前将全村男女老幼用刀杀绝。人在哪里，就杀在那里，其中有年过九十岁的老太婆，有初生的婴儿，也有临产的孕妇。陈事先严格规定，每杀一人，必须割左耳送师部过点，并派亲信马弁谢魁梧监点。据目睹者记忆，当时送到师部点数的人耳朵就有好几袋，这次奖金，每只耳朵减为三元。

据当时六十三师的人事参谋说，陈光中对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的疯狂屠杀，事后还得到蒋介石与何键的嘉奖。如何键擢升他新编卅二师师长（陈原任独立第七旅旅长兼湘东清剿纵队司令），

上报蒋介石的理由就是说他“剿共身先士卒，屡建奇勋，安定地方，莠民彻底根绝”。这就是指追击平江起义部队和血洗平、浏的事实。

一九三四年，陈光中随薛岳、刘建绪追击北上抗日红军到达贵州，次年驻防毕节。因当时国民党办事机关层层克扣，补给跟不上，曾通令各部队就地筹饷，就地补给。陈到毕节后，便勒令当地政府和商会筹办粮饷，并派兵到四乡和云南边境的滇雄一带，抢劫苗族人民的绵羊、山药等物资，因遭到黄泥冲、黄家屯、长铺一带苗民的反抗，陈便派师部特务营进行烧杀。在他们疯狂烧杀之下，数十里内，苗寨几无幸存！苗民几无幸免，苗民的财物都被洗劫一空。这次屠杀苗民人数特多，又以刽子手所割耳朵多是被火烧焦了的，所以奖金降到每只一元。随后，他又派特务营将八坝、瓢儿井、朱昌一带的民房拆毁以修建碉堡。陈的这些野兽罪行，又一次受到蒋匪帮的称许。

蹂躏妇女、聚赌抽头

陈光中虽到处宣扬“八德”，到处讲“人格”“良心”，到处刻石立碑宣传“淫为万恶首”，但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与他所说的完全相反，他做的完全是一些灭绝人性，男盗女娼的事情。奸淫妇女是他突出的罪行之一。被他蹂躏的妇女究有多少，连他自己也常说“数不清”。但人所共知，他的妻妾有李、方、杨、糜、唐、罗、刘等姓，究竟谁是妻，谁是妾，大家也搞不清楚。他的这些“太太”都是通过威胁利诱和欺骗等种种手段弄来的。

陈虽拥有许多的妻妾，但还不能满足其兽欲。不论驻防何地，所有公私娼妓祇要有几分姿色，都要免费供其蹂躏。每次行军，总是要打前站的副官找一个有漂亮女子的人家宿营，也就是说，他每天宿营必须找一个有姿色的女子陪他睡觉。部队每到驻防地

点，必由他自己看中一个女子，然后弄来做临时“太太”。他的临时“太太”究竟有多少，就是他最亲信的副官谢魁梧（谢十四岁跟陈当马弁，直到与陈同时被解放军俘虏）也说“数不胜数”。此外，他家里的佣人、婢女也经常更换，多不免遭其奸污。

陈光中蹂躏女性，常使出极残酷的手段，甚至弄得别人家破人亡。一九三七年，他在浙江乍浦强奸一个女教师，被她反抗唾骂，陈当面道歉，但俟其出门，即令马弁中途截住，用刀割其双乳，并用木棒击其下部。在茶陵时，曾要谢魁梧强抢某裁缝店的女儿到师部去强奸，逼得她全家投塘自尽。一九四四年，借故杀他部下某支队长而强占其妻子。一九四八年陈企图强奸邵阳慈善戏院名演员花中喜，逼得她投河自杀。据谢魁梧说，陈光中除强奸女人外，还时常要他找漂亮的幼女供其采补，杨姓和糜姓两太太就是供陈光中采阴补阳的。

陈光中这样到处渔色，恣意奸淫，他的部下自然也“上行下效，有理有则”，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人们将陈光中标榜的“淫为万恶首，孝为百善先”改为“行军奸为首，驻防赌为先”。

谈到赌博，陈光中样样精通，每到一地，除了玩弄女人，便是聚众赌博。赌场只能设在他的“家”里，别人家里不许随便开赌，一般士兵更不许赌博，违者要人头落地。陈对于赌博嫌小不怕大，因为他只赢不输，他赢了可以随时散场，要是输了，一定要赌到他赢了为止。部下输了，有钱拿现钱，无钱写条据，由军需处在发饷时照扣。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光中闲居邵阳，以聚赌抽头为业。他在邵阳城里城郊，根据地点和对象的条件到处开设赌场，计先后开设赌场达十余处。设在小江湖他自己家里的赌场，专招巨商和官

太太聚赌。汽车站的赌场设在伪保长李国斌家里，专招司机和来往行商聚赌。鼓楼亭的赌场设在他的第三个女婿刘德嵩家，勾引小商小贩及肩挑背负的农民去赌。仁美巷的赌场设在何南园家，吸收退役军人去赌。他还勾结特务头子杨可吾在立达绸庄和某盐铺里经常邀请伪政府官吏和商绅聚赌。其他如盟华园则是招待各方来邵的军政人员赌博的地方。旧社会的官府虽然也喊禁烟禁赌，但只是官样文章，或者是吓吓小百姓，象陈光中这样的匪霸，谁还敢去惹他呢？

陈光中家里的赌场有专人看守大门，如果自己输了钱或者头子钱还抽得不多，就将大门上锁，不随便放人出去。赌客输光了，熟人可以打借条，按每天大加一付利息，不太熟的人打了欠条，还要盖铺保，到期向铺保兑现。有时甚至弄假设套，以诈取胜，如某次在某盐铺里聚赌，由老板凌某做假骰子，被当场揭穿，引起风波，但慑于陈的权势终亦莫可如何。他的这些赌场常常弄得一些赌徒倾家荡产，或被迫挺而走险，或被迫卖身、自杀，鼓楼亭一罗姓女人就是在陈家赌输了被迫自尽的。

陈光中既然输打赢要，为什么还有人上他的门呢？说来一点也不奇怪，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堂堂的中将师长，地方官当然要巴结巴结，否则官位也就难坐得稳，做生意买卖的更不消说，处处须仰承庇荫，至于非法特商则更要借势保镳。因此，明知他不好惹，还必须去凑凑热闹。如巨商陶鉴卿、朱维新、永福金号杨老板等，有钱而视钱如命，但遇着陈光中开了口，要借一千，不敢送八百。有时陈光中下帖请客，或者口头相邀，陪客都是一些头面人物（参议长谢煜涛就经常是他的坐上客），谁又愿意开罪他而不去呢？明明知道是钓饵，也得乖乖的上勾。

强占民地，大兴土木

陈光中在家里聚赌抽头，又暗地里坐地分赃，加上过去抢劫搜刮来的钱财，为数当然很大。他以这些钱财的一部分，在儒林街和小江湖修建了两所住宅，其富丽堂皇，在邵阳是无与匹敌的。儒林街的住宅自一九三〇年开始修建，经过十几年，中间几修几拆，仍不满意，于抗战胜利后卖给公家开医院，然后大兴土木，修建小江湖的住宅。

先是，陈在上饶被看管时，曾由其亲信和糜氏太太卖了一些田地，将钱和一些珍贵礼品带到上饶，四处送礼打通关节，使他得以逍遥自在地过日子。抗战胜利后，陈回到家里，他摆出狰狞的面目对人说：“我陈桂三没有签字，谁敢买我的田地！”除当年的谷由他派人去收了不算，还强迫佃户要追算八年的租。那些买了他的田地的人处在他的淫威之下，一个个乖乖地把契子送回去，还要放鞭炮冲喜。他不仅强行夺回已经出卖的田地，而且为了扩建小江湖住宅，大肆圈占老百姓的田地。小江湖周围数百亩田地都被他占用，单是正屋就占了三百多亩，收缴了七十多张契子；后来又要修建花园，他用手一指划，便把附近菜农的几十亩土地又圈占去了。这样一来，农民须经过他家的大门进去搞生产，而他的门口有枪兵和狼狗守卫，进出自然极不方便。于是小江湖的保长就去劝这些人把田地献给陈师长。胆小怕事的人，就用红纸缠着白契，放在茶盒上，亲自放着鞭炮棒送到陈家。但也有些人的地虽被强占去了，契子始终没给送去。当时许多人发了国难财，纷纷买田置地，邵阳的田地价格也一日三涨，但小江湖附近的田地烂便宜也卖不掉，原因就是怕陈光中圈地。

陈光中将在小江湖圈占来的土地，修建一所富丽堂皇的住

宅，除凉亭水阁、花苑书楼、应有尽有之外，还建了躲避炸弹的地下室和四周的碉楼。但由于陈的欲壑难填，他的住宅不断改修扩建，直到解放前夕，尚未完全竣工。

抗战末期在湘西南的作恶

一九四三年，陈光中回到湖南，受王耀武命为挺进军第六纵队司令。他集结徒众凑成三个支队，骚扰于武冈、洞口、山门一带。旋开赴衡、祁、邵边境，名为游击，实则“见敌就逃，见财就抢，见女便奸，见丁便拉”，搞得当地人民未苦于寇，先苦于匪。

当时陈光中部的饷糈，本规定就地筹措。他除向当地政府索取粮饷牲畜等物资外，还在邵阳三民、太乙、中一、中二等各乡交通要道设检查哨和税卡，以检查行人和征收行商税。他们借此留难行人和过往客商，动辄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轻则没收其财物，重则以汉奸论处。许多人被他搞得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

一九四四年，陈光中在邵阳范家山诬尹善夫兄弟为汉奸，罚伪币三千万元（折实物谷一千八百石）并勒捐八百石谷。同年，有江苏常州难民张姓一家四口（原有七人，逃难途中死了三人）逃经邵阳陈光中防区，除财物悉被洗劫外，陈部并将其十九岁的男孩拉充壮丁，将十七岁的女孩轮奸致死。老俩口向陈请求释放其儿子，张老汉反被拖出毒打。他们被逼得无路可走，双双投塘自尽。又如邵阳东乡农民刘玉堂因未送鸡给陈的部队，便被诬为通敌，关起来吊打，罚谷四石，才准交保释放。农民朱训宗的哥哥代商人挑脚，商人欠税畏而逃走，陈光中遂没收其货物，并杀了朱训宗的哥哥。当时沦陷区有许多青年不愿当亡国奴，冒险到内地去，进入陈光中防区，有钱的才可通过，无钱的便当壮丁。陈

的士兵们常对难民说：“有钱方能生，无钱当壮丁，若是要反抗，保你命归阴！”

陈光中不仅横征暴敛巧取强夺，而且常将大批烟叶、辣椒、皮毛、矿砂、桐油运到沦陷区与敌伪交换物资，并往洪江、贵阳购进鸦片送到敌占区去交换食盐棉纱等实物。当时，邵阳地区的物价由于他的操纵垄断而受影响，上涨特别厉害。大家没有盐吃，只好到陈的部队里去买，而价钱贵到一石谷一斤。

陈光中还有一套发国难财的办法，就是常派便衣队混进敌占区，他们不是去打日本人，而是向沦陷区人民勒索抢劫。当其满载而归，便向九战区和重庆报战功。当时的《中央日报》也出现过我某某纵队挺进敌后，歼敌若干的消息，但很少知道这种丑恶事实的真象。

垂死挣扎

一九四六年，陈光中勾结周磐夫妇，奉青帮头子杜心五为师，开辟山堂，广收徒众，企图巩固其封建统治，长期鱼肉人民。到一九四九年，他的爪牙已遍布各地，听得解放军已渡长江，乃纠集徒众，准备所谓“武装逃难”。并暗结心腹李觉明、李仲鸾（李伯蛟之弟）、陈齐、汤宏怀、朱伟文、魏龙溪、刘铁崖、刘竹青、赵汉平、王需、陆赞清、梁正标等十余人组成核心，分赴各方拉拢联络。他们每五天开堂一次，写牌位，发海底，树标签旗，焚香礼拜，按班排位，宣誓传师，吸收邵阳各地地头蛇“出家”。

一九四九年五月，陈光中受白崇禧和黄杰的密令，协助国民党反动军长成刚和邵阳县长丁廉等破坏和平起义。七月，程潜到邵阳主持起义军事会议时，原驻城内省银行邵阳分行大楼，陈光中向程假献殷勤，将程等接到小江湖他的家里住下，借以暗窥动

静。八月初，湖南和平解放，陈光中与成刚、丁廉、李精一等里应外合截击起义部队，并组织流氓匪徒封锁资江渡口和公路要道，截断起义部队的联系，同时向白崇禧和黄杰表示愿为反共效劳。黄杰即委以隆回县长，蒋白匪帮复任命他为“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司令官”。

陈奉令后，即将原散布在邵阳地区的土匪和新招收的徒众凑编成三个支队，派其朝阳兄弟陈齐、汤宏怀等为支队司令，随后又收纳土匪贺幼农入伙，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他在隆回不到三个月，杀害起义干部欧阳辅等及群众二百余人，强奸冷溪山、奉家山一带妇女百余人，抢夺农民的稻谷六万多石，劫杀耕牛牲畜一千七百多头，勒索洗劫人民财物无数（见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资江报》）。

十月，邵阳解放，陈光中率匪众二千余人逃窜新化，又大肆烧杀劫掠。在白溪更杀害益阳军分区后勤科长方发祥及通讯员二人。当时，人民政府仍希望他幡然悔悟，重新作人。经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派专人赴新化陈匪驻地，喻以明路，晓以大义。但陈匪仍执迷不悟，坚持与人民为敌。随即率领残匪回窜隆回，更疯狂地屠杀革命群众，袭击人民解放军部队。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人民解放军一五八师旅顺支队于二十八晚由新化大桥出发直捣水车，歼灭匪众五百余人，陈匪即溃不成军。廿九日晚，解放军奔袭黄金井陈的第一路军袁庆广的总指挥部，一鼓歼匪二千余人，直捣匪巢龙藏湾。陈见大势已去，便携带小老婆及亲信随从向隆回、山门、江口一线急奔，企图冲过公路向绥宁、广西逃命。十二月六日，陈匪逃到隆回谢家冲被解放军追及，他在卫队被歼灭后，爬到杂树窠里躲藏，被解放军捕获。同时被俘的，有他的小老婆和亲信随从谢魁梧等人。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邵阳市飞机场开公审大会，一代杀人如麻无恶不作的巨匪陈光中，终于随着蒋介石反动派的复灭，在万民控诉声中伏法。（陈新宪整理）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何键手下的一名刽子手——曹明阵

田 士 清

“马日事变”后，益阳县大恶霸曹明阵乘势猖狂活动，纠合一批穷凶极恶的土豪劣绅，成立益阳县团防总局，自任局长，在上级反动政府的策动指使下清乡铲共，对共产党员、工农群众和一切进步人士肆意杀害，因而获得湖南反革命头子何键的赏识，由县团防总局局长升充湖南省保安第七团团长，又兼充益阳、沅江、安化、宁乡四县“剿匪”指挥，大权在握，独霸一方，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成为何键统治湖南时期恶名昭著的刽子手和益阳的“土皇帝”。血海深仇，益阳人民至今记忆犹新。现仅就个人亲身经历和见闻所及，记其罪行一斑如后。

曹明阵，号应春，益阳县泉交镇二十里衡龙桥人（益阳县旧属有七镇二十三里）；地主家庭出身（后来因他做了团防局长，地方上称他家是“三尺锄头千杆枪”）；幼时在私塾读了点旧书。清宣统年间，他将近二十岁时，始入益阳县立龙洲高小读书。毕业后，到长沙住过一下法政学堂。当时他虽也以知识分子自命，但于鸦片烟、酒、嫖、赌等败行无所不具。他爱赌，常做宝官，输打赢要，赌到最后知道这一宝会输时，就将碗向上一翻，名叫“冲天”，自己一跑了之。

曹明阵在法政学堂毕业后，曾在某县作过一下法官。一九二五年，北伐军入湘前夕，益阳以地当要冲，各方军队此去彼来，散兵游勇肆行骚扰，一班地富大起恐慌，积极筹办团防自卫。曹

乃乘机攫取泉交镇团防分局长（地主姚洪邺为副局长），开始搜刮钱财，抢购枪枝。为时不久，即拥有马步枪六七十枝。他手中有枪，就逞其凶残本性，草菅人命，动辄加以“匪”名，逡行捕杀。据说，这个时期他在该镇杀的人约千人之多。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攻克益阳，万众欢腾，群情鼓舞。益阳人民同全省人民一样，开始卷入大革命的巨流。一时全县农民运动和党、政、教育各方面的改革，均呈蓬勃气象。尤其是当县、区、乡农民协会普遍成立之后，全县城乡迅速兴起了反封建的革命浪潮。曹明阵则坚决地站在地主豪劣方面，与革命为敌。一九二七年春，泉交镇人民热烈庆祝国民党第九区党部成立，当农民协会的游行队伍经过团防局门口时，曹竟指挥团兵开枪挑衅，当场打死该镇第十五农民协会会长刘少秋，并击伤多人。于是群情愤激，齐向该局冲击。曹见肇祸，乃率团兵从后门冲出，逃往益阳县城，央护城镇团防局长张介藩派兵护送出境，亡命汉口去了。

“马日事变”后，湖南的反动政府立即恢复地主团防武装，对全省革命群众发生疯狂的清乡屠杀。曹明阵这时已回到长沙，蠢蠢欲动，但尚不敢贸然回益。一班在“马变”前曾受到革命群众打击的地主豪绅，认为时机已到，亟图反攻报复。以曹明阵在革命运动高涨时，尚敢公然与革命对抗，现在正合他们的需要，乃由曹在龙洲学堂时的同学、桃江镇劣绅曾国英等代表赴长迎之回县，担任县团防总局局长。他一当上团防总局长，立即夺取了资江对岸的几个乡镇农民协会的枪枝，并收缴地方散枪，成立基本团队；同时，委派亲信爪牙曾爱云、刘梦龙、夏步云、蔡味元等分任县属各镇团防分局长（时称为“团防系”）。只一年多的时间，他直接控制的团队，连同各镇团防分局的枪枝，竟达一千以上。

为了控制益阳县政，他还保其死党、大恶霸地主姚泉香为县田赋征收处处长，姚柱尊为县财产保管处处长，蔡润卿为县团防局枪械委员会主任（蔡为曹的死党“十人团”的头子）。这时的益阳县政府实际已成为他发号施令的工具，他自己则俨然地方上的土皇帝。团防总局不仅掌握着军政大权，有时还直接受理民刑诉讼，连法院也得秉承他的意旨办事。

曹明阵在恢复团防武装、扩充自己实力的同时，积极执行湖南省反动政府的清乡铲共政策，大肆捕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一切进步人士。凡是在“马变”以前参加过农民协会、工会和其他革命团体的人（包括青年学生），一律被戴上“暴徒”帽子，加以逮捕，或杀或囚，很难幸免。他的口号是“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他将人捕到后，辄用严刑逼供，如踩杠子、坐快活凳、灌辣椒水、红铁烙肤、铁丝穿肘种种酷刑，无不采用。每当审讯，鬼哭神嚎，曹本人则高坐堂上，手捧水烟袋，谈笑自若。其残忍毒辣，灭绝人性，令人发指。也有不少的人，在被捕后，未经任何审讯，即遭杀害。真是无法无天。

“马变”后，首先被曹捕杀的为余达材及其女儿余也民。余是益阳县农民协会副委员长余璜之兄，原在县里办过警察，大革命时，他站在革命一边，对各种反革命势力进行无情打击，因此为曹明阵及一般土豪劣绅所嫉恨。“马变”后，他未及逃避，为曹派团兵在城内东正街徐家祠堂（他家住在那里）神龛匾后搜获，同时将其女也民逮捕。也民年十七岁，原系益阳县立女校学生，“马变”前为妇女会干部。他们父女在被押往团防局的途中，即被曹下令杀害。

跟着，曹又据其爪牙密报，分别派人到南县和汉口将“马变”前益阳县共产党的负责人袁铸人和共产党员甘霖捉回。袁被捕后，

未经任何审讯，即遭杀害。甘被关在团防局，曹令其爪牙烧干辣椒粉熏鼻逼供，经过很久，终被枪杀。

“马变”前，第六区农民协会会长陈三元曾率农民武装与曹的团队在清水寺一带作过战，曹恨之入骨，时图报复。“马变”后，陈逃往华容隐匿。次年，曹派兵将他叔父逮捕，押往华容，将陈诱捕回益，严刑逼供后加以杀害，陈被害前已体无完肤。

那时，湖南全省清乡督办署规定在清查户口时将共、“暴”嫌疑分子列入“另册”，须五家联保。这条规定，一到县乡，便成了地方豪劣借机报复、肆意株连的根据。他们捉不到这些人，即将其家属或族人拿来治罪，并乘机进行敲榨勒索。城堡镇文某，被认为是共产党员，曹派兵搜捕不获，遂将其母捉去关押，后来送了光洋二百元作为自请登报通缉其子的费用，始行了事。文某终于被捕牺牲。

一九二八年三月，湖南全省清乡督办署派吴觀光（湘阴人）为益阳县清乡督察员，来县督促协助“铲共”。大桥镇樊巨涛之子某，于一九二七年在省党校时与共青团员田炳信有隙。“马变”后省党校在一批极端反共分子掌握下，发动反动学生四出搜捕共产党人。樊某即由长回益，到龙洲师范查访田的行踪。田未及走避，终被曹明阵捕获，并将我致他的信搜出（信内说，唐生智总司令已回湖南，不许地方豪劣乱捕乱杀，你们对鍾姓恶霸的诬控，可以答辩，不要乱逃）。田被关在团防局，经严刑逼供，两股血肉模糊。我于当晚入监探视时，见状心如刀割。他被曹杀害后，我暗地雇人将他的遗体收回他家安葬。据收尸人说，他死后遍体稀烂，双手掘地甚深，可见其临死时痛楚之深。

一九二八年十月，吴觀光之继室曹氏（益阳酃埠镇人）由家来县城，在搭船时，与熊亨翰烈士之妻詹式南相遇，二人遂同舟

而下。她们两家相去不远，原系熟人。在船上，詹无意中透露其夫已由江西回湖北鹦鹉洲，是来接家眷的。曹氏到县城后，将此消息告知吴觀光。吴即与曹明阵密谋派人到湖北缉拿，并报请何键转电湖北省政府协助将熊捕获，解回长沙，由清乡督办署军法处审讯。军法处以无证据，不便办罪，报告何键。何说：“熊亨翰三字，就是罪证，不必更问，枪决就是。”熊被害后，曹明阵大为快意，吴觀光也因此被提升为益阳县长。

益阳大桥镇十一里（现灰山港公社）的文盛周与十二里（现河淇水公社）王云苏，系青年知识分子，大革命时，曾积极参加群众反对豪劣的斗争。“马变”后，在乡难于安身，又见曹明阵如此滥捕滥杀，虑难幸免。一九二九年春，想外出逃避。某日早晨在县城搭船，甫登轮，即被曹派兵捕去，不三日，被枪杀。

曹明阵仇视进步，凡他所不满的人，无不伺隙加以迫害。我亦为受其迫害者之一。一九二八年七月，曹因在田炳信处搜出我致田的信，便叫益阳县政府将我逮捕。时我正在龙洲师范所办的暑期师范讲习班上课。我被从课堂上拉出押解上船时，犹不知所犯何罪；行至河中，枪兵队长才拿出县政府的拘票给我看，内称：“田士清是共产党员，着即逮捕归案；如图潜逃，可就地枪决”。是晚更深，吴觀光提我去审讯，我一一答辩，他毫无实据可拿，最后在供词上批云：“查无事实；惟致已决共犯田炳信函内，措词不免嫌疑，候调查，暂押。”我在监内起草了一份申辩书，不久他们批了。据说这次是曹明阵批的，认定我是共产党员，表示定要严办（注）。

此批传出，县、区各界咸为惊讶，谓无幸免。亲族故知，四处为我奔走。适全省教育会议在长沙举行，益阳代表张尚平向大会提出我被捕的事，请求援救。省政府被迫电令益阳不得擅杀，

曹对我始末敢遽下毒手，但仍不肯就此放过，硬把我囚禁了三个月后才予释放。

以上所举，只是我个人亲知的曹明阵当时恣意捕杀的几个事例，全县在“马变”后一个时期被他杀害的共产党员、工农群众、知识分子达数千人。

但是，何键对这样一个为群众所痛恨的刽子手却倚为心腹。一九三〇年红军进攻长沙时，何键逃到益阳，曹亲率团队迎护，何对之大为赏识，即升他为益、沅、安、宁四县“剿匪”指挥（仍兼省保安第七团团长）。曹的气势因而更形嚣张，屠杀也更厉害。

曹明阵在任团防总局长时期，其所需清乡经费，大部分出自田赋附加，次为屠宰税和土特产税附加。每次增征附加，例由其爪牙蔡润卿等先期拟定，然后召开所谓公法团会议通过。益阳的豪绅地富对田赋一向是拖欠不缴的，其结果是农民的负担一年重于一年。对此横征暴敛，当时县里无人敢公开反对，间有持异议者（我亦其中之一），不但无效，反多因此遭其陷害。抗战前某年，湖南省政府的教育厅长朱经农和建设厅长余籍传到益阳视察回省后，也不得不说：“只有益阳不得了。我们巡视各县，都有士绅为人民诉苦，只有益阳没有，士绅都替曹明阵歌功颂德。但查悉益阳的团防附加，有七种没有备案，连我们省府都不知道。”

曹明阵的专横跋扈和愚昧无知，在反动统治集团内部也是罕有其匹的。如他常说：孙中山也是共产党，人或驳之，他说：“耕者有其田，不是共产是什么？”他心中所佩服的，只有何键。当他任县团防总局长时，他不但野心勃勃，羡慕并师法曾国藩办团练起家的故事，大办其团防武装，而且师法何键，以“挽回风气”自任，主张恢复箴言书院（清朝胡林翼创办的），还特聘“宿儒”曹焕庵，在乡设立“明耻学社”，招收一批思想落后的富家子弟，

讲授经书。在这些方面，他与何键，确是一脉相承，无独有偶。

曹明阵称霸益阳近十余年，一班豪绅地主仗其势力，残害人民，群众恨之刺骨，叫他做“曹屠户”。当时省保安司令部对其专横跋扈，也感到很头痛。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何键垮台，冰山已颓，而他仍不稍敛迹。保安司令部除撤销其“剿匪指挥”职务外，接着又将其保安第七团缩编为直属保安营。至一九三九年，这个穷凶极恶的“土皇帝”，因拦路抢劫过境军队的枪械，被国民党第四十三师（师长金德洋）协同益阳县政府将其诱捕，解往长沙枪决，了结了他罪恶的一生。

（注）当时国民党益阳县清乡委员会、清乡督察员办公处的批示原文是：

“卷查此案前在已决共犯田炳信家内搜出尔之亲笔书信。其时已在马夜政变之后，益阳适驻熊师王营。尔信内述及控案宜为早了，不可捉出一人云云，而询之团防总局，始悉尔兄田勉斋（即田敏斋）曾被控告，案情重大，旋即和解。以此证彼，其为重大暴案无疑。且是时马夜虽已反正，而共党仍聚集湘潭淦田一带，日望唐生智回湘救济。其首领之包围唐氏，及唐氏到省时之忽现标语，要以打倒三十五军及活捉许克祥等为最显明，此中经过，全湘皆知，凡有血气，鲜不愤恨。尔使非共党，又何致希冀唐之回湘救济以及望与共党田炳信一同大受其赐耶。昨经提讯，对于此点，供词闪烁。兹阅来呈，不叙明此点，遁词知其所穷。盖亲笔书信与其他证据。尤为重要，因亦无所施其狡辩也。尔迭充县视学及护城镇董、学务主任等职，平日又系知识分子，断非盲从者可比。着速供出同党，密报机关，如能因而破获，或可允其自

新。倘始终附逆，妄冀幸免，似此证据确凿，本县长，督察员断不徇情曲宥也。凛之切切。此批。

兼委员长熊德廉 督察员吴觐光”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供稿）

何键的出身和起家

刘 岳 厚

我与何键同乡。一九一六年，何键刚由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被分发到驻在长沙的军队里当见习。那时，我在湖南营产清理处（设在长沙游击衙门，即今尚德街）当科长，何不时来我处聊天；嗣后他和张国威在醴陵搞游击队，我为他们担任过一个短时期的筹饷工作；何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时，我又是他的部下。可以说，我的大半生都是与何联在一起，因而我是比较熟悉何键的一人。现在，我把何键的出身和起家叙述于后。

何键号云泉，后改号芸樵，湖南醴陵人，一八八七年，生于醴陵西乡东冈何家大屋的一个农家。他的父亲名近来，曾以多年佣工和副业生产所积，购置了小量土地；后来为了供给何键进保定军官学校求学，又把这点土地卖掉了。何幼年从邻里凌恩鸿读私塾，旋又从恩鸿之弟恩凤侍读。一九〇三年，醴陵兴办新学，何就在这年入县立朱子祠小学肄业，次年入县立渌江中学肄业。一九〇六年，考入长沙岳麓山王先谦所主办的崇古学堂，读过三年，改入湖南公立法政学堂肄业一个时期。凌恩鸿兄弟是醴陵的封建地主，王先谦是清末湖南顽固反动派的典型人物，何键一生的顽固反动，与他们的思想教育影响是分不开的。辛亥反正后，何键在湖南民政司警务科做过一个极短暂时间的办事员，旋即弃职入湖南将校养成所。养成所停办后，转南京入伍生队入伍，嗣又被分配到湖北陆军第三中学肄业，最后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

期步科，于一九一六年毕业。

何键一生“官运亨通”，其发端则在于浏醴游击队。因此，本篇将着重叙述游击队一段。

何键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发给在湖南暂编第一师（师长赵恒惕）第一旅（旅长宋鹤庚）当见习，旋任少尉排长。一九一八年春，张敬尧继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南北战争重起。他与张国威、刘建绪（张、刘均醴陵人，都在湘军第一师当排长）于湘北战役中湘军败北后，都逃回醴陵。何键在保定军校的三期毕业生中年龄最大，也是富有野心的一人。当他从前线逃到长沙时，由于他心灵手敏，钻营得师长赵恒惕一纸派他往湘东收集溃兵散枪的手令。何键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醴陵后，数月之间，收集了不少的散枪。又值北军张怀芝部溃退，纷纷向醴陵沿株萍铁路（即今浙赣铁路）逃窜。张部军纪很坏，到处奸淫掳掠，为人民所痛恨。铁路两旁农民不约而同地于黄昏时候，揭竿荷锄，拦途截击溃兵散勇，夺获了枪枝数百杆，这些枪枝都先后落到了何键和张国威手中。

何键与张国威是同时搞游击队的。开始的时候，各树一帜，并未统一组织，仅彼此联络，互相支援而已。何家住在醴陵西乡，他的活动范围在县西南的险要山地——君山、明月大桥一带，位于株萍路南；张家住在醴陵北乡，他的活动范围在县东北的险要山地——白竹岭、章仙岭一带，位于株萍路北。张国威起家的本钱得自程昭如（程为当时湘军总司令程潜的胞兄）。程原有步枪数十枝，想自己组织武装，保卫地方，后来因事赴沪，乃将存枪交给张国威。张有了这批枪枝作基础，又收集了一些溃散回醴陵的南军的散枪，还收编了一些地方团防枪兵（例如浏阳普迹市团防队的二十多个人和枪就是由团防局负责人周述濂拖走交给张的）。

当北军张怀芝部沿株萍铁路逃窜时，有一股溃兵被当地农民有意识地把他们引导到白竹岭、千斤牌、塘基洞一带深山穷谷中，使张国威的游击队得以全部将他们消灭。这次所获枪枝近两百杆。至是，张部拥有的枪枝已经超过了何部。综计醴陵境内农民从溃退下来的北军所截夺的枪枝达五百杆以上，都集中到何、张两人手中，加上收集湘军溃散在醴陵（包括浏阳西乡一部分）的枪枝数百杆，总数已近千杆，使得何、张的游击队得以迅速组成和壮大，屡次挫败张敬尧的进剿，从而引起了退驻在湘南的湘军对这支武装的重视和进行收编。

赵恒惕给何键的手令原只是派他往湘东收集溃兵散枪，并未给他以任何部队番号和名称。一九一八年夏秋间，我住在醴陵乡下，曾看到“湖南独立旅旅长何”的布告，当时也没有管他“旅长何”究竟是谁。有一天，在我家对门，忽然遇见何键带着一个佩驳壳枪的马弁从铁路上横过，我猛然联想到“旅长何”的布告，暗自忖度：“旅长何”莫非就是他吗？怎么突然升到了旅长呢？我和他晤见后，便问他：“到处张贴着旅长何的布告，何旅长就是你吗？”他点头微笑了一下。我又问：“你是不是得到了上面的委任？”他说：“我呈报了。”后来浏醴游击队有人告诉我：何键于是年春夏间，曾派罗某化装专送呈文到郴县湘军总部，夸大游击队的实力，并说尚有其他成股的溃兵可以收编，请求成立旅部，以资号召。这就是何键自封旅长的经过。

何键向湘军总部请求编为独立旅，虽然一时没有结果，但湘军总部对于这支武装是注意的。第一师参谋长叶隆柯（醴陵人）尤其重视这股实力。他企图收编何、张两部编成一旅，自任旅长，当然不愿给何以旅长名义，因而向湘军总司令程潜建议，将何键、张国威两部合并，组成为浏醴游击队。程潜接受叶的建议，分别

委任何键、张国威为浏醴游击队正副司令。

何键、张国威奉委后，于一九一八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浏醴游击队正副司令部，就何、张两方面原有枪支各编为一个支队。何键兼第一支队长，辖四个营，以陶广、王本仁、刘建绪、刘德昭分任营长；张国威兼第二支队长，辖三个营，以余湘三、李石如、何敏丞分任营长。此外，还有何键的保定军官三期同学罗斌（邵阳人），由平江兵站往湘南归队，路经醴陵，与何键会面后，也留在醴陵，参加了游击队。后来何以罗在明月大桥与北军作战有功，便任罗为司令部副官长兼第一支队附。不久，将刘德昭一营裁并，只留六个营，正副司令各辖三营，并撤销了支队长、支队附等名义。

刘建绪从搞游击队起就一直跟何键在一起，后来成为何键统治湖南时期的重要人物，他的地位仅次于何，后来且做了何的军事方面的继承人。刘与何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私交甚厚。何键带着赵恒惕的手令回醴陵不久，即两次到刘建绪家，邀刘出来共同搞游击队。刘建绪是个胆小多疑而又机警的人，在湘北作战时，曾以排长代理连长，于败退中丢掉了两门炮，独身逃回醴陵。他生怕上级追究责任，既不敢公开露面，也不敢住在家里，经常东躲西藏。何第一次访刘，刘避不见面；第二次往访，刘仍不在家，何赖在他家不走，最后算是会了面，刘也终于参加了搞游击队的活动。当浏醴游击队初组成时，刘建绪化名刘宏，充任营长。游击队成立不到半个月，张敬尧派兵于端午日向刘建绪家附近一带进剿，捉走了嫌疑犯十人，其中三人被枪毙了，刘建绪更害怕，随又化名为林一简（湖南另有一林一简系黄埔军校毕业的），直到形势稳定，游击队整编为六个营时，他才露出真姓名来。

浏醴游击队从组成之日起，即遭受了张敬尧军的屡次进剿。

由于北军军纪太坏，到处奸淫掳掠以至烧杀，为人民群众所痛恨；而何、张及其所部都是醴陵土著，为了共同抗御北军，他们与群众紧密联合起来，利用有利地形，使北军孤军深入，既不熟悉地形，又无民众可为耳目，因而寸步难移，每次进剿都是受创而退。其时，醴陵县知事王炜彤是于张宗昌部在醴陵大肆烧杀之后来接事的，对于办理醴陵兵祸的善后，颇得人心，与游击队方面亦无恶感（当时，北军的军政人员不能进入游击区，而佩有县公署符号的人可以在游击区畅行无阻）。王认为游击队长此驻在醴陵县境与北军对抗，徒然糜烂地方，一面劝何键、张国威等率部开赴湘南归队；一面向张敬尧建议，与其派军进剿，劳师无功，不如让其开赴湘南，以靖地方。张敬尧采纳了王炜彤的建议，遂有后来湘军总司令派员与张取得协议，将浏醴游击队调离醴陵之事。

何键、张国威的游击队开赴湘南，接受改编，经过不少的波折。

一九一八年冬，何键听说南北议和，吴佩孚部将要北开，湖南局势将有改变的趋势，特专程到浏醴游击队副司令部与张国威协商，认为有必要迅速率部开往湘南。张国威当派李拔夫（现任湖南省人委参事）往醴陵县城打听消息。李的父亲（时任醴陵县劝学所董事）告诉他们：醴陵驻军张宗昌所部已雇好伙子，有开拔模样。何、张得讯后，即派蒋某驰往郴县湘军总司令部，请求从速设法将浏醴游击队调往湘南归队。程潜总司令根据何、张的报告，决定将浏醴游击队调赴湘南改编，并指定叶隆柯负责办理；随又电张敬尧，征得其同意，由湘军总司令部派遣秘书姚大愿驰往长沙与张协商有关从醴陵调走游击队的事宜。在取得张的同意后，何键、张国威即于一九一九年端午节前，率队离开醴陵，

经攸县、安仁、资兴开往郴县。不料军行在途，湘军已发生内变，谭延闿与赵恒惕联合倒程（潜），程被迫离开郴县。浏醴游击队遂留驻资兴待命。由于湘军总司令已由谭延闿继任，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就随之复杂化了。

浏醴游击队的组成和调赴湘南改编都是出于叶隆柯的策划。叶是程潜的老部下，原来准备以浏醴游击队为基础，扩编为一个独立旅，由叶自任旅长，为程潜扩充实力。程下台后，叶失去了靠山，何键便不肯接受叶的节制。当叶隆柯赶赴资兴与何、张会谈时，何键提出了浏醴游击队改编为旅，自任旅长的要求。叶见事不谐，在资兴一宿即返，随派总部参谋李隆汉（醴陵人，保定军校一期毕业生）到资兴向何键疏通。李隆汉说话坦率，他说何键不够旅长资格，劝何拥护叶隆柯任旅长，自任团长，以徐图发展。李的这一席话，不仅未收疏通之效，反而引起了何键及其部下的反感。何键说：“亭长可以做皇帝，为什么我不能当旅长？”至此，叶隆柯编旅的企图遭到了何键的坚决拒绝而成泡影。

叶隆柯编旅失败后，何键一直坚持他所提出的将浏醴游击队改编为旅，自任旅长的要求。何以为游击队是奉程潜的命令成立的，程既下台，他掌握了这一批枪杆子，可以随心所欲地投向任何方面，谁都会欢迎他；殊不知谭延闿、赵恒惕等反程派都认为何是程派的人，他们只想拖走何的队伍，并不倚重何键这个人。更没有料到浏醴游击队内部的矛盾会被人利用，从而瓜分他的部队。

浏醴游击队内部的矛盾主要是何键与张国威之间的矛盾。何与张原系同乡，在保定军校同期毕业，同时当见习，又同搞游击队，以往并无隔膜，只是从组织浏醴游击队、何任司令、张任副司令时起，才开始发生矛盾。张国威认为自己的实力在何键之

上，而地位反在何下，深为不满。但是正副司令的职别是由湘军总司令部所规定的；并且他们的保定军校同学也都一致拥何，甚至张自己部下的同期同学、第一营营长余湘三和参谋长周日昇（前任参谋长张维，号爪云，是张国威的本家，湖南公立法政学校毕业，因不懂军事，后改由周继任）也都拥护何键当司令。张国威胸襟褊狭，处此环境，更为抑郁不安，因而老羞成怒，与何矛盾愈益加深。一九一八年冬，张国威邀我担任筹饷工作，我在他的副司令部盘桓了旬日，他与我闲谈时，经常露出不满何键的言论。他的参谋长兼筹饷主任张维私下对我说：“浏醴游击队只能让芸樵当司令。”张维与我同学交深，所以对我无话不谈。同时我知道张国威是倚畀张维很深的，张维的话在副司令部内部的影响很大。当时，我对何、张之间的矛盾极为耽心，怕他们愈闹愈僵，乃至破裂，因而决心要竭力为他们做团结工作。次年旧历正月元宵前，我为此专访何键，和他倾谈了一晚，分析了张国威的个性和他的内部组织情况，力劝何键顾全大局，计及长远，在可能范围内，对张尽量让步。何键当时表示接受我的意见，但是我默察他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何键与张国威既因争地位而存在着矛盾，湘军首脑遂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口头上佯为表示：允许浏醴游击队改编为一团；暗地里却唆使张、何互争团长。张国威头脑简单，果然落了圈套，突于某日将他所辖的三个营尽数撤离资兴，开至永兴太和墟陈家大屋驻扎，实行与何键分家。当张率部开走时，何曾派兵追堵，因张有戒备（派连长陈培生率队并配备机枪殿后），乃止。张国威率部撤离资兴时，除参谋长周日昇、营长余湘三两人只身脱离张部，继续依傍何键外，其余人枪扫数以行，致使何键顿失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实力，何本人大为恐慌，不仅寤寐难忘

的旅长官职已成春梦，而且在实力突然削弱的情势下，更耽心当时驻在资兴东江的吴剑学（拥有四个营）来吃掉自己的部队。为此，何键曾托资兴县长沈震湘函请吴剑学派员来资兴会谈，借以试探吴的意向。吴派参谋长黄维汉（何键的保定军校同学）到资兴，何对黄表示：愿以一个团的编制接受吴的收编。黄答复：吴碍于赵（恒惕）、宋（鹤庚）关系，不便接受；并劝何仍与张国威合作，于改编前途更为有利。何键探悉了吴剑学的态度后，才把心安定下来。

当程潜下台离郴后，湘军将领都在覬覦浏醴游击队这一部分实力，但都归于失败，最后为唐生智所收编了。当时，唐是第一师第一旅第三团团长，他在湘军中与第一旅第一团团长贺耀组同为两个负有盛名的团长，为师长赵恒惕、旅长宋鹤庚所倚重。关于收编浏醴游击队，名义上由师部主持，实则赵恒惕和宋鹤庚都是以唐的意见为主。唐主张采用分化办法，先说服张国威，然后再相机处理何部。在张国威被说服脱离何键，率部由资兴开到永兴陈家大屋的第二天，唐生智、贺耀组联袂而至，与张还作了竟日之谈。张表示接受改编为骑兵团。张任营长，隶属唐团（名义上隶属第一旅实际编入第三团）。后来张国威和我聊天时说道：“我们搞游击队不过一年工夫，由见习、排长当到了营长，总算不错了；芸樵只想一口咬出猪油来（醴陵土话，是贪欲无厌的意思），想拿我的本钱替他搞旅长，我跟孟夫子（唐生智号孟潇）搞不好些吗？”

唐生智对何键采用了一压一拉的手段：先采用压制的办法，把张国威从何部分化出去，并说服了张接受改编为骑兵团；在何键失去了张国威这部分实力，感到势孤力弱，编旅不成，编团也不成，不得不降格相从的时候，唐才对何部插手，转而采用了拉

的办法，派遣了与何接近的保定军校同学周 燊与何周旋，相约
为创造保定军校集团的前途事业而共同努力，一再对何表示好
感。何键鉴于改编之事已经失败，为了亡羊补牢，只有紧密地靠
拢唐生智才是出路。乃继张之后也接受唐改编为骑兵营，由何任
营长（名义上也是隶属第一旅）。这次浏醴游击队改编的结果，张
国威是心满意足，达到了与何键平起平坐的目的；何键则是事与
愿违，不胜委屈。后来，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的参谋长张翼鹏（醴
陵人，日本士官学生）对人说：浏醴游击队的改编，芸樵获任营
长，他还从中说了不少的话。由此可见，当日何键率领游击队接
受改编，原想待价而沽，以为旅长、团长是唾手可得，不意上则
以与程的关系见忌于谭；下则见妒于张国威，遂使实力分散，结
果不得不俯首听命于唐，降就营长职务，尚有赖于张翼鹏的从中
斡旋。从何键说来，收编的结局就够惨了。

一九二〇年，赵恒惕赶走谭延闿，开庆功会时，何得唐的保
举，提升为骑兵团长，而张国威仍只保持营长位置。不久，何晋
省，住大吉祥旅馆，我向他道贺，他笑嘻嘻地说：“官是升了，但
是只升了我一个人，他们（指他的部下）有些还降低了。”愉快之
情，溢诸言表。此后，何键追随着唐生智，更是水涨船高，步步高
升。一九二三年，升为第九旅旅长；一九二六年，升为第八军第
一师师长；一九二七年，原第八军扩编为第八、第三十五和第三
十六三个军，何升为第三十五军军长。“东征”之役，进驻安徽，
又兼代安徽省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冬，唐生智部被“西征”军
击败后，何键率部退回湘西，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施展纵横
捭阖的手腕，先后攫取了湖南省政府主席和第四路军总指挥。从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统治湖南达九年之久，为辛亥光复
后到解放前统治湖南时间最长的一人。一九三七年离开湖南以

后，先后调任国民党政府的内政部长，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等职务。一九四九年，随着蒋政权的复灭，逃往香港，随又逃往台湾。一九五七年，病死在台湾。

何键利用蒋、桂矛盾取得湖南政权

张 慕 先

北伐以后，蒋介石与桂系长期处在尖锐的矛盾之中，并屡以兵戎相见。湖南地处桂、鄂之间，对于蒋、桂相争，具有举足轻重之势。何键从皖、鄂败退湖南后，利用了这一形势，窃夺了湖南统治地位，并且盘踞湖南达九年之久，为辛亥革命后统治湖南为时最长的人（就全国论，割据地方最久的为阎锡山，何键仅次于阎）。笔者于一九二八年冬起即为何键往来于湘、沪之间（时任武陵关监督）；一九二九年，充任第四路总指挥部驻京办事处主任直至一九三二年冬止。在这数年之间曾经屡次代表何键谒见蒋介石，对于何键附桂和拥蒋的经过，略知梗概。兹就个人经历和见闻所及，略述于后，借供参考。惟以事隔多年，记忆困难，挂一漏万乃至错误之处，在所不免，希望友好加以补充指正。

一、勾结桂系的开始

国民革命军进抵武汉后，唐生智已升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他的第八军扩充为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三个军。何键任第三十五军军长。一九二七年秋，何随唐“东征”，是年冬由皖、鄂败退，撤至湖南的常德、沅陵地区，已势穷力蹙，呈土崩瓦解之势。二八年春，程潜率部入湘。何即利用与程有旧属（张敬尧统治湖南时期，何在醴陵搞游击队，后来经程收编）和醴陵同乡的关系，向程输诚，得到了程的荫护；另一方面，何又利用保定

军校的同学关系，开始与进驻在武汉的桂系将领相勾结。何曾经派遣参谋长江瑞煌前往武汉，与胡宗铎、陶钧等暗通款曲。同时，第三十五军副军长叶琪是广西人，与何共事甚久，私交甚笃。叶力劝何联桂，以另辟蹊径。叶与桂系的重要将领夏威，原有戚谊。何遂通过叶、夏之间的联系，向李（宗仁）、白（崇禧）疏通，获得了李、白的保证：对于退入湘境的唐部三个军，都保留建制，不予编散。于是何商得李品仙（第八军军长），刘兴（第三十六军军长）的同意，由他们三个军长联名通电，向桂求和，表示服从命令，静候移师北伐。结果，李、白把他们收编为四个军，即：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第十二军军长叶琪，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刘兴则以忠于唐而被排挤了。新编的四个军长中，李、叶、廖都是广西人，是桂系的嫡系。何键虽不是广西人，但首倡向桂求和，又与夏、胡、陶等信使往返，早有默契；后来又派张其雄（醴陵人，第三十五军旅长）经常与李、白直接联系；他是从多方面向桂系靠拢的。至是，何键在湖南境内，获得了程潜的公开荫护；在武汉方面，又与桂系暗中勾搭得很紧，不仅保存了实力，而且逐步渗透到湖南军政各方面，取得了部分实权。这是何键勾结桂系的开始，也是他窃夺湖南政权的前奏。

二、何、鲁（滌平）之间的矛盾

桂系将唐部三个军扩编为四个军以后，即将李、叶、廖三个军调赴前线，参加北伐，何键得以留驻湖南，归程潜指挥。其时，程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和湖南清乡督办，即委任何键兼任清乡会办。何对程竭诚拥戴，彼此关系很好。五月间，局势突然变化，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被撤销，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程潜在汉

被扣禁。何键顿感孤立，岌岌自危，除急电李、白，表示绝对服从外，并加紧与李、白以下的诸将领联系，进一步靠拢桂系。

程潜被扣后，武汉政治分会任命鲁涤平继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时，鲁任第二军军长兼第十八师师长，与第二军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同为谭延闿的嫡系，虽随同桂系“西征”，但与桂系貌合神离。桂系用鲁主湘，仅仅为了适应当时环境，减少湘人对于他们扣留程潜的反响，本是暂时权宜之计。这就伏下了后来何、桂互相勾结，驱逐鲁涤平的根源。

鲁主湘后，照例兼任湖南清乡督办，仍以何蝉联清乡会办。当程主湘时，对于清乡督办公署事务，多畀何主持，自己很少过问。鲁继任后，表面上，仍将清乡督办署署务交由何主持，一如程任；但骨子里，鲁、何之间的关系决不同于程、何之间的关系。鲁经常对人说：“只要芸樵先生和我们合作，湖南是可以搞得好的。”弦外之音已可窥见鲁、何之间的貌合神离。他们之间产生矛盾是有根源的：首先，谭（延闿）、程之间素有隔膜，必然影响鲁、何关系；其次，谭、桂之间也有矛盾，何紧密地勾结桂系，不能不引起鲁的警惕；再次，鲁初次主持湘政，对于湘省军政情形颇为生疏，而何对湘事摸索较久，心中有数，加上何之为人，深沉狡诈，不能推诚待鲁，更加深了鲁对何的猜疑。基于上述原因，鲁、何之间的嫌隙，终于在清乡督办署的问题上面公开暴露出来了。清乡督办署是掌握全省地方武装的枢纽。何键继续掌握了这个实权，遂使鲁感到大权旁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因而处心积虑，总想把何赶出清乡督办署，但又苦无善策。此时，适湘赣边区的红军势力日益壮大，给反动政权以很大威胁。鲁乃向南京政府建议，由湘、赣两省大举“会剿”；并与江西主席朱培德商妥了“会剿”计划。根据计划，设立湘赣“会剿”总指挥部。南京

方面于十一月以简电任命鲁涤平为湘赣“会剿”总指挥，何键为副总指挥。鲁遂趁此机会，想把何挤出湖南，一面电南京政府，辞总指挥职务，请以何代；一面向省务会议提议裁撤湖南清乡督办公署，经议决：限于十一月底结束湖南清乡督办公署，另于省府添设军务科（旋改为军务处），并将清乡督办署的全部人员移给“会剿”总指挥部。这就逼使何非就“会剿”代理总指挥职务不可；这样一来，不仅把何所掌握的湖南地方武装的实权剥夺了，并且把他赶出了湖南，让他统率他的第六师（其时，武汉方面已将第三十五军缩编为第六师）到江西去“剿共”。

何为人深沉，对于鲁的这一手，口虽不言，心中有数。他运用了“打太极拳”的手法，一面电呈南京政府，表示愿随鲁一同就职，并请求预筹出发部队的给养两个月、补充弹药和赋予调遣部队的全权；一面向省府提出预发经费三十万元的要求。当时，湖南财政厅厅长刘岳峙以省库支绌，无法应付，拖延很久，迄无着落。何乘机推荐张开琏继任财政厅长，张在赵恒惕、唐生智先后主湘时，迭次长过财厅，对于湖南财政情形较为熟悉，与各方面的人缘亦较好，经常能向省会商界筹借款项，应付急需。何在表面上，拿这些作为推荐张的理由；实则因为张与何是醴陵同乡，私交颇笃，企图借此潜伏私人势力于省府，便于他随时窥视省内动静。鲁为了促何迅就新职，只好迁就，接受了何的推荐。从此，鲁、何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终于发展到何、桂联合驱鲁。

三、联桂驱鲁，窃夺了湖南政权

一九二八年初，桂系势力已由桂、湘、鄂、豫直达北平，白崇禧即坐镇北平，为桂系踌躇满志的极盛时期，因而加剧了蒋介石对于桂系的嫉忌，加深了蒋、桂之间的矛盾。

湖南是广西的门户，当时又是桂系联系鄂、豫和平、津的枢纽，成了桂军的后方，为蒋、桂双方必争之地。鲁滌平率领他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驻在湖南。他们是谭延闿的嫡系。谭、桂之间原有矛盾，桂系以鲁主湘，本是权宜之计，如前所述。此时，蒋介石已在南京复职，蒋、谭之间正勾结得紧，因而蒋对于谭系的鲁、谭（道源）部队，大力予以补充，矛头显然是指向桂系。对此，李、白当然不能坐视。加之蒋介石召集编遣会议，桂系极力反对，使得蒋、桂关系日趋恶化，而桂系图谋驱鲁更是急不容缓了。何键原是依靠桂系得以保存实力并盘踞在湘的。何、桂之间的关系这时仍相当亲密。当蒋阴谋对付桂系之时，恰是何在湘见迫于鲁之日。何、桂之间利害一致，自然而然地促使了何键进一步勾结桂系，共同倒鲁。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何键以报告湖南清乡督办公署结束、各军缩编和有关湘赣“会剿”等事项为名，驰赴汉口，面谒李宗仁；同时，他又组织了第六师参观团前往武汉、北平两地参观桂系部队，以示紧密靠拢桂系。何到汉后，与夏威、胡宗铎、陶钧等往返频繁，款洽极密。胡并陪同何往北平谒见白崇禧。其时，桂系将领自李、白以下都认为湖南当桂、鄂之间，地位非常重要，因而极力拉拢何键，以策应时局的变化。他们表示要何担负湖南全部责任，辞色之间，备极恳切。何亦以受鲁压迫，不满于鲁。他向在武汉的桂系将领表示：“责任是愿负的；但职权有限，万一力不从心，为之奈何？”弦外之音，不言而喻。胡宗铎对何拍胸表示担保帮忙到底，并且说：“鲁咏安（鲁滌平字），由我与煦苍（夏威字）、翠微（叶琪字）来共同对付他，芸兄可置身事外，暂作壁上观；不过湖南内部问题，需要你回湘后，及早妥作安排。”（上述情况是何键的驻汉办事处主任胡燮槐于事后对我讲的）何键到汉与桂系洽商的结果既如愿以偿，

即欣然返湘，于一九二九年元旦就湘赣“会剿”代理总指挥职，亲赴萍乡，成立了总指挥部，并集中兵力，做好应变（倒鲁）的应有安排。武汉方面，叶琪的第九师于一月初，移驻蒲圻、岳阳一带，与何互为犄角。李宗仁则于一月二十日前后往来于宁、沪之间，除窥伺各方面的动静外，并装出一副好整以暇的姿态来掩饰他们联何倒鲁的阴谋，企图在湘事一旦爆发后，他可以诿为不知，从而减轻自己的责任（他们准备用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任免湖南省政府主席，明知这是非法的），为自己预留说话的余地，白崇禧也诡称有病，住入医院，不肯出席编遣会议。其时，李、白侦知蒋回奉化，正在策划和布署以武力解决盘踞长江上游的桂系部队，并且决定要撤销各地的政治分会。他们考虑，如果等到武汉政治分会撤销以后，即将失掉用以罢免鲁涤平的职务的工具，认为军事政治两方面都已形势逼人，不得不先发制人。于是武汉方面邀约何键于二月十三日到岳阳与叶琪密商有关倒鲁的军事配合行动。二月十九日，武汉政治分会决议，撤免鲁涤平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八师师长职务，并撤免谭道源第五十师师长职务。免职的理由是说鲁、谭“把持税收，‘剿匪’不力，重征盐厘，有渎军纪。”同时，任命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当天晚上，何得胡宗铎电告：“汉口之约，今日实现。”次晨，江瑞煌从汉口来电报告：“此间今晨（二十日）开出兵车四列，李（明瑞）、杨（腾辉）两旅计明日拂晓前可以到达长沙。”何得电后，立即驰回醴陵（何部驻防地），以策安全，并暂避嫌疑。何认为如果鲁、叶（琪）发生冲突，他还可以从旁操纵，不会上当。何回到醴陵后，仍玩弄两面手法，用电话告知鲁，说：“鄂方有军车离开，请预为准备。”二十一日，李、杨两旅到达桥头驿，叶琪也乘铁甲车踵至，并以电话告知省府军务处长唐希抃，说明此行任务在于促鲁去职。此时，鲁以兵临城

下，遂决计下台离长，一面电叶，请其暂缓前进；一面召集省府紧急会议。正当鲁设法筹措部队给养和开拔费时，已闻近郊枪声，鲁部戴岳旅当即离长经浏阳向赣边万载仓皇撤退；鲁本人则由省府交涉员李芳接洽外国轮船，乘赴九江，再转南京。鲁部撤退时，何暗为掩护，让其从容撤离湘境，表示他是置身事外，预留他日与鲁见面的余地。对于湖南省主席职务，何接到武汉方面的电令后，仍惺惺作态，借口要勉竟“剿匪”全功，不肯贸然登台，等到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于二月二十七日开会决议任命他代理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电令到达后，始于二月底由醴陵来到长沙，于三月二日就职。

四、倒鲁后，蒋、桂矛盾尖锐化

何、桂联合倒鲁以后，湘事遂成为蒋、桂矛盾的焦点。蒋介石在奉化得知二月十九日湖南事变发生后，即于二月二十四日回到南京，筹划对策，及聆悉鲁涤平面陈事变经过，更加引起了他对桂系的忿怒和仇恨。蒋严厉指摘桂系：（1）免鲁任何，是违背了修正政治会议分会暂行条例第四条“不得以分会决议任免该特定区域内之人员”的规定；（2）撤免鲁、谭（道源）的军职，是违背了编遣委员会的各部队应静候检阅、非得编遣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调动的决议。蒋根据法理，振振有词。当湖南事变发生后，李宗仁自知理屈，他电呈国民政府报告改组湖南省政府的经过，说：“虽事前并不知情，但职责所在，亦应请予处分”；并于二十四日托词患目疾，迁住上海宏恩医院。

在武汉政治分会已经任命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的情况下，蒋介石如何对付何键，当时甚感棘手。既要根据法理，谴责桂系，照理就不能承认何的湘省主席；但是木已成舟，蒋对之亦有鞭长

莫及之感；更重要的是，如果对于何的主席职务贸然加以否认，不仅将使事态更加陷于僵局，并将促使何更加靠拢桂系。为了留有余地，更为了分化何、桂，蒋对何终于采取了迁就的办法。二月二十七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派何键暂行代理湖南省政府主席。拿“暂行代理”四字来转圜，来敷衍门面。不久，南京方面又指派蔡元培会同李宗仁彻查湘事。因为李已诿称事前不知，所以仍派他会同蔡来彻查。这些官样文章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

蒋介石于派何暂代湖南主席，借以暂时稳定何的同时，加紧军事布署，积极准备以武力解决盘踞在长江上游的桂系部队。他调遣了刘峙、蒋鼎文、方鼎英三个师和夏斗寅部集中皖境。桂系也针锋相对，秣马厉兵以待。一时谣啄繁兴，局势十分紧张，但双方仍在相互辟谣。蒋方声称：中央对湘事，期以和平的政治方法解决，决不轻易用兵，致有不幸事件发生。桂系方面，李宗仁于三月九日电南京政府，请辞国民政府委员职，白崇禧也称病辞前敌总指挥职，交由李品仙代理（显然都是要挟蒋介石的举动）。何键在李、白相继辞职的形势下，也不得已于十日迳电南京政府，表示退让，并请求中央转饬部队各回原防，停止军事活动。随后，湖南省政府全体委员于十一日分电南京、汉口两方面辞职。湘、鄂各界也纷纷通电呼吁和平。其时，赣西方面，已有缪培南军约七个团驻靖江一带，鲁涤平部约六个团驻高安，金汉鼎部约十二个团驻铜鼓、修水；广西方面，黄绍竑已令黄旭初部向湘南推进，声称赴鄂应援。桂、赣的军事矛头都是指向湖南，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五、投靠蒋介石的开始

在蒋、桂矛盾尖锐化、双方剑拔弩张的形势下，何键的处境

是困难的。这时，他不是倒在桂系一边，去为桂系火中取栗，而是脚踏两边船：一方面，他不能不仍然就近依靠桂系；另一方面，他开始暗中与蒋介石勾搭。二月底，何得到南京政府明令他暂行代理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电报后，即于三月初，派我赴沪邀同王大桢（即王芑生）到南京去见蒋，代表他向蒋表示感谢之意，并面陈他在湖南处境的困难。三月中旬，我与王到达南京，托贺耀祖为之先容，在黄埔路军校官邸，会见了蒋介石。我们将何所嘱托的话向蒋陈述后，蒋说：“芸樵昨有电来辞主席职，请你们将中央的意旨转告他，不必言辞，希望他好好应付。……”弦外之音，似尚属意于何。随后，我们又拜会了行政院长谭延闿，向谭说明何在当日湘省事变中的困难处境，希望获得谭的谅解和支持。尽管谭对于何联桂驱鲁一事是很难忘怀的；但当时，谭与蒋勾得很紧，他们的共同的、主要的敌人是桂系，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桂系，也为了分化何、桂，谭向我们也就表示了对何的谅解。

何键为什么要我邀同王大桢一道去见蒋呢？这里应当补述一下王、何之间和王、蒋之间的关系。一九二七年，何键随同唐生智“东征”时，王大桢任第三十五军参谋长兼安徽民政厅厅长（其时，何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何败退湖南时，即派王长期驻沪，与各方面联系。是年冬，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王曾代表何键向蒋致送礼物，并代表何去参加了婚典。这是何勾搭蒋的开端。王平时喜欢研究日本问题，自命为“日本通”。时王正廷任外交部长，他曾随王正廷办理鲁案接收事宜。因此，王大桢间接（通过王正廷）或直接向蒋多次条陈过一些对日对策，间常被蒋召见，询问有关日本问题，因而颇为蒋所称许（后来，蒋任王为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何键投靠蒋介石，王大桢是重要的居间人。

六、拥蒋反桂

我见蒋后，即赶回湖南，向何汇报谒见蒋、谭的经过和在南京所了解的有关蒋、桂之间的紧张情况。谒何时，适凌璋（醴陵人，第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后来任四路军政治部主任、秘书长和湖南省政府民政厅长）、张其雄在座。我向何报告以后，遂共同商谈对策。我说：此次蒋、桂破裂，固由于桂系反对蒋的编遣计划和蒋软禁李济深于汤山，但是导火线还是湖南的事变。湖南恐难置身事外。为湖南计，只看如何躲闪得过去，如何可以避免重罹兵祸。张则以为：蒋不可靠；如果目前就表示拥蒋，则桂系部队近在武汉，他们为了顾全后路，势必回师向湘，把实力集中到衡、宝地区，负隅自固；那时，蒋军即令跟踪前进，也难即时得手，很可能形成胶着状态，旷日持久，就会把湖南搞得稀烂。凌表示：或联桂或拥蒋都无所谓，只看如何有利于湖南。当时，何缄默未发一言，仅嘱我晚间再去晤谈。是晚，我如约前往，何对我说：“目前局势紧迫，李、白远离武汉，已失重心，恐难敌蒋。我拟即电朱益之（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字），告以湖南不堪再罹战祸，愿意保境息民。如果他们定要以武力解决桂系的话，请其顾念灾区，莫入湖南境内。看朱如何复电。请你再往南京见蒋一次。”说完之后，即将他亲笔写给蒋的信札交我。我记得他的信中有：“职献身党国，不敢自外，愿矢至诚，始终拥护”等语。我当时反问何：“芸公是诚意拥蒋，抑是权宜之计？请明确指示，以便我对蒋说话时，好掌握分寸。如果是诚意拥蒋，我就对蒋表示坚决拥护，使他深信不疑。现在的局势已经到了水落石出，图穷匕见的地步，没有第二句话好说了。”何答复：“你尽可放心，不必过虑。”翌日，我即首途，经鄂转沪，将何意转告王大桢，约同王驰赴南京。其时，蒋已乘舰

往九江去了，适闻贺耀组将赴蒋处，遂即访贺，告以情由。翌晨，王回沪有所料理后，拟即赴赣，分访朱（培德）、鲁（涤平），然后回湘。我随同贺耀组乘舰前往九江，抵埠后，得悉蒋已乘楚有舰驶往黄州，指挥军事。于是我们仍乘原舰赶到黄州。登岸后，在距离黄州城不远的一所民房内见到了蒋。刚刚落坐，便发现武汉方面有兩架飞机来炸兵舰，盘旋数匝后，掷了数弹，并未命中。我随蒋步行到城边，躲在一个有树木荫蔽的地方。飞机去后，仍折回到原来休息的地方。这时，我把何信交蒋。蒋阅后，问道：

“芸樵确有把握么？”我说：“何主席是决心拥护中央的。如果总司令还有顾虑的话，慕先请暂留此间，以待事实证明。不过他的部队的给养很困难，地方一时不易筹措，请求中央设法接济。”蒋连声回答：“好！好！”接着说：“你仍乘原舰回到九江去向总部（蒋的总部已移驻九江）接洽，并赶快回湘。”他立即亲笔写了一个手令：

“委任何键为讨逆军第四军军长，并拨发该部给养七十万元。”

（当时，何键所部军队每月军费为七十万元。）他将手令交给我，并对我说：“湘省一切要请芸樵负责，遵照中央明令办理。”其所谓中央明令系指南京政府的敬日明令对湘事处理的三项办法，即：（1）夏威、叶琪免职查办；（2）任何键为湖南编遣特派员；（3）夏部交李明瑞，叶部交何键改编。我回到九江后，将蒋的手令交给总部。总部漏夜刻好讨逆军第四军军长关防，并凑集现钞七十万元交给我。我原拟乘汽车经由萍乡回湘，但以长途安全为虑（因携带巨额现钞），适有日本轮船经浔开赴宜、沙，因即改乘该轮西上。临行，请总部代发一电（经萍乡转长沙）告何，请其派轮到城陵矶接候。我于四月四日，由城陵矶登岸，经岳阳转回长沙。当晚，向何复命。何以湖南编遣特派员的任命早已于上月敬日（二十四日）发表，事隔旬日，尚未就职，觉得不大好说，于是，漏

夜电呈国民政府，诡称：“中央敬日电令（处理湘事三项办法），本始由慕先兄转来。”接着说：“拜读之下，毋任感奋！键仰蒙付托之重，自应秉承钧命，竭诚拥护。兹谨就编遣特派员之职。如有违抗中央，甘为叛逆者，誓当枕戈待发，一致声讨，以尽我革命军人之天职。”同时，通电宣布就湖南编遣特派员和讨逆军第四军军长职。就职电送到电报局拍发时，已过午夜，电报局只肯按照收报时间作为“歇电”发出。其时，蒋军讨桂，节节胜利，何为了争取发电的时间，定要将他的就职电报作为“支电”发出。结果，电报局只好诿称军电拥挤，致使何主席两电的发出时间压迟了一些，仍以“支电”拍出。这是何键在紧急关头投蒋的一段小插曲。

何通电就职后，又电夏威、叶琪，劝其遵照中央明令辞职，说：“环境情况，就弟观察，尤有不能不早解决趋向者：德、健两公久留京沪，失所领导；冯方亦未联络；粤陈宣言保境；桂境黄（旭初）部亦已出发，进驻郴、永，其意何在？重以饷糈艰难，军心不易维系；赣中军队已压边境，是政治上、交际上、财政上、军备上均已着着落后。如果战事可恃，行见危险万状，军民俱困；而兄所希望者终不可达也。中央敬电以李旅长（明瑞）兼煦兄（夏威字煦苍）所管，亦如弟代翠兄（叶琪字翠微）之劳。两兄暂贬损行权，则一切问题迎刃而解。默察近情，舍此更无良策。兄等高瞻远瞩，谅在熟筹。务盼立即决定，通电实行，以维全局，是所至盼。”叶得电后，即将门（炳岳）、危（宿鍾）两旅由武汉撤退湘境，交由何键改编。叶本人仅带卫士一排，经长回桂，过长时，曾匆匆与何一晤。何请其绕道邵阳，勿经衡阳，免招人议。后来，叶在桂与友人闲聊往时湘事，自称：“我上了芸樵的当。”李宗仁则尝讥：“芸樵无肩膀（何貌两肩下削）。”（叶、李所言，得自魏镇先生）

七、消除蒋对何、唐（生智）关系的猜疑

何键是唐生智的旧部，而唐向为蒋所深忌。一九二八年，唐下台后，所部三个军长中，李品仙已完全依附桂系，刘兴则被排斥，所部已被编散；独何键得以留在湖南，而且步步高升；所属部队不仅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有所扩充。何、唐之间，藕断丝连。这不能不引起蒋的猜疑。何为了进一步靠拢蒋，也就不得不极力澄清他与唐之间的关系，来消除蒋的猜疑。

桂系武汉之败，固由李、白离开部队，失却指挥重心和李明瑞的临阵倒戈，不战而退；而何键决心拥蒋，大大地动摇了桂系的军事后方，不能不算是重要原因。因此，蒋在黄州时，曾以支电复何（即是复何的就职支电）称：“此次讨逆，赖湘、粤各将领深明大义，一致声讨，大局得以转圜安固。吾兄当与党国同休戚，欣幸何如！”蒋于六日乘楚有舰到汉，何即赴汉谒蒋。蒋对何又当面嘉勉，并且委何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四路军总指挥原系程潜，程去鲁继，鲁去，此缺虚悬），改组湖南省政府，正式任命何为主席。此时，蒋对何可说是奖掖备至，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蒋对于何、唐之间的关系，总不免惴惴不安，所以在正式任命何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同时，委派了他的亲信贺耀组（一九二八年，蒋下野后，贺警备南京，为蒋出力最多，以此深得蒋的信赖）为湖南建设厅厅长。贺的资历在何之上，蒋令其屈居何下，无疑是寓有深意的。此外，蒋还委派郭持平为四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长，刘膺古为第七师参谋长。郭、刘都是浙江人，是蒋的亲信。蒋之不肯完全信赖何，由此可见一斑。其实，蒋之委任何为第四路军总指挥，也正是为了防范何、唐关系的复活。当讨桂之初，蒋已起用唐，委唐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利用唐、桂之间的宿怨要唐驰

赴平、津，收编他的旧部李品仙、廖磊各军。当时，华北各报盛传何键的讨逆军第四军仍归唐指挥。空穴来风，不能不引起蒋对唐的警惕。因此，蒋即将虚悬的第四路军总指挥举以畀何，使何与唐平行，以绝唐念，并坚定何依附中央的心意。何对于蒋的这些措施是心领神会的，但处之泰然，不动声色，以求见信于蒋。

一九二九年冬至一九三一年之间，唐生智很活跃。此时，蒋最担心何、唐之间的关系。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唐在郑州发出歌电，拥护汪精卫，请蒋与汪合作，并与驻防在浦口的石友三呼应反蒋。唐自称为救国护党军第四路总司令，要求蒋的嫡系刘峙让出武汉的防地。歌电列名的除唐直辖的第五路军总指挥所属各将领外，何键的第四路军总指挥所属各将领也都列了名。唐的歌电发出后，刘文岛即电何探询究竟，要何表示态度。这时，何仍想中立于蒋、唐之间，玩弄两面手法，借口保境息民，妄想坐观风色。应付唐的这一方面，则说：“孟公，我是拥护的。希望他能到达武汉，与湖南靠拢，才能显示力量，站稳脚跟；否则，我虽欲尽力，亦无能为，徒然自取倾覆。”对付蒋的那一方面，则以第三者的姿态出现，于阳日以全军将领名义，通电全国，陈述亟应息兵，以救危亡的四点意见。电中有：“请念革命之艰难，悯民众之痛苦，主张正义，倡导和平”等语。何自以为这样表示，既可以反映出他否认自己列名于唐的歌电的意思，又可以顾全他与唐的旧日交谊。结果却大为蒋所不满，立即派遣刘文岛于八日深夜，赶到长沙，对何当面提出诘责。于是，何只好补发佳电，声明：“阳日通电主张和平，一致对外。窃维拥护中央，始克和平；维持统一，始可对外。故键之素志惟在拥护中央，维持统一耳。近以时变纷乘，谣传亦盛，特通电以正视听。”虽只寥寥数语，但悻悻之意，已溢诸言表。唐的歌电发出后，已经旬日，阎锡山不予响应，

石友三部又呈动摇，冯玉祥更意存报复。唐已陷于孤危之境。何遂趁机以“寒电”劝告刘兴、龚浩，要他们“毅然改图，共维大局。”并抄录此电报蒋备案。旋又另以“饒电”致何成濬，说：“郑州事件，弟事先毫无所闻，迨接电讯，深为骇愕！但身许党国，即不应以私废公，陷于不义，故坚持正义，力维治安，并通电拥护中央，以释一切误会。尘苏（刘文岛字）兄来，具见总座推心置腹之隆，感奋党国，宁有既极！承示辟谣各节，相知以心，殷殷爱护，曷胜感佩！”当唐首倡反蒋的时候，何持着首鼠两端的态度，加深了蒋对他的猜疑；及至唐渐陷孤危，何乃倒向蒋方，一再向蒋以至蒋的亲信剖析苦衷。唐下野以后，这团疑云虽已暂时消散，但何、唐之间的关系若断若续，蒋对之始终放心不下。何深知必须解除这个结头，才能进一步获得蒋的信任。一九三〇年，汪、冯、李（宗仁）、唐联合倒蒋。五月中旬，我奉何电召，由南京回到长沙，何面授我以驰赴前线谒见蒋介石的机宜（详后）后，随以闲谈的方式对我慨然说：“刘尘苏每次来湘晤谈，必涉及孟公，深怕我们旧日关系复活。这必是蒋还不放心之故。其实，我与孟公，在政治上，由于各有环境利害关系，见解互异，对于他的政见，我决不敢苟同。但是，他要钱用的话，我总是他的旧属，当然不能忘情，应当尽力所能及，设法接济，绝不推诿。至于平时来往，更是谁也阻止不了我的。说到和他共事，我也有点怕他的手段毒辣呢！”这些话的确出自何的心腑。他习性深沉，平时不肯轻易对人说出这样的话，这次却和盘托出了。这是有用意的，是想我回到南京以后，相机向蒋或者蒋的亲信，透露他的这些肺腑之言。时阎、冯联合反蒋，大战爆发，我代表何去到前线谒蒋，顺便访问蒋的参谋长杨杰。一见面，杨就笑着问我：“孟潇现在北平，非常活动，芸樵对之怎样？”杨的这一问，正中下怀，我就趁机把何上

次对我所说的那些话，转向杨剖析一番，好让杨转告蒋介石。杨听了我的话，只颌首笑笑而已。

八、消除蒋对何、桂关系的猜疑

一九二九年，蒋介石“讨伐”桂系，何键拥蒋反桂，加速了桂系的溃败，一时颇为蒋所嘉许；但是何素以圆滑见称，自从桂系败回广西以后，他与桂系之间仍是藕断丝连，因而时时都为蒋所猜疑；特别是每当国内局势动荡的时候，何不免有些徘徊观望，就更加引起蒋的猜忌，甚至忿怒。一九三〇年初，蒋介石布署何键的第四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和陈济棠的第八路军，第三次围攻张（发奎）、桂军时，张、桂是与北方的阎、冯合作，他们联络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在北平开会，筹谋组织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一时倒蒋声浪甚为高涨。在此形势下，六、八两路军迟迟不前，并有粤、桂妥协的谣传。因此，何键的第四路军也徘徊于灵川、兴安之间，意存观望，以致师老无功，引起了蒋介石的忿怒。当时，我充任何的驻京办事处主任。某天，我奉召见蒋，刚进门，就看到了蒋的态度比平时更加严肃。甫落坐，蒋命左右取一电报给我看。我一看，是何拍致李、白的电报（电报的内容，现已记忆不起了），我还没有看完，蒋已忿然作色，拍案大骂。蒋的骂声夹杂着一些宁波土音，使我听不十分清楚。仅记得他的大意是说：“芸樵暗中捣鬼，中央已经截收了他发给李、白的电报，他莫以为我不知道。你告诉芸樵，要他放明白一点。”当时，我噤不敢作声。经过一二分钟后，蒋的气色稍趋平和，我始徐徐向他解释，大意是说：“湖南地当桂、粤要冲，湘西南山岳地带与桂、粤接壤，向为散兵游匪出没之所。值此多事之秋，人心浮动，为了地方安全，彼此有所洽商，这是势所难免的。何主席处境困难，

有时不能不和粤、桂虚与委蛇，来稳住他们；如果严词峻拒，他们就会勾结边区散匪，从中捣乱，徒然贻患地方。请总座体谅何主席维持地方的苦心，何主席拥护中央的素志是绝对不会动摇的。”这时，蒋的面色稍霁，也就没有再说别的话了。我辞出后，即将会见蒋的情况详电告何。不久，何乘蒋到汉之便，于四月二十日，偕同第七师参谋长刘膺古赴汉谒蒋，除报告有关湖南的军政情况而外，并向蒋婉陈：湖南地当粤、桂门户，处境困难，尔后对于西南，仍须灵活应付云云。当时，获得了蒋的谅解。因此，后来何对于同粤、桂的接洽，并不十分隐蔽；但遇有关键问题，则随时向蒋告密。何经常对人说：“我是联络西南，拥护中央。”何一方面力图减少蒋对湘、桂关系的猜疑；另一方面也颇有“挟寇自重”的味道。一九三〇年六月间，桂系部队攻入长沙，旋即退出。蒋以四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刘晴初有亲桂嫌疑，将其撤免，而以刘膺古继任；接着，何应钦出任武汉行营主任，就近应付桂系，既减轻了何应付西南的责任，也进一步消除了蒋对何、桂关系的猜疑。

九、死心踏地地拥蒋

一九三〇年春，阎、冯、汪、李（宗仁）、唐（生智）联络改组派、西山会议派麇集北平，揭起反蒋旗帜，声势很大。其时，湖南枢纽南北，有举足轻重之势，蒋对何特别担心，既怕他通桂，又怕他通唐，派遣刘文岛经常往来湘、汉之间，借窥动静。何鉴于前此两次的失态，曾引起了蒋对他的猜疑，所以在这次局势动荡中，较为明确地表示拥蒋。他曾对报界发表谈话：“决心拥护中央，促成统一。凡反叛中央者，决以全力对付。”其时，红军在赣的势力剧增，有进攻平浏之势，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在“剿共”军

事上遭受挫败，于四月二十日左右电蒋自劾，请辞本兼各职。同时，张（发奎）、桂军为了策应华北阎、冯的反蒋军事行动，已有放弃浔州，向桂林、柳州集中，倾巢进攻湖南的模样。何于五月中旬，电召我从南京回到长沙，派我驰往徐州谒蒋（蒋已到徐州指挥军事），向蒋报告湖南的紧急情况，并剖陈利害，请求中央派军填防湖南，允许何将讨桂的四路军撤回湖南，集中湘东，以防红军。当时，何键的心情是非常焦急的。我奉命后，于五月二十日到达徐州。适蒋由于军事进展，已赴前方指挥，经由徐州行营电蒋请示，蒋约我到柳河车站会面。我赶到柳河，在列车上会见了蒋。蒋面有喜色（由于刘茂恩诱擒了河南主席万选才，率部投降，大挫反蒋军的锐气）。我对蒋报告了张、桂军响应阎、冯，有倾巢犯湘，企图直趋武汉，和江西红军有进攻平、浏，威胁长沙的危急形势之后，接着说：“湖南兵力单薄，顾此失彼，万一有何疏失，均足影响全局，有负中央付托之重。何主席感到应付棘手万分惶急，特要慕先前来请示机宜。”蒋对于何拥护中央，表示非常嘉慰，接着说：“关于湖南的军事布置，我已经根据日来情况，电告芸樵，希望他放手去干，只要不逾越中央所指示的范围，不会要芸樵一个人负责。如有紧急情事，我要坐苏随时赴湘，与芸樵商洽。”我于见蒋以后，往谒参谋长杨杰，开始谈了一些有关唐、何之间的关系（已详前段），随后，我请教他对于当前形势的看法。他说：“阎、冯之间以及阎、冯与其他各派之间，各怀鬼胎，意见不一，政治上是脆弱的；至于军事方面，阎军与冯军在给养上有差别，很难同心协作，结果是要失败的。但也不是一两个月所能了局，可能要打一两场恶战，才能解决。请转达芸樵，希望他坚定意志，拥护中央。对于湘事，中央是要他支撑的。”当日，我就原车回徐转京。回到长沙，已是六月二、三号了。这是何键在最

大的一次风浪当中，坚决倒向蒋一方面的经过。

一九三〇年六月五日，桂军一度攻入长沙；七月二十七日，红军攻入长沙。两个月之间，长沙两度失守，给予了何键以重大的打击。其时，京、沪、汉的湖南同乡会纷纷向南京政府请愿，请求惩办何键，以顺舆情。他们办有《大风日报》和《洞庭波》之类的刊物，攻击何键，不遗余力。蒋没有理会这些，并且表示：“何在军事上，都已事先向中央陈明，并且是遵照中央的指示做的。一切责任应由中央担负。”对于长沙的失守，蒋更公开发表声明说：“中正应负其咎”。所有外间对何的指摘，蒋都一肩扛起，以致反何之风逐渐消沉。这些都使何衷心感激，尤其是“中正应负其咎”一语，更加深了何对蒋的感恩图报之心。从此，何键便死心踏地地倒向蒋介石了。一九三一年，粤（陈济棠）、桂联合反蒋，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出师攻湘。事先，陈、李曾电何，商请合作，为何所严词拒绝，并责以“师出无名”。一九三六年，粤、桂以抗日为名，发动反蒋。陈、李又都秘密派了代表来湘联何，何也向蒋告了密。这些都是何键死心踏地拥蒋的具体表现。

何键联桂驱鲁和附蒋讨桂经过

彭 松 龄

联桂驱鲁

一九二八年春，西征军入湘后，何键不仅保留了第三十五军军长，并且兼任了湖南清乡督办署会办（督办由省政府主席程潜兼任）和省政府委员。此时何的第一师戴斗垣部驻沅陵、第二师刘建绪部驻湘乡、第三师陶广部驻安化。五月下旬，武汉政治分会撤免程潜本兼各职，任第二军军长鲁涤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清乡督办，何键仍蝉联原职。所有清乡督办署的实际工作，概由何全权处理，鲁则仅负督办之名。

武汉政治分会表面上是代表伪中央处理两湖的军务和政务，实际是由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所操纵，是一个桂系的封建割据机构，反蒋情绪极浓。鲁之主湘，初虽系武汉方面令派，但随后仍受命于“中央”。其所率领的第二军，前身就是谭延闿所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此时谭正任国民政府主席，鲁自然比较接近“中央”。由是鲁桂两方就同床异梦，互相猜疑防范，日甚一日，但彼此仍虚与周旋，以待形势的发展变化。

鲁何之间，此时虽无显著冲突，但心理上实多磨擦。何键感到湖南有鲁，自己即无在湖南图发展的余地，始终只能居于“省府委员”、“会办”等助手地位，欲完全掌握湖南的地方政权，必驱鲁而后可；他同时理解到武汉的桂系军人是反蒋的，反蒋自然

也是反鲁的，他们此时虽然没有公开喊反，但对鲁嫉妒日深，则系实情，驱鲁的目的是相同的。何与桂系将领多系保定军校同学（鲁非保定军校生），容易拉上关系，他就抓住这个机会来联络和利用他们。一九二八年秋，何派我赴武汉（时我任三十五军军部参谋处长）以向政治分会报告该军训练及清乡等情况为名，与胡宗铎、陶钧、夏威等人联系。因胡、陶均鄂人，与我同乡，又系保定军校同学，易于接近。我到汉后，与胡、陶谈及湘省政情，胡、陶表示：湘鄂一家，芸樵（何键）又系同学，盼其今后紧密连系，团结一起，增强和扩大力量，以资应付外变云云。我回湘以胡、陶之意告何，何此后即时常赴汉，与桂系军人拉得很紧。鲁见此情形，甚感不安，但又莫可如何。鲁何二人的部下，也都隐隐知道这个趋向，平日虽然互相应酬，但彼此心中疑忌。某次，桂军第九师师长叶琪由鄂来湘，鲁在宴叶席上对同座的人（我亦在座）说：湖南的事，只要芸樵肯替我帮忙，是大有可为的。由此可以看出鲁的不安心情。

一九二九年二月初旬，何键又到武汉。胡、陶告以武汉方面已决定驱鲁，嘱其回湘善为准备。何复于十三日约晤叶琪于岳阳，密商军事，十五日返长沙，旋即前往醴陵。十九日下午九时许，何之参谋长罗藩瀛、师长陶广和我正在胡达的家里吃饭，何的军部送来电报两份给罗：一为胡宗铎、陶钧致何电，言驱鲁军事，本晚发动；一为何的驻汉代表江瑞煌致何电，告以武汉方面已令杨腾辉、李明瑞两旅桂系精锐部队于本晚向长沙进发驱鲁。罗藩瀛接此二电后马上去电醴陵告何，一面派我去桥头驿与南来的桂军连系。我不待席终，即赴长沙火车东站商借手摇车一辆坐往桥头驿，到达时已是翌日拂晓了。当于该处车站桂系部队所乘的铁甲列车上会到了李明瑞，我代何向他们致欢迎之意，并告以昨晚

十时许我离长沙时鲁尚未知武汉方面已有军事行动。语毕，李即驱车向长沙急进，我亦同车返长。

当胡、陶电何，告以发动了军事行动之后数小时，叶琪也由汉电鲁，说武汉已于本晚发动，表示他个人人微言轻，莫可挽回，请鲁自决。鲁于深夜接此电后，即匆匆开了一次省府紧急会议，宣告退职；命其所部戴岳师经平江、浏阳向江西撤退，自己则携眷属乘轮船经九江赴南京。

桂军入湘列车驶抵捞刀河，将鲁之少数掩护部队驱逐后，即迅速进入了长沙城。李明瑞、杨腾辉二人被何键的参谋长罗藩瀛、师长陶广、戴斗垣等人迎入了湖南省政府，询悉鲁部戴岳师已向平、浏撤走，当即决定将长沙城区治安交戴斗垣负责维持，自己马上率领所部向平、浏方向追击（亦仅追至平浏而止）。

鲁部的谭道源师当时驻在常德，武汉方面令叶琪前往解决。叶与谭部激战于新兴嘴、青皮桥等处（叶部第二十五旅第三团团长沙彭位仁在此役负伤）；何键部李觉团复由桃源向常德佯攻；谭两面受敌，且悉鲁已离湘，遂于二十八日向大庸方向撤走。

鲁既于二十一日离湘，当日湖南省政府举行临时会议，推曾继梧暂行代理省政府主席职务。二十一日武汉政治分会明令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电到长沙时，何键尚在醴陵未归，由其参谋长罗藩瀛去电告知，请其来长沙主持。何键于二十七日由醴来长，而武汉方面派来担任何键就职时监督的胡宗铎、陶钧和前来观礼的夏威等人也来到长沙与何欢晤。此时何键假装谦逊，迟迟不肯就职，直至南京方面的中央政治会议于二月二十七日开会决议派何代理湖南省政府主席，此项电令到达长沙后，何键始于三月二日就职。何认为既接受了武汉方面的委任，又遵守了南京方面的命令，正是何的两面手法，为后来附蒋打好基础。

附蒋讨桂

何键以勾结桂系军人、利用武汉政治分会权力，驱走了鲁涤平，出任了湘省府主席，仍兼军职，总揽了湖南的政、军大权，可谓踌躇满志。惟蒋介石对桂系此次驱鲁之举，大为气愤，认为是擅自撤换“中央”所任命的封疆大吏，更“没有给谭院长留面子”（蒋介石为此事在南京所发表的谈话中有此一语，见当时报载）益以桂系割据武汉以来，对“中央”遇事抵抗，深感不满，早有削除他们的打算，今既有口可借，乃于三月下旬明令讨伐桂系。蒋亲率刘峙、蒋鼎文、徐源泉、方鼎英等部向武汉进发。当以上各部到达皖西，桂军正在武汉布防，准备迎拒之时，何键又要两面手法，一面派王芃生（何主皖时的民政厅长，此时任湘省府参议、顾问等职务）、张慕先去九江谒蒋；一面派我去武汉与胡、陶等周旋。王、张在九江会到了蒋介石，代何致拥戴之意，从而探悉桂军将有内变，但未得其详；返以告何，何则未以告桂。我到武汉后，即代何向胡、陶说明愿意协防之意。胡、陶则谓：当前蒋军多系杂色部队拼凑而成，战斗力极为薄弱，而武汉方面则纯系桂军，团结得紧，战斗力强，战事确有把握，不劳芸樵为念且不烦湖南出兵，足可歼灭蒋部，进而掌握“中央”，前途大有可为云云，未料其变生肘腋也。

缘蒋介石事先已通过俞作柏秘密收买了桂军李明瑞、杨腾辉两旅长，正当蒋桂两军相接之时，该两旅忽然叛桂附蒋；何应钦又密囑原任周斓部师长、上年被桂系编并去职、此时闲住汉口的罗霖，出而掌握其被编入桂军之旧部，发动火线倒桂（何应钦致罗函称：罗霖同志勋鉴：已委同志为独立第四旅旅长，委状关防另发，请即发动……云云——事后见武汉报载）；原任周斓部师

长、上年被并入桂军而降为团长的彭位仁，亦率该团于鹦鹉洲以西阵前倒戈；由是桂军战线内溃，一枪未发，遂于四月二日夜放弃武汉，西撤荆沙。蒋介石于四月五日到达汉口。

当桂军放弃武汉西撤时，何键又要派我往武汉迎蒋。我说：“早几天代表你赴武汉拥桂拒蒋的是我，现在代表你赴武汉反桂迎蒋的又是我，我在武汉的熟人多，况且桂军虽已西撤，一定还有它的一些军官留居武汉，他们看到我这样反复无常，必然会耻笑我，我不愿去。”何键说：“只要湖南能免于战祸，别人自然会原谅你。”坚持要我迅速前往，我只好勉强就道。车抵岳州，以鄂境铁道交通尚未恢复，乃改乘小火轮赴汉。到汉后，即往蒋的行辕，先会见了行辕参谋长贺国光和作战科长王伦，我向他们谈及何键在湘并未派兵助桂“犯上作乱”的情形。贺、王说：蒋已接得了何键派你来汉报告军情的电报，并已复电嘉赞其深明大义。不久，通过贺国光的传达，我会见了蒋介石。蒋候我说完了“此次桂系叛乱，何键虽隶属于武汉政治分会，但并未出兵助桂”的简单几句话后，对我说：“我在途中已接见了王芃生，知道了一切。芸樵很好，很好。你去电告诉他，安心工作，还是要他当湖南主席；我还想把他的部队加以扩充整编，使能为党国出更大的力；等一两天，我就会把军队扩编办法告诉你。”等了一天，蒋召我去对我说：“现决定把湖南的军队整编扩充，已颁发了编制表，你可与贺参谋长就细节进行商讨后，即携带编制表迅速回湘办理，并将高级军官姓名电保来汉以备任命。”行辕并推荐了刘膺古、郭持平两人（均浙江人）来湘，在湘军中以参谋长任用。

这次扩编的内容是：除原驻湘西的陈渠珍部编为一个师外，何键所属部队扩编为三个师及两个独立旅。

我回湘将以上赴汉经过报告了何键之后，何即电蒋，拟来汉

晋谒，面报一切。蒋复电同意。于是我又陪何于四月十一日到汉。蒋对何慰勉有加。同日南京方面正式任命何键主湘。何在汉酬酢数日并会晤了鲁涤平之后（时鲁已率部抵汉，任武汉警备司令），即回湘着手整编部队。

桂系军队既为蒋介石所败，遂走鄂西，经湘黔边境回桂。蒋以桂系军队未彻底消灭，终为腹心之患，决意继续讨伐。四月十六日，委何键为讨逆第四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七师师长（周斓为新编第八师师长，刘建绪为十九师师长，陈汉章、陈光中分任独立第六、第七旅旅长），令其率师讨桂。何初以军队始集，兵力脆弱，颇犹豫，旋蒋介石派武汉市长刘文岛为代表，携款百万来湘助军费，促之进兵，何乃受命。

四月二十四日何键区分讨逆军为三个纵队：以新编第八师师长周斓为第一纵队司令；第十九师师长刘建绪为第二纵队司令；第五十二师师长吴尚为第三纵队司令（吴尚师此时虽驻湖南，但不是四路军的建制部队，是临时编在战斗序列里面来的，这次讨桂结束后调到何处去了，现已记不清楚）。二十九日何键与刘文岛同赴衡阳督师，到衡阳后召集周斓、刘建绪、吴尚等师长开会，决定部署如下：以陈光中为先遣支队司令，即时推进至黄沙河附近，掩护全军的集中，尔后归刘建绪指挥经全州、兴安向桂林挺进；以周斓纵队为右纵队，由邵阳经武冈、龙胜趋桂林；以刘建绪纵队为中央纵队，由衡阳经零陵、全州、兴安直取桂林；以吴尚纵队为左纵队，由郴县经嘉禾、道县入桂趋阳朔。刘文岛于何键下达了作战命令，各部开始行动后即离衡返汉复命。

部队进入桂境后未遇桂军任何抵抗。约在五月二十日左右，周斓部到达龙胜、三江之线，刘建绪部进入了桂林，吴尚部到达阳朔。何键于二十三日到桂林。

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早已制订了诱敌深入、选择柳州附近有利地形进行决战的作战计划。但何键毫未察觉，到桂林后，仍轻率地继续驱军向柳州前进。六月初旬，军抵柳河东岸，刘建绪师的戴斗垣旅在敌前强迫渡河，攻取柳州，半渡遭桂军猛袭，溃乱不可收拾。刘师主力亦受影响，不战而走；桂军全线转入攻势，刘师大败。右翼的周斓师和左翼的吴尚师，闻败讯亦各反旗疾遁，互不相救。李、白先已令民兵在何军的各归路上择其要点预布竹竿铁钉等障碍物，使败军逃命则伤足，护足则丢命，当其处境十分狼狈之际，四山伏兵齐起，猛烈截击。在桂军的反击下，何军遭受重大损失，沿途丢枪溃散者无法统计，周斓师的彭位仁团，因彭养伤在湘，未能亲御其众，损失尤为惨重。各师溃军抵桂林后即分别经由全州及龙虎关退回湘境。桂军亦未越省穷追。何键于六月二十三日回驻零陵后，电蒋介石报告战况，讳言溃败，而名之曰“缩短战线”。其第一次讨桂之役，于焉结束。

（民革湖南省委员会供稿）

何键联桂驱鲁的一幕

戴 岳

一九二七年冬，何键在安徽被西征军打败后，经武汉退入湖南。西征军继续追击，进入湘省。他知道湖南一时不能立足，率所部第三十五军，联合叶开鑫之第四十四军，由常、澧侵入鄂西，图取沙市、宜昌为根据地，以静观时局之变化。何以叶琪守常德，派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率三个师由津市向公安、沙市前进。适鲁涤平第二军奉令由宜、沙开赴常、澧，先头部队已达到公安。刘以机密迅速的行动，击破第二军王捷俊师，占领公安；并于击溃朱耀华师的援军后，乘胜追击，企图压迫第二军于长江南岸而一鼓歼灭之。

时我所率之第二军第六师大部已由沙市渡江，行约十里，闻前方败讯。我以此役关系全军存亡，背江一战，或可侥幸图存于万一，乃兼程前进。路遇王、朱两师溃退队伍，当予以安慰，嘱其开赴虎渡河西岸休整。我师行抵马家咀，以前面地形右翼紧接虎渡河，左翼依托大江，中有小湖，正面狭窄，地形开展，当即配备兵力，赶筑工事，尽一夜之力全部完成。翌晨，刘建绪率部来攻，遭受我军严重打击；续行猛攻，亦无进展。其沿斗湖堤进攻之部队为我扼守该处之易振湘团及秦汉三部所击溃。刘部向戴家场方面猛攻多次，并曾一度攻进戴家场，由于正面受地形之限制，左后受虎渡河西岸朱、王两师的威胁，亦以我增兵来援而被击退。双方在此地带相持达五日之久，刘部势衰力竭，卒被第二军全线

反攻而全部溃退。我部乘胜追击，进迫津澧。何部稍作抵抗即向沅陵方面撤退，状极狼狈。彼时由鹤峰西斋图犯宜昌之叶开鑫部亦为李榮(李晓焱部)所击破。我师追抵常德，会合由益阳、汉寿方面来的谭道源师，将常德四面包围。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李宗仁、白崇禧派员前来调处，将叶琪所部改编为第十二军，开赴武汉，何部移驻沅陵。第二军即在常德、临澧一带休整。

西征军取得胜利后，湘鄂底定，成立两湖政务委员会，处理两湖清乡反共及其他善后事宜；程潜出任该会主任委员，主持湘政兼湖南全省清乡督办。当时程的第六军实力较弱，而鲁涤平之第二军与陈嘉祐之第十四军较强；程对何键的第三十五军，相当重视。何利用同乡和旧属关系，对程表示竭诚拥护；复通过叶琪，勾结桂系，取得李宗仁、白崇禧的支持，得任湖南全省清乡会办，并荐其心腹刘晴初为清乡督办署参谋长。程潜既负有两湖政务委员会之责，经常要赴武汉处理政务，清乡督办署的事，几无暇过问，悉委何键主持。

一九二八年五月，程潜为李宗仁、白崇禧所扣押；六月，南京政府从谭延闿之意任鲁涤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全省清乡督办。何键以桂系的支持，得以蝉联清乡会办一席。

李、白以不见信于蒋介石，又以第二军绝对不能为彼等所用，深以后方安全为虑，亟思拉拢湖南地方实力派以抑制鲁涤平。何键在湖南羽翼渐丰，正合其用。此时叶琪风尘仆仆奔走于武汉长沙之间，与何接触频繁，其利用何键以制鲁去鲁之意图，已极为明显，何对李、白的阴谋，固早已洞察在胸，他对李、白极力表示恭顺，以博得他们的信任；复又危言耸听，谓湖南为第四集团军后方，湘桂如不一致，一旦武汉有事，桂系后路安全堪虑，以坚李、白去鲁之决心，而达到他攫取湖南统治权的目的。何内以刘

晴初为心腹，外以桂系为奥援，利用其实际负责清乡督办署的机会，在军政方面积极扶植他的私人势力，对于全省清乡事宜，完全一手包办，鲁几无从过问。时我率第六师驻在长沙，兼任长沙警备司令，对其暗结桂系，偶有所闻，对他们处理清乡案件过于操纵武断，间持异议，使他们不免有点顾忌。

何键为了实现他夺取湖南政权的阴谋，在军事上也作了一些布置，除王东原的教导师早已驻在省会外，并将戴斗垣旅调来长沙，以便与桂系军队里应外合，相机消灭第二军。与此同时，他还采取一些卑鄙手段离间第二军各将领间的关系。有一次，他对我说：“我的第三十五军已缩编为第十九师，交由刘恢先（即刘建绪）负责；你们第二军改编为第十八师，师长一席，非你莫属。”我知其用意，一笑置之。刘晴初于谈话中，亦常流露出鄙视张辉瓒的意思，如说“张八爷（张辉瓒）系一政客，好小利，贪便宜，不能共事”等语。某次，叶琪来长沙，与我晤谈时，也极尽拉拢挑拨之能事，他对我说了很多李宗仁对我如何好、何键对我如何重视之类的话。一九二九年二月下旬某日驱鲁事变发生之前夕，叶来长沙观察动静，与我在小西门中国饭店盘桓了一夜，谈了很久，窥探其意，似仍想以同学关系诱我倒向李、白一边。我未为所动。他的计谋不逞，翌日即回岳阳防次去了。

叶琪回岳阳不久，以该师师党部成立为名，邀何键与我去岳观礼。我以长沙防务关系表示不能参加。何键约我往其公馆谈话，力劝同往；我无词推脱，只好答应。临别时，何还一再嘱咐务必同去，并相约在车站等候，我答以俟回家收拾后即往车站。我抵家不久，何又来电话催行。家人接了电话告我，我嘱家人回说我已离家出去了。结果我没有去。何、叶为什么坚意要我赴岳？揣其用意，不外乘机对我作最后劝诱；如我坚决不从，即将我扣留。

在他们看来，如我不在长沙，则政权由鲁转入何手，可不费多大力气；如我在长，因有警备省会之责，他们一旦使用武力，我必挥兵抵抗，如是便将导致一场战争，引起南京方面的震怒，出面加以干预。何、叶等最大的顾虑在此。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日，李、白密派其亲信部队杨腾辉、李明瑞两师乘长武路火车南下。因其调动极端机密，鲁涤平派驻武汉的联络参谋林昌武事先完全不知，没有电报来长。迨军车过汨罗越过我师防线后，鲁始得讯。以事出仓卒，即于当晚十时在其南门外祝威岗私宅召集紧急会议，到有第十八师副师长张辉瓒、参谋长彭新民、省政府军事科科长唐希朴、长沙市政筹备处长鲁岱、长沙警备司令戴岳、及何键的代表罗藩瀛（罗兼十九师的参谋长）、旅长戴斗垣等（其他的人记不清了）。会议开始，鲁首先发言，大意谓：武汉方面已有两个师开进湖南，先头部队已抵霞凝港，离省城只有二十里；我决意辞去省主席职务，请何芸樵先生暂为代理；省会警备事宜如何交替，使地方免受战事糜烂，希大家共同商量云云。鲁表示态度后，即请大家发表意见。当时代表何键出席的人中，戴斗垣与我系同期同班同学，相处六七年；罗藩瀛由保定毕业后即分发我营（时我任炮兵营长）见习，由连附递升连长、营长、团长，相处八年之久。他们虽与我有相当的情感，但为了效忠何键，获得擢升，都竭力为何开脱。罗说：“芸公（何键号芸樵）对主席很好，没有什么恶意；武汉军队南下，这完全是李总司令和白健公的意见。”戴斗垣发言，大意与罗相同，并说：“关于省会治安问题，希鹏兄（我的号）的部队如果开走，我当责无旁贷，一定尽力设法维持。”张辉瓒见鲁涤平焦急，劝鲁安心，并说：“请罗参谋长转告芸樵先生，请他用电话告知到达霞凝站的军队，暂缓前进，以免人心惊惶。”时已夜深，鲁见大家都已

疲劳，乃说：“各位今夜在此权宿一宵，明日再商谈如何？”出席的人，半晌无语，我即起而发言说：“兵临城下，局势瞬息万变，主席既表示请芸樵先生代理，应即作离湘准备。我身负省会警备之责，所部数千人一班一排地分驻城厢内外二三十处，如不迅速调集离开，长沙难免变为战场，惊及地方父老，则我罪更大。我决定明日十时以前将部队全部撤离长沙。请秉坚（罗藩瀛别号）参谋长以此意转达芸公，关于警备任务，即请金门（戴斗垣别号）旅长就近派兵接替。我不能在此多留，须立即回部，调集队伍，以作撤离准备。”说完，便辞出回部。随即以电话通知各团、营；电话不通的，派传令兵分别通知；并令驻新河的王挥营担任撤离掩护，遇有桂系部队，须一再委婉劝阻，请其稍缓前进，万一不听，则以武力制止之。

不意天尚未明，桂系部队已在霞凝站下车，分向洪山庙、湖迹渡等处渡河，由东北两方面包围长沙。我担任警戒的部队当予抵抗。我出小吴门口，敌已逼近市区，闻连长银奇战死，士兵亦有伤亡。我恐警戒部队难以安全撤退，当即指派集中于校场坪的第十七团之周营予以掩护；并令已集中的各部，经阿弥岭、东山向浏阳前进。行抵东山，清查部队，除伤亡官兵七名、未及归队三十余名外，余均安全退出。惟部队给养大成问题（因驻在长沙的第四集团军经理处故意扣留不发）。事变先一日，军中已无伙食费。此时不得已，只好就地筹借粮食，给以收据。军行至韩家潭，据探报：通浏阳之路已被李明瑞师所截断，担任道吾山警戒之朱耀华旅周翰团已撤走。因此，我部即在韩家潭上面数里处渡浏阳河，取道浏阳城南向万载前进。这时，先抵浏阳之湘岸樵运局长胡星池送来伙食费五百元，给各部队作购菜之用。部队到达万载县城后，奉令在该处休整。

关于鲁涤平的行踪，据说他于当晚五更潜赴水陆洲，坐一小汽艇至城陵矶，转乘外轮赴南京，陈述湖南事变经过。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何键与桂系互相勾结的片断回忆

唐 希 扑

何键与桂系之间的互相勾结，是从一九二七年开始的。虽然有时他们也曾以兵戎相见，但直到一九三七年何键垮台离开湖南，他们始终是藕断丝连，没有断绝政治上的微妙关系。

一九二七年冬，唐生智为西征军所败，由武汉出走，何键率其第三十五军退回湖南时，即以保定同学关系与桂系通款曲；并要他的参谋长江瑞煌（湖北人，保定军校同学）与桂系中的重要分子湖北人胡宗铎、陶钧等联系。西征军入湘后，何更联合李品仙等通电表示拥护武汉政府，得以保留三十五军建制。李宗仁和白崇禧对于何键的发动“马日事变”本来就很赞赏，加上程潜的援引，他不仅保留了军长的职位，而且兼了湖南省清乡会办。何在湖南的地位稳定后，进一步利用十七军军长叶琪（广西人，保定军校毕业，曾任三十五军第一师师长和副军长）与桂系联系，开辟了后来长期统治湖南的蹊径。

湖南为鄂、桂通道，桂系要巩固后方，必须将湖南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在西征获胜后让程潜暂时主湘，原系迫于当时形势。到一九二八年五月，李、白便以召开会议为名，诱程潜赴汉而软禁之，并以鲁涤平继任湖南主席。鲁为谭延闿嫡系，自然难为桂系所用，但当时桂系以连倒唐、程，如果再以外籍人继任湖南主席，恐招致湘人公愤，因而暂时以鲁过渡。鲁被发表主湘之次日，叶琪请他吃饭，仅邀我作陪。席间，叶屡次宣扬李、

白的“威德”，意在窥察鲁的态度。鲁的神色很不自然，略带惶恐情绪，表示不敢就职。叶劝鲁“放手去干”，表示愿为鲁效劳，并推荐我协助工作。鲁回湘后，果然以我任组织相当庞大的省府军务科长。很明显，叶之荐我，无非想将我打入鲁的左右以便监视；而鲁之用我，却是企图利用我与桂系通声气，并讨好于叶琪。原来，当时的武汉由夏威负责，而叶琪是夏的亲戚，凡事夏必先商之叶琪，可谓言听计从。因此，鲁对叶很客气，叶来长沙，鲁亲至车站迎送，如此奉承一个老部属（鲁任团长，叶任连长，鲁任师长，叶任团长），说明鲁当时对桂系害怕到何等地步了。

鲁涤平任湖南主席兼清乡督办，何键仍兼清乡会办。何虽不是桂系理想中人，但他们认为何是保定军校同学，较之亲南京政府的鲁涤平毕竟要好一点。因此，在何、鲁矛盾日深与何、桂勾结日紧的情况下，终于在一九二九年二月酿成了何、桂联合驱鲁的事变。

武汉方面令叶琪率兵来长沙驱鲁时，他觉得太难为情，要他的参谋长程继川（我的妹夫）随军先行。程到岳阳时，给我一个急电，要我劝鲁涤平速离长沙，以免受委屈。我对此很感困难，如不去向鲁报告，则有负叶的委托，去嘛，又怕鲁迁怒于我，但我终于不顾一切地将电报送给他看了。鲁涤平事先毫无所闻，得讯大吃一惊。当即要我专车前往岳阳接洽，表示自己愿意辞职，请桂军不要开来长沙，以免发生冲突。我马上在鲁宅打电话向路局要车，据说桥头驿有很多军车，专车开不出去。鲁更吓慌了，立即打电话给张辉瓒、戴岳等商议撤退问题。第二天（二月二十一日）拂晓，他就乘轮逃往南京。桂军杨腾辉旅随即入城，代表桂系宣布何键继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叶琪在与我闲谈中曾经流露：湖南为广西的门户，省主席一

职，迟早要由夏威取代。桂系的阴谋，何键自然也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一面对桂系表示感恩图报，恭顺听命，一面却派王芃生、张慕先等向蒋介石输诚，获得蒋的谅解，并承认他为湖南省主席。桂系在武汉军事失利之后，何键更受蒋命为四路军总指挥，率所部入桂追击李、白。

何键虽然已公开投入蒋介石的怀抱，但对于失败的桂系并未忘情。问题不是何对桂系真有什么好感，而是考虑他过去与桂系的勾搭，蒋介石是知道的，无论如何剖白，蒋决不会真正相信；蒋让他当湖南主席，也不过是暂时利用，所以他始终不愿与桂系完全断绝关系。一九二九年秋，我任湖南省政府顾问，何要我专赴香港与叶琪联系，转达他的苦衷，并请叶向李宗仁和白崇禧等致意。同年十二月，桂系协助张发奎进攻广州时，我又奉何命前往广西与李、白联系。听说他还派张其雄到广西去过两次。

何键既然不愿与李、白割断关系，而李、白要夺取蒋家天下，势必争取外援，因此，也常与何暗通声气。一九三一年七月，我初到广西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军，李、白即要我代表他们与何键联系，意图联合反蒋。我当时对何说了一遍蒋介石如何排除异己，川滇黔粤桂等杂牌军队都难幸免，湘、桂唇齿相依，如不好好团结起来把他打垮，将来必被各个击破的道理。何表示很同意我的看法，但认为他的处境不同，时机未成熟，不能轻率从事。他要我转达李、白，到了必要的时候，他一定附骥尾。

一九三六年两广“六一”事变前夕，李宗仁与陈济棠联合派遣刘斐和陈维周（陈济棠之兄）来湘与何键密商联合反蒋。何满口答应合作，但表示须待两广部队进入湖南，他才能响应。因此，在事变后几天（六月七日），李、白要我随第四集团军总参谋长李品仙来长沙与何键商讨进兵湖南的日期和地点。我们被他十分殷

勤地招待到李觉（何的女婿，时任十九师师长）的家里与他进行密谈。他说：“你们的军队集中桂林、全州，准备进入湖南，老蒋已经知道（其实是他自己告密的），现正在调兵遣将，企图固守衡阳。你们最好抢先占领，以扩大影响。我只等你们的军队到达衡阳附近，立即完全撤退。你们两位以为如何？”我们从旁了解，衡阳确已空虚，只有少数警察维持治安，认为何键所说尚属实在；乃即电告李、白，要他们先将驻在全州的苏祖馨师迅即用汽车输送到衡阳附近的泉湖市，作占领衡阳的准备，并催广东的军队，速向耒阳前进。旋接李、白复电照办。

六月八日的早晨，何键到李觉家来对我们说：“昨晚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说已令罗霖、孔令恂、周祥初三个师马上开衡阳，归罗霖指挥。罗的军队驻在浏阳、万载一带，大约要两三天才能集中。今天下午我请你们吃饭，邀罗霖作陪。他是大家的同学，又是鹤公（李品仙号鹤龄）的老部下，可以做点工作，要他缓开。”我们同吃中饭之后，何对李觉说：“鹤公有好几年没有来湖南，下午你陪着到各处玩玩。”于是，李觉亲自驾驶一部小汽车载我们到全市游览一遍，路过八角亭，人多路窄，几乎压伤行人。我们当时没有发觉他别有用心，事后才知道他要我们招摇过市，是有意使蒋介石的特务看到我们来做策反工作，而他并未动摇。（后来，我在广西接到家信，说六月九日上午，我的堂弟军统特务唐志才（我叔唐麒的儿子）来告他们的组织打算刺杀李品仙和我）。吃晚饭的时候罗霖后到，大家寒暄一番。饭后，李品仙和罗的谈话慢慢扯到正文上来了，何键则借故离开，好让我们深谈。李劝罗弃蒋投桂，但谈来谈去，罗始终未为所动，并表示决心将部队开往衡阳。

是晚九时左右接苏祖馨来电，说全师于八日下午安全到达泉

湖市待命。十时许，何键来说：“现在蒋介石抽调好些军队，陆续入湘，打算固守衡阳，陈诚就来长沙指挥。你们两位在这里恐有不便，我打算派一得力副官，用我的小汽车护送你们去衡阳，明天拂晓即可到达，仍坐你们留在那里的飞机回去好吗？”我们知道情况已发生变化，只好答应回去。临行，何键赠送了我们许多湘绣等礼品，并保护安全出境。

不久，罗霖师进入衡阳，李、白以粤军未齐头并进，也令苏师撤回全州。轰动一时的两广“六一”事变，也因内部的分崩离析而无所作为，通过程潜、居正、朱培德等从中斡旋，终于与蒋介石妥协了。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两广“六一”事变中何键玩弄两面手法

罗子雯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西南新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了长期酝酿的夺取蒋家天下的“六一”事变。下令两广海陆空三军准备北上“抗日”。为了骗取舆论的同情，李、白针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打起要求抗日的招牌，在事变前夕（5月27日）曾通电全国，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事变第二日又假惺惺地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领导抗日。同时策动两广各级国民党党部、民众团体为之响应；并在两广各地举行抗日宣传示威运动，以激起全国抗日怒潮，为他们的反蒋制造气氛。此外，还大肆拉拢各方抗日反蒋的党派团体及各界人士，欢迎他们到西南去共商抗日反蒋大计。在蒋介石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强敌压境，人民群众抗日救国情绪空前高涨的时候，李、白的这种做法，确实博得许多人的同情。我当时任国民党七十七师师长，内幕情况，事变之前虽毫无所闻，但事变之后，却成为当事人之一。兹就记忆所及，追述事变后的亲身见闻于次：

一九三六年我正驻扎浏阳、万载一带。六月六日，忽然得到蒋介石一通急电，内称：“……请火速率领铁路附近部队星夜赶赴衡阳，……但须绝对服从何总指挥命令……”，电尾落款是“蒋中正亲启”。我接到这通电报，不知是一回什么事，心里疑惑不定，便派人请浏阳县县长王英兆来商。王听得我接了蒋介石的急电，也惊疑地说：“是呀！我也接到何总指挥的指示说，如果有事，就要

我避开一下，大概总发生了什么事吧？”听了他的话，更加深了我的疑惑，心里很焦急。因为我的部队都在浏阳万载边区，没有在铁路附近，一时调集不易。于是我一面打电话命令我部第六十团团长陈友朋立刻先开一部分军队去长沙，一面就带着参谋处长和秘书坐汽车急驰长沙去见何键。

我于七日上午赶到长沙，何键却去对河湖南大学讲演去了。我心里想：蒋的电报这样急切，何键为什么却这样悠闲呢？下午，何键在他的公馆里与我见了面，他连连点头，满面笑容地说：“你来了，好，好，好。”我便把蒋介石的急电递给他。他看过后仍递还我，一边连连点头说：“好、好、好”，一边两只手都插进口袋里，一手拿出一束广东的传单，一手拿出一束广西的传单，对我说：“子雯兄，这里是两广的传单，请你先看看。”我一看，满纸都是冠冕堂皇的“团结抗日”的言论，如“取消中日间所订的非法屈辱协定”，“开放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实行对日经济绝交”，“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等等。这时，我才明白蒋介石的急电原来是叫我去阻止两广军队北上的。何键望着我看完了这些宣传品，态度悠闲地对我说：“你看呢，怎么办好？”并问我的部队在哪里。我告诉他，已打电话叫部队火速开来长沙转赴衡阳，但困难的是这些部队并没有在铁路附近，调运起来要费些时间。这时何键靠在沙发上，头微微偏向右边，眼睛斜视着地板，慢吞吞地说：“你这点部队怎么能阻挡得两广的军队呢？他们一共有一百个团。我看你还是开往株洲去好了。”当时我有些犹豫，但一想到蒋介石的急电，又意识到非去衡阳不可，便坚决地说：“我只有服从命令！”他说：“子雯兄，还得慎重考虑一下。”好象非常替我担心似的。紧接着又马上扯开话题对我说：“喂！李鹤龄（李品仙号）来了，你晓

得吗？我请他明天吃饭。我不知道你来了，明天请你一道去，等下帖子就补来。”我问李鹤龄住在那里？他支支吾吾地点着头，只叫我明天去赴宴。我当时婉谢道：“这只怕不便吧？”何键连忙圆转着说：“这没有什么，这没有什么，你们也是老朋友。”就这样我辞别了何键回到住处。我脑子里尽盘旋着这些问题：蒋介石的电报那样急切，为什么何键却这样悠闲呢？两广和蒋介石闹事，为什么何键却在这种紧急关头鬼鬼祟祟地接待两广的重要将领李鹤龄呢？何键的态度这样暧昧，为什么蒋介石的电报又叫我绝对服从他的命令呢？一夜翻来复去，无法解开这些疑团。事后我才得知何键当时一面与两广早有密约，等待时机；一面向蒋介石暗送秋波——将两广的动态向蒋告密，并因而获得蒋的四十万元的奖赏而蒋介石来电要我服从何键，则意在表示他对何的重视和信任，以稳定何对他的拥戴。第二天一清早，我接到何键的请客帖，上面写着赴宴地点是李觉住宅（李系何键女婿，当时任十九师师长），我才知道李品仙原来住在李觉的家里。我到李家后，环顾之下，两广方面有李品仙、唐希扑，湖南方面除何键、李觉外，还有省府秘书长易书竹、省府委员曹子谷等。李品仙一见到我，马上抢前几步紧握着我的手，满面春风，很亲热地叫声：“子雯兄，多年不见了，你好？”我也赶忙尊称他说：“老长官、老长官，多年不见了，你老好？”原来李品仙是唐生智的部下，他当团、旅长时，我当他的连、营长，后来他投到桂系方面去了，我们便一直没见过面，久别重逢，免不掉一番寒暄。席终人散，最后剩下李品仙、唐希扑、何键和我四人。慢慢地李品仙的话转到正题上来了。他说：“子雯兄，听说你要到衡阳去，是吗？”我笑着说：“是奉令去衡阳镇摄。”“嘿，你莫去衡阳呀，我们两广部队是要去北方打日本鬼子的，你去衡阳，这不是叫我们不抗日吗？”李品仙等我的话一

停，马上就接着说。随后又滔滔不绝来了一套抗日救国的大道理，以一种探询的眼光望着我说：“你看我们两广不北上抗日行吗？”我笑着说：“当然啰，抗日是我们大家的事啊，不过我们总应该有个统一的领导才行呀。”我这句话一落，空气马上沉闷了一下。过了半晌，他用一种略带威胁的口气说：“子雯兄，我们两广的部队有一百个团，还有飞机，你那一点点部队摆在衡阳又有什么用呢？”我听了笑了一笑说：“是呀，我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不去又怎么办呢？这么多弟兄要饭吃嘛。”李的脸上露出一丝喜悦的表情，他以为我已动摇了，连忙接着说：“吃饭的问题这要什么紧呵，这好解决。”这时何键也连忙在旁附和说：“吃饭的问题要什么紧呵。”一边说着，一边起身往外走了，他大概以为交易有了希望，故意避开，好让我们进一步谈条件。接着李品仙便单刀直入地说道：“白健公（白崇禧号健生）对同学非常好，又爱护人才，他对子雯兄也很好。”我一听他提到这个地方，眼前立刻出现了一幕不愉快的往事：那还是在北伐的时候，我驻守湖北孝感，当时白崇禧认为我是唐生智的旧部，便以二师之众包围孝感，想解决我，我终于被迫辞职，闲住汉口。现在一听见他替白崇禧吹嘘，心里气就来了，马上冷冷的回答道：“你快不要提起白先生了，孝感往事，今日思之，犹觉头痛！”李品仙见我提到这一笔旧账，马上替白崇禧解释，将孝感的事，往叶琪身上一推，说那完全是当时的总参谋长叶琪搞的。唐希抃也附和着向我解释。我也马上圆转着说：“那倒不晓得是谁搞的，反正事情已经成了过去了。”后来，李品仙索性问我道：“你已经下定决心去衡阳吗？”“是的，我已下定决心去衡阳。”我这样回答。李品仙低着头沉默了一下，然后又抬起头向着我故意装做不在意的样子，猝然问道：“你大约什么时候可以到衡阳？”我知道他在探听我军的动态了，于是也佯装很焦急的

样子说：“这就难说了，我的部队根本没在铁路附近，还散布在浏阳、万载边区一带，一时还调不拢来，这是何总指挥也知道的。我估计最快在十二号左右才能赶到衡阳。”李品仙跟着把话题一转说：“子雯兄，我们多年不见了，还有许多话要与你谈，明天再来看你。你住在那里？”我连忙拦阻说：“我住的地方很远，不敢劳驾。”就这样我和李品仙分手了。当时我估计，我们一分手后，李品仙马上就会拍电报把我们的动态告诉两广，两广马上就会运兵来衡阳。因此，我一走出李觉住宅后，即摇电话到浏阳一带催部队赶快开来长沙，一面搞交通工具运兵。首先到铁路局，然后到公路局。这时公路局、铁路局早已奉到何键的意旨，借故推脱：或者是说从长沙到株洲的路基刚修好，还未试车，恐怕出危险；或者就说没有车子。经过多次奔走，好不容易才弄到一辆车皮、两部卡车。这时我部有一个营已赶到长沙，于是便急忙带了这个营先往衡阳进发。

出发前还有一段紧张的插曲：原来我在浏阳接到蒋介石的急电时，恐怕一时军队调不拢来，延误了日期，便立即在六日下午回了一个电报，大意是说我的部队没有在铁路附近，一时不易调集，并表示尽快赶赴衡阳。八日和李品仙交谈后，又由浏阳转来蒋介石的第二个电报，大意是：委我为衡阳警备司令，所有驻衡部队统归我指挥，要我师火速开赴衡阳。没有几个钟点，蒋介石的第三个电报又拍来了。大意是：要我无论如何带一团或一营或是自己一人都要立刻赶赴衡阳。惶急之情，跃然纸上。当我接到第二个电报时曾立刻去找何键，请他下令部队开衡阳。这时陈诚也由南京赶来了，我们在何键那里碰了头。他见我还在长沙，非常着急。他说：“子雯兄，你还未走，衡阳紧急，请你快去。孔令恂、周祥初两师就会开来，统归你指挥。”陈诚说后就匆匆坐飞机走了。

据说当时李品仙知道陈诚来了，就慌慌张张坐着汽车溜去衡阳，然后飞回广西。陈诚一走，军事委员会又派来高级参谋周磐、杜从戎两人做监军，坐催我即赴衡阳。于是我一边弄车辆运兵，一面派秘书夏明翼先去衡阳布置。等我弄好车辆再度打电话请何键下命令的时候，何键仍然是慢吞吞地回答：“我看你还是不去衡阳吧！我已派易秘书长去南京报告最近情况，并请委员长另派咸宁的某师去衡阳。”当时，我感到蒋介石一面坚决要我赶赴衡阳，一面要我绝对服从何键的命令；而何键又一再阻止我去衡阳，在这样的情况下，实在难以处理。最后我只有不顾一切，驰赴衡阳，再作计较。

大约是九日下午，我率兵一营赶到衡阳。一下车，站上冷冰冰的，只有秘书夏明翼守候着。原来衡阳县长、保安团长等受何键暗示，听到风声早已溜走了，剩下一座空城。我想：衡阳这样空虚，万一两广部队冲来，实难应付。只有虚张声势，对方才不敢贸然进犯，方能争取时间从容布置。于是便马上下令控制交通机构，并把城门敞开，将自己的部队川流不息地开进调出，并派出很多侦探故意扬言某某等师已抵衡阳；同时，通电衡、郴、永、宝各县说：“……奉令镇摄衡阳，所有驻衡部队概归本人指挥，各该县长不得擅离职守，自相惊扰。”我当时虽这样安排着，然而内心却极为焦虑。

当我运兵来衡阳时，两广部队已用汽车抢运军队来占领衡阳。我部陆续到达衡阳时，广西苏祖馨师先头部队已从祁阳北上，开抵泉湖市，离衡阳仅六十里；广东部队也到了郴州。他们曾打电话给衡阳县政府探询情况。这时我已派参谋控制县府电讯机构，便佯称罗某一师已抵衡阳，孔、周两师即将南开郴永。旋即发觉广西苏师的先头部队因有所顾虑，以为衡阳真有大军镇守，实力

雄厚，已开始由泉湖市、洪桥撤退。开到郴县的广东部队，也开始南撤了。

两广部队撤退后数日，忽然接到李宗仁、白崇禧的联名电，派代表潘世谟等二人（另一人已忘其姓名）前来与我商谈。我当即复电表示欢迎。潘等二人来衡阳后，仍大谈一套“一致抗日”和他们也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日”的漂亮话。其实他们只是因为未抢得衡阳，不能得到各方响应，又怕大军压境，因而假商谈为缓兵之计，并借以探听我军动态而来的。我窥知他们的来意，也对他们讲了一些抗日必须团结的道理，并吹嘘衡阳的防务如何巩固，民意如何昂扬，意在使对方知难而退；并派参谋处长陪同他们去实地参观。第二天，潘等再来会谈。孔、周两师长，周、杜两高参也都在座。我向潘等说：“我们昨日所谈的话，我将在报上披露，以表示你们来衡的善意。”潘坚不同意。这时，周磐和杜从戎大为气愤，周在桌上一拳，喝道：“你们搞什么鬼！你们别有用心！”说后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他们拥护蒋委员长抗日是假的，请司令干掉他们好了！”我拦阻着说：“两军相见，不斩来使，放他们回去好了。”随即派专车送他们回广西。潘等回广西后，广东内部起了分化：余汉谋通电拥蒋，李汉魂“挂印封金”，陈济棠只得下野。广西李、白孤掌难鸣，便设法转圜，以图自保，轰动一时的两广事变也就很快结束了。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何 键 与 谭 延 闿

黎 泽 泰

何键与谭延闿原无渊源。从一九二六年何初识谭，到一九三〇年谭死，二人之间有一段勾搭。我曾先后作过他们的僚属，并为他们之间的穿针引线人。现凭记忆及所存文稿，追述二人的关系如次。

一九二六年底，谭延闿以国民政府主席统率国府人员取道江西南昌抵达汉口，官邸设在法租界西贡街。我父（黎承礼，字薇荪）和谭原系故交，相别十年之久，特由长沙赶到汉口，和谭会晤，当被延入官邸居住。时有萧园宴集诗会（萧园为湖北督军萧耀南故宅）。谭在某次宴集时赠我父诗二首。其一云：

十载重相见，依然笑口开。好诗因酒得，多病识年衰。

旧梦嗟新觉，同岑感异苔。不须愁齿豁、舌本自甘回。

我当时在何键的第二师师部秘书处任职，曾将这两首诗抄置案头欣赏。何键和凌璋见了，同声赞佩。何键不会做诗，但亦附庸风雅，好写字，小楷学欧体，每天有字课。何对我说：“我想去访谒尊大人”。凌璋是我父任高等学堂监督时的学生，他也和我谈及：“何师长想去见老师，表示敬意；还想见见谭畏公，请你向老师先容。”我当即电话联系，我父表示欢迎。族人黎桂庭在谭延闿跟前当马弁日，因此，我们出入官邸，可以畅行无阻。何键由我引导，戎装而入，对我父执礼甚恭。谈了许久，我父说：“你还要去见谭先生吧？”何键顺便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名片，我父说：“用

不着投刺，你随我来。”就把何键带到谭的书室里。我父叫道：“祖安，我介绍一个客人见你，这是何师长，小儿就是在他那里工作。”谭连忙起身，握手笑道：“辛苦了。”接着称赞他这次围攻武昌城的战绩，并询问活捉湖北督军陈嘉谟和师长刘玉春的情形。何键一一详细报告经过，谈得很高兴。何键的这次访问，是他和谭延闿搭上关系的开始。

翌年春，湖南农民运动掀起了高潮。长沙著名劣绅叶德辉被枪决，士绅阶级大为恐慌。石陶钧（字醉六，邵阳人、谭延闿的前参谋长）以胡元倓（字子靖、湘潭人，主办明德学校多年，系湖南学阀势力的头子，和谭延闿有深交）也被害的传闻消息报告谭延闿，谭闻之惊诧，即打电话给何键，请他托在长沙军队中的熟人，代为打听虚实。后来何键回电说没有这回事，谭才放下心来，随即写信告知石陶钧（这封信还存湖南省博物馆）。

在国共合作时期，谭延闿伪装成左派，表现很积极；等到湖南的革命运动进入高潮，何键反共最力，谭又很表同情，右派面目毕露。谭当时曾说过：“这条路（指革命的路）走不通了，假如一定要勉强去走，鼻子就会碰出血来。”

何键这时为了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广泛进行了阴谋活动，一方面与谭延闿拉关系，一方面又分派爪牙四出活动，终于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后，何键更以纵横捭阖的手段，开始拥鲁主湘，继又与桂系勾结赶鲁下台。鲁涤平被搞垮台后，谭延闿对桂系固极为不满，对何键当然也很不高兴。谭曾对吕苾筹说：“何键被桂系牢笼，不能自拔，想乘此机会捞取政治资本，也系实情；但以后再想两面讨好，那是做不到的。”当时鲁涤平手下一些从龙之士，愤愤不平，纷纷攻击何键。谭延闿听了，只是缄默不言。当南京

国民政府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开会讨论湖南省主席人选时，谭延闿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提出何键获得通过。至是，何键真除湖南省主席。当时有人问谭延闿：这是不是做顺水人情？谭回答说：“这是成全好事。”因为蒋介石和桂系的矛盾日益尖锐，湖南为双方争夺的一个焦点，桂系企图把何键拉到他们一边，曾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任何为湖南省主席，南京政府旋即予以承认，命他代理，现在又正式予以真除，这不仅是迁就事实，也是笼络何键的一种方法，借以分化桂、何关系；估计何键只要自己的政治地位得到保障，他是惯于随风使舵，不会始终站在桂系一边的。蒋、谭的这个估计，从后来的事实演变看，是很准确的。不久蒋介石正式下令讨桂，进军武汉，桂军败退。南京政府任命鲁涤平为武汉卫戍司令，旋又调任江西省主席。何键在湖南的地位，也初步得到巩固。

谭延闿在鲁涤平任江西省主席后，认为鲁、何之间过去的嫌隙，亟待弥缝，湘赣两个邻省，必须紧密团结，这样对巩固南京政权，才有好处，因于一九二九年九月，派随从秘书宋焕章（字仲圭，湘潭人）携带谭的信和密电码一本来长沙晋见何键。

谭致何的信如下：

芸樵吾兄勋席：年来湘省四境，渐告安谧。执事审察地方情势，符合中央意图，百度维新，成绩昭著，遥企贤劳，良用佩慰。咏安兄（鲁涤平别号）与兄各寄分疆之重，复结比邻之好；湘赣接壤，辅车相依，尚希共济艰难，以抒伟抱，为国为乡，实利赖之。兹嘱秘书宋焕章来湘，面达一切，即乞惠洽，为幸。顺颂勋绥。 谭延闿启 九月十四日

这封信既为鲁涤平释嫌，又替何键打气，意在使何键坚定信心，明确方向，靠拢中央；言简意赅，具有微妙的作用，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这时，何键已倾向南京政府，具体的表现就是：凡关于湘省政治上的重大问题，经常以文电向行政院报告请示；同时要湖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主任张慕先经常与行政院秘书长吕兹筹保持联系，沟通消息和意见。另一方面，仍和桂系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何的将领和僚属中这时有两种对立的主张：少数人认为湘(何)桂关系向来密切，不应背信弃义；多数人则认为依傍桂系将无出路，南京政府毕竟是正统，力量又大，应该拥护。值此紧急关头，何键颇感棘手，但又必须明确表示态度，不能再游移了。他曾为此召集少数高级人员在文星桥住宅开过一次极秘密的会议，讨论经过如何从未透露，最后作出了拥蒋讨桂的决策，显然是经过这次会议统一意见的结果。

何键附蒋讨桂，初曾获捷，终于桂军一度进入长沙，何键退走湘西。这就给反何的人一个可乘之隙。原来自从鲁涤平被桂系与何键赶走后，谭系中的军人政客极为愤慨，有打抱不平的思想；湖南党务方面，又形成甲、乙两派(甲派反何，乙派拥何)，斗争甚为激烈；南京和省内的反何分子，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反何力量。每当湖南政治上发生一点问题，就被他们抓住，作为攻击何键的子弹。南京国民政府和行政院门首，经常有人集合请愿，要求撤办何键；他们并编印了许多反何的小册子到处散发。这次桂军攻占长沙，他们认为机会难得，不可错过，闹得特别凶。张慕先当时在南京，见事态严重，立即将情况电告何键，要他派员来京，向中央报告实情，“以释群疑”。其时，蒋介石正与冯、阎混战，已赴前方，由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何键在益阳接到张慕先的电报，认为京方情况严重，有派员前去疏通之必要；

但要选择一个与谭延闿比较接近能够说话的人前去，方为适合。易书竹、凌璋都推荐我，于是何键决定要我去走一转。我比时发了一个电报给行政院秘书长吕芷筹，告以来意，请代达谭。六月七日，我从益阳动身，十一日到南京。谭延闿在成贤街官邸接见。我将何键信递上，并把湖南情况陈述一番。

何键致谭延闿信如下：

畏公钧鉴：前呈歌午电，知蒙垂察。此次讨桂之役，键奉中央明令，督率所部按照计划进行，且亲赴前方督战，开始动员时候，我军乘胜挺进，与敌遭遇于桂边。我第二纵队刘建绪有攻克桂林之捷，节节胜利，士气甚旺。但因山地险峻，箐林丛密，而突击深入，顾虑滋多。不得已仍飭所部撤回湘境，以固边防，欲待友军会合，徐图大举。阎冯叛国，神人共弃，正在大张挾伐，以期聚歼。孰料桂军企图与之配合，互相勾引，倾巢来犯，不惜作孤注之一掷，一则妄想牵制我北上之兵力，遥相呼应；一则垂涎湘赣固有地盘，达到割据称雄之野心；逆焰嚣张，势不可遏。据报白崇禧、张发奎此次分途犯湘兵力，共约三万余众。我军严阵以待，最初激战于祁永之间，双方相持旬日。继又在醴陵渌口之线展开战斗，我军因失利转移阵地。来湘增援部队，仅有第十三师夏斗寅由鄂驰来。键偕同夏斗寅亲赴株洲前线视察，已不及挽回颓势；键率部由长沙后撤，待援反攻。默揣敌情，已成弩末，其掠地愈广，兵力愈散，衰竭之象，可立而待也。键遵奉上令，将所部集结湘西，扼守常益之线。除电粤军陈济棠请迅飭部进驻湘南以收夹击之效外，伏乞钧座电促粤军克日出动，以扰敌后，共扫妖氛。键奉职无状，措置乖方，以致

军事失利，惶疚滋深，既无以保桑梓之安宁，更无以上副中枢付托之重，旅京同乡人士、平昔关心梓里，时多责难。道远传闻，恐有失实。此次战役实际状况，除另电详报外，黎尔谷（我的别号——笔者）兄来京晋谒崇轅，特托面陈一切，尚祈予以诲示，为禱。敬请钧安。何键谨启 二月七日。

我到京后，屡次谒见谭延闿，谈话内容和所得结果，归纳有以下几点：

（一）关于桂军攻进长沙，旅京湘人借此掀起反何高潮的问题：谭延闿说：“这个问题，不自现在始，也可以理解的。有的人想出风头，无非是借题发挥，其实没有什么。你既为此而来，对同乡人士，总以息事宁人为好。可和吕澂（苾筹）研究一下，最好由吕出面，用普通宴客方式，邀集有关的人，彼此见见面，在不着痕迹的场合，消释一些误解。”吕苾筹秉承谭的这个意旨，开出一张客单，除我以外，有周鳌山、朱久莹、李藩国、胡迈、楚廉山、谭曙村、谭光等。宴会系谭的庖人曹厨子做的菜，肴饌丰美。席间谈笑风生，因为彼此都是熟人，大家打开窗子说亮话。通过这一次聚会和个别交谈，毕竟把反何空气缓和下来。

（二）谭延闿提到湖南收鸦片烟税的问题，他说：“听说何键打算收鸦片烟税，是否已在着手进行？过去蔡巨猷驻扎湘西，假借筹军饷的名义，滥收烟税，再三告诫不听，结果弄得不可收拾。赵恒惕主政湖南的时候，为争夺烟税搞得乌烟瘴气，流毒地方甚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值得特别关照的。地方长官要替地方多谋福利，要修明政治，树立廉洁风尚。”他这样严肃郑重的语调，我当时因不明实际情况，闻之颇为诧异，觉得这与事实不符，可能是有人故意中伤；而谭对这个问题，如此痛切认真，令

人难以索解。后来看到何键的第四路军总指挥部经理处长王家鼎和唐赞宇、王士健、张冈凤等大办烟税，设有所谓“特税处”、“监护处”等机构，搜刮大宗税收，名义上作为军队饷源，实际上为饱私囊，我才感觉谭延闿的话，确有预见；同时也可看出谭始终不能忘情于湖南，有很多的耳目替他收集情报。

（三）谈到湖南政治上的根本问题，谭延闿说：“湖南地当冲要，在历次战争中，都不免受影响，地方元气为之大伤。现在的政治趋向，首先应该依据中央的施政方针，做到步伐一致。同乡人士本敬恭桑梓之义，对地方的事特别关心，也是必然的。至于人言啧啧、孰是孰非，就一言难尽了。从春秋责备贤者的道理来说，能够严于责己，自然心平气和。湘人治湘，是我素来的主张。只有做到精诚团结，上下无间，事情就好办了。既不是同床异梦，又何必改弦更张。已经中央决定的问题，不会轻易变更。蒋先生（介石）对湖南的事情，也很关切，他在前方，时常有电报来问及。他的主张和我的意见，是相吻合的。”

（四）对于何键的政治作风问题，谭延闿作了一针见血的批评。他说：“何键过去惯于脚踏两边船。政治上不能驾无底船，更不宜脚踏两边船，因为危险性很大，一旦遇到风险，即令要想随风转舵，也很难化险为夷。他过去和桂系勾勾搭搭，不要以为很秘密，其实是心劳日拙，早已被人窥破。只有老老实实，不弄半点玄虚，才不致愆事。现在应该看得很清楚，无论桂系或阎冯，凡是穷兵黩武，没有不惨败的。最重要的是把立脚点站稳，再不能两边摇摆。”对何键来说，这确是一个关键问题。从他后来的表现看来，谭的这番话可能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五）我在谭宅还同周鳌山谈过一次话，谭延闿也在座。周鳌山和我是很熟的朋友，北伐时我们在汉口相处很久。无论什么

场合，他总是议论风生，滔滔不绝，故有“熬牛皮”之称号。他既不是谭的幕中人物，而时常为谭的座上客。有人告诉我：“周鳌山是反何最力的，能够把他拉拢，掩着他的口就好办了。”这次恰好在谭家遇着，同坐在谭的书室内谈话。周对我说：“你何必替何键效奔走之劳？何键是一个坏人，为同乡所瞧不起的。”谭延闿说：“坏人可以转变成为好人，世界上的好坏不是绝对的。何键过去不能说没有做过坏事，现在诚心诚意地回转头来，拥护中央，岂不是变成好人好事了吗？”我连忙说：“这是对的。”周鳌山认为谭的这一表示，异乎寻常，只好顺着他的意思把话头转过来说：“我刚才的话很不对头，可以收回。为着息事宁人，今后我总是唯院长之命是听。”

从谭延闿以上的谈话看来，他对何键虽然犹存不满、有所指责，但总的说来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谭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种进一步的转变呢？原来谭为人一向圆滑，驱鲁（涤平）之事已成过去，鲁又得到了安排（江西省主席），从他的作人的哲学出发，自可不究既往，勿为已甚；更重要的是，他这时已当了蒋介石的行政院长，不得不按照蒋的意旨行事，他支持何键，是为了把何进一步拉入蒋的怀抱，是替蒋帮忙。

我的任务完成，便告辞回湘。临别时，吕荪筹和我作了一次谈话，他说：“你这次来京，收获很大：一方面，使旅京湘人了解湖南的实际状况、消除了成见；一方面，中央对芸樵先生的信任 and 爱护，通过你的接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把中央的意见和解决了的问题带回去，更有必要。院长说，‘脚踏两边船是危险的’，这是正确的看法，在芸樵先生本身，是关键性问题，一定能够引起注意的。”随后，他把谭延闿复何键的信一封、相片一张、亲书摺扇一柄，交我带回长沙转交何键。

谭延闿复何键的信，原文如下：

芸樵吾兄勋鉴：湘事因道路修阻，不明真相，正在悬系中。适由尔谷兄递到惠书，并详述实况，具见干国维乡，苦心孤诣，企念勋勤，钦佩曷已。讨桂之役，拟定计划，原期粤湘部队同时并举，惜未能按照实施，致使湘军失利，亡羊补牢，犹为未晚。现在援湘粤军有蔡廷锴、蒋光鼐、李扬敬各部，同时出发，想已与贵部取得联络。旋闻湘军反攻告捷，为之欣然。古语云：“螭屈终以求伸”，前此一时之挫，固不必介意也。执事处危疑震撼之际，抱坚定不挠之心，真诚披沥，早为中央洞察无遗，仍望贯彻始终，努力以赴。所商各节，仍由尔谷兄代达。附赠小像一张，书扇一柄，即希哂收。专此布复，顺颂勋绥。谭延闿启。七月五日。

我于七月十二日回抵长沙，见了何键，将谭延闿的信件和相片扇子交他，并详告在京接洽情形，又将谭延闿和吕苾筹谈话要点，用书面写好送给他看。何键表示高兴，他说：“畏公关切爱护，所以流露真情，我应去电致谢。”比时吩咐易书竹拟一电稿，原文如下：

南京行政院院长谭钧鉴：□密，尔谷兄回湘，奉到手海，只聆种切。欣展玉照，如亲颜色。赐书箴扇，获扬仁风。承示各节，非爱护备至，不能规诫真切。遥瞻山斗，弥用依依，谨布谢忱，伏维垂察。职何键叩元印

何键最初联合桂系，夺得湖南政权；继则投入蒋的怀抱，以巩固其统治地位。谭延闿在处理蒋、何关系中，既帮助了蒋，也维护了何。何对谭深为感激。一九三〇年九月廿二日，谭延闿因

病在京逝世，噩耗传来，何键表示十分伤感。他挽谭延闿的对联云：“裘带仰雍容，顿失老成嗟国瘁；风云托知遇，只馀感激负公多。”这联沉痛亲切，透露了个中消息。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